

公益慈善周刊



2014年7月27日

2014年第27期(总第127期)

◎政策点击

- 俞正声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4
- 民政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5
- 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曲淑辉组长出席社会组织改革创新暨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研讨会并讲话 13
-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意见 14
- 上海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引入社会组织管理 18
- 上海浦东借鉴海外经验 探索设立社区公益基金会 19
-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赵白鸽：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20

◎专家视野

- 徐永光：企业家用不义之财做慈善是“伪善” 25
- 刘东华：民营企业只有善终 才有资格考虑传承 27
- 曹慰德：钱越多问题越大 财富必须要有目的 29
- 汤敏：国企应是最大社会企业 不能只想着赚大钱 31
- 许小年：自私的人才把公益事业持续下去 42
- 熊丙奇：中国大学为何难获得企业家的捐赠？ 44
- 王传涛：“慈善自由”的理念还需要普及多少年 45
- Brian Tomlinson：国际援助：探讨公民社会参与南南合作的可能性 47

◎行业观点

- 中国青年报：海南风灾后 为何红会身陷“舆情风暴” 55
- 新京报：潘石屹捐款哈佛有多少可行性 58
- 新快报：怎样吸引邻里做公益 60
- 环球网：公益众筹看起来简单的5个案例 62
- 社会创业家：慈善的“未来基因” 64
- 公益时报：小额信贷的中国式进程 68

NGOCN: 对话冯世锋律师-公益合作如何能保障双方权益	71
NGOCN: 厦大学生联名“撑”博导: 性骚扰共犯结构中的“好心人”	74
华西都市报: 政府购买服务“上架” 社区“雇员”转向社会组织	80
新疆经济报: 那些公益组织为何消失了	82
【资助者说】第14回: 谈一谈我眼中的小额资助	84
善达网: 公益机构用微信建立品牌的5个必看攻略	87
白鹤: 筹款可以很休闲	88
褚莹: 公益行业价值链缺失	90
顾远: 限制催生创新: 一个击败冰箱的非洲“罐中罐”	91

◎行业动态

世界艾滋病大会中国获奖者调查发现 昆明“低龄女”的威胁	94
红会回应酷暑救灾送棉被: 基于地方需求 棉被用处广	98
全国首个社会服务交易所成立	99
首届青年导演计划 用影像改变公益传播	100
“幸福列车”项目进展追踪报道-重启协商纪实	103
张欣称笑对谩骂 捐助计划将继续	104
中国最大淡水湖欲建大坝抵消三峡影响 8月或启动立项	106
世界自然基金会建议暂缓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	109

◎公益人

“美丽中国”CEO 潘勋卓: 七年不痒	112
联合国发布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	115
美国环保组织利用谷歌街景监测天然气泄露	115
GiveGab: 专为志愿者而生的社交网络	117
公平贸易: 从一个疯狂的咖啡概念到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	118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在京发布	121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步入新阶段	122
专访丹麦明星社企: 自闭症人群像是蒲公英	124
水牛书店: 搭一座连结书本与土地的桥梁	131
NGO组团探访蒙牛公益之源	133

◎海南风灾专题报道

7 家机构发起成立“海南 7.18 台风公益赈灾赈灾联络处” 135

海南风灾捐款达 1800 余万元 136

新京报：评红会给灾区送棉被：慈善要知“冷暖” 137

海南救灾乱象频受争议：备灾水平体现救灾能力 139

◎公益布告栏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启动招生 144

2014 中国慈善论坛-征集优秀项目参展..... 145

2014 创想工作坊召集公益初创团队..... 146

◎政策点击

俞正声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就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建议

俞正声主持

全国政协24日下午在京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就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出意见建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国政协委员甄砚、吉林、王名、杨健、王小兰、何伟、郭长江、迟福林、江利平、骆沙鸣、翁华建、胡有清、柯锦华、蔡国雄、梁嘉琨，以及李君如、黄浩明、马仲良等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发言。

委员们认为，社会治理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政府与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商协作，凝聚社会共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动态过程。社会组织广泛代表着各阶层和团体的权益，是进行社会协商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的有益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社会组织有利于民主科学决策，提高政府效率，加强社会服务和道德建设。

委员们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委员们建议，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关键是要加强立法，清晰准确地界定非赢利组织的界限，明确权力和责任，确立规则。要做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购买服务范围要从后勤服务扩展到养老、医疗、研究等公共服务项目。完善社会组织税收制度，稳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推进行业协会的改革，从体制上为行业协会发展松绑，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座谈会上，委员们和专家学者坦诚建言，俞正声不时插话，与大家进行交流。

全国政协十分关注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问题。会前，台盟中央和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调研。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介绍了我国社会组织工作的有关情况。中央编办、中央综治办、财政部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与委员们互动交流。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林文漪、张庆黎、卢展工出席座谈会。

来源：新华网

地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24/c_1111789788.htm

[【返回目录】](#)

民政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本次发布会于7月25日10时开始,发布会由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张卫星主持。

[张卫星]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大家知道,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2014年中办发21号文件《关于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的意见》、2013年国办发10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回应社会关切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都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门要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推进信息发布常态化和规范化。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系列决策部署,加强民政新闻宣传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民政部在已有各项新闻发布制度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民政部新闻发布工作规程》,已经2014年第9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从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政部新闻发布工作规程》确立了主题新闻发布、例行新闻发布、应急新闻发布和日常新闻发布相结合的新闻发布制度。

[张卫星]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先生,请他介绍“中华慈善奖”评选办法改革和民政部畅通慈善救助信息渠道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张卫星]首先,我就今年上半年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今年以来的灾情及救灾工作,向媒体的朋友们作一简要通报。今年以来,民政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民政改革,强化制度建设,着力抓好年初部署的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实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全面落实退役士兵安置改革政策、增强社区自治服务功能、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深入推动殡葬改革等8项重点工作落实,取得了明显进展。

[张卫星]配合国务院做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即将下发《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部署最低生活保障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开展“救急难”工作试点和“人情保”、“错保”专项整治,健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2014年中央财政分别安排城市、农村低保补助资金518.88亿元、582.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8%、15.1%。二季度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标准391.9元,月人均支出水平262.6元,同比增长11.34%、10.71%。农村低保年人均保障标准2590.4元,年人均补助水平1423.4元,同比增长14.4%、13.05%。

[张卫星]协调制定了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推进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强化养老服务人才

培养、提高养老服务标准化信息化水平等政策措施，开展了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养老服务信息惠民项目试点、远程医疗服务试点、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等6项试点，推动解决养老服务融资难、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难、养老机构税费减免难等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截至6月底，各类养老机构达到3.7万多家；养老床位509.8万张，同比增长18.22%；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5.2张，同比增长13.26%。

[张卫星]稳妥实行业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部本级制定实施了过渡期社会组织登记工作方案。明确将民办非企业单位列为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优惠政策的主体之一，推动解决高校毕业生到社会组织就业面临的落户和职称评定问题。实施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260多万群众从中受益。截至6月底，全国共登记社会组织56.1万个，社会组织总量同比增长10.87%。

[张卫星]制定了改进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明确了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并对教育培训的组织实施、承训机构的考核监督等做出明确规定；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校企合作，为参训退役士兵提供就业创业的快捷通道，有效提高了有意愿参加培训的退役士兵的参训率和参加教育培训后的就业率。

[张卫星]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加强慈善超市创建，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网络，推动捐赠的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截至6月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2.5万个，民政部门直接接受社会捐款20.5亿元，305.9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

[张卫星]启动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和第二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截至6月底，全国共建立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7.4万个，覆盖率达到40.2%，同比增长8.89%。开展了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专项督查，进一步规范了民政管理服务。

[张卫星]下面，我通报一下今年以来的灾情及救灾工作。据民政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亿人次受灾，533人死亡，97人失踪，371.9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91.8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21.3万间房屋倒塌，168.7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12331.2千公顷，其中绝收1443.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575.6亿元。

[张卫星]针对各地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先后启动15次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14个工作组赶赴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商财政部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19.68亿元，调拨救灾帐篷3.8万顶、棉衣被5.7万床（件）、折叠床2.5万张等中央救灾储备物资，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工作。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主汛期，抗灾救灾任务繁重。民政部将继续全力以赴，密切关注各地灾害风险和灾情发展，视情及时启动救灾预警响应和救灾应急响应，及时

商财政部门安排中央救灾资金，调拨中央救灾储备物资，帮助灾区受灾群众做好紧急救助、过渡性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以及冬春救助等工作。

[张卫星]有关情况我就通报到这里。下面进入本次发布会议题。首先请詹成付司长介绍新修订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等有关情况。

[詹成付]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面，按照本次发布会的要求，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两项新工作。一是关于民政部颁布的新修改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

[詹成付]“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政府在慈善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是党和政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国家对社会各界慈心善举的有效激励，也是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胡锦涛、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接见过“中华慈善奖”获奖者代表，并发表过重要讲话。截止到2013年，“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共表彰了261名个人、96家机构、127个慈善项目、248家内资企业和119家外资企业，并授予李嘉诚、邵逸夫等人“中华慈善奖终身成就奖”。应该说，“中华慈善奖”的设立及评选表彰活动的开展，已经成为中国慈善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有力促进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

[詹成付]为进一步做好“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确保评选表彰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鼓励更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支持、参与慈善事业，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和《民政部表彰奖励工作规定》，民政部在总结前8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近期修订完善了《“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从9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詹成付]一是调整了评奖周期和表彰名额，提高了“中华慈善奖”的门槛。新的《办法》将评奖周期由过去的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同时将表彰名额由近些年的每届100个减少至每届不超过50个，表彰名额大幅度缩减。

[詹成付]二是调整了奖项设置，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新的《办法》不再设置固定的奖项，而是规定每届评选活动举行时，结合当时的政府宏观工作部署、社会各界具体需求和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来确定，以充分体现创新性、灵活性和时代性。

[詹成付]三是调整了工作机构，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科学性。根据新的《办法》，民政部将邀请各方面热心慈善事业的代表人物共100人，组成“中华慈善奖”评委库。每届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举行时，民政部将采取制定评委加随机抽取评委的方式组成评委会，负责评选工作。但评委个人或其所代表的机构如参加评选，则要实行“回避”制度。

[詹成付]四是规范了评选程序，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公正性。新《办法》总结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正式确定了申报——推荐——提名——投票——拟表彰名单——公示——确认名单

——公开表彰等8个环节组成的评选过程，环环相扣，既有评委会的独立评选和集体研究，又有社会公众的投票参与和直接监督，既有我们民政部门的审核把关，又有工商、税务、公安等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联合把关，从程序上确保了“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的公正性。

[詹成付]五是设计了省级民政部门参与途径，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带动作用。新的《办法》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赋予了明确的工作职责，有利于调动全国各地民政部门的积极性，实现地方慈善奖与“中华慈善奖”之间的奖项衔接，提高地方慈善奖的权威性，带动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

[詹成付]六是突出了社会参与，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传播效果。设立“中华慈善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传播慈善理念、吸引公众更踊跃地投身慈善事业，因此，新的《办法》设计了多项突出社会参与的条款，比如在评选过程中与富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开展全程合作，委托行业性慈善组织负责具体工作事务，对入选名单开展网络投票等等，这都是社会参与的具体体现。

[詹成付]七是设计了终身荣誉称号，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含金量。针对一些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爱心人士多次荣获“中华慈善奖”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褒奖和激励，也为了衔接国家正在研究出台的国家荣誉制度，新的《办法》规定，累计10年或今后连续5届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个人，可授予“中华慈善家”荣誉称号，作为终身荣誉，此后可不再参评“中华慈善奖”；而参评企业、机构和项目则不受时间和届次的限制。

[詹成付]八是设置了提名奖，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激励作用。新《办法》规定，凡是在评选过程中入选了提名名单，并且公示后社会无异议，但最终没能获评“中华慈善奖”的参选者，可以获得提名奖。

[詹成付]九是建立了惩罚机制和奖项撤销机制，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约束性。新的《办法》规定，被推荐或自荐参加“中华慈善奖”评选的个人、企业、机构或项目，填报评审材料或者在网络投票中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6年内不得再行申报。获奖者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要对其已获奖项予以撤销。

[詹成付]我还要向大家补充说明的是，《“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修订工作，是从去年我们举办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后启动的。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记者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大家帮助我们大力宣传修订工作，征集到了大量来自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另一方面，在座的多位记者朋友还参加了一些我们的座谈会，当面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此，我要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詹成付]接下来，我要向大家发布的第二项工作，是关于民政部牵头编撰的《2014 慈典——慈善救助信息实用手册》。

[詹成付]信息不对称是多年来困扰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一方面,对于许多遭遇困难的社会公众而言,他们不知道除了政府救助之外,还有哪些慈善资源、慈善项目可以帮助自己;一方面,对于很多慈善组织而言,他们拥有资金、人力和项目,由于信息不对称,却难以发现和锁定要帮助的对象。这也是我在上周五第三届慈展会新闻发布会上曾经提到的,当前存在慈善资源对接分散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编辑《2014 慈典——慈善救助信息实用手册》就是我们做的多种努力中的一种。

[詹成付]这本《慈典》是由民政系统发起,公益媒体承办,慈善组织团结协作、聚智聚力的成果。去年年底,我们以民政部办公厅名义下发了《关于广泛开展慈善项目信息征集工作的通知》,请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发动慈善组织踊跃上报慈善项目。同时,我们确定了遴选项目的三个标准:一是项目以扶贫济困为重点;二是举办项目的组织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法人身份的慈善组织;三是项目在2014年内仍然运行。按照这三条标准,在各地上报的数千个项目中,我们最终遴选了近2000个优秀项目,编辑了这本《慈典》。

[詹成付]《慈典》中的项目,囊括了生活救助、灾害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等多个领域,服务于老人、儿童、残疾人、妇女、进城务工人员等多个群体。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环球慈善》杂志社的同志们,他们耐心、细致地对各地所上报的海量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类、确认、编辑、校对、印刷以及发放。今天《环球慈善》杂志社的吕惠民社长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用掌声向他表示感谢。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工商联、中国慈善联合会等单位和组织,以及在慈善项目征集过程中帮助我们大力宣传的各家媒体。《慈典》是一本免费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手册,是大家的共同努力,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詹成付]去年年底,国务院颁布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为发挥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开辟了巨大的空间。编辑《慈典》,也是我们落实《办法》的一项实际行动。当这本《慈典》付梓之时,李立国部长为之提笔作序。在此,我就引用序言中的话来结束今天的发布:“让我们广泛播撒慈善种子,畅通资源流通渠道,激发慈善力量充分涌流,为发展壮大现代慈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两项新的工作就给大家通报到这里。

[张卫星]谢谢詹司长的介绍。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请报一下你代表的媒体机构。

[记者(新华社)]两个问题想请问詹司长,一个是,您刚刚在发布中提到,民政部将邀请100位社会各界的代表来组成“中华慈善奖”的评委库,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做法?第二个问题,我们这本《慈典》,对于困难的群众来讲,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得和取得这本手册?

[詹成付]关于100名代表组成的“中华慈善奖”评委库具体是这样的,评选的时候民政部将邀请党政军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包括我们的媒体多方面的代表100人组成评

委库。按照目前这个新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这100个席位中，机构的代表占70%，就是有70名，个人代表有30名。我们将通过两种方式邀请他们参加：一是，向有关机构发出邀请，请他们委派代表；二是，通过我们的媒体，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记者，通过你们的渠道向社会发出征集，请关注慈善事业的专家学者、慈善工作者、媒体、会计师、律师这些专业人士毛遂自荐。如果报名人数太多，我们还将根据专业性和影响力帮我们进行筛选，最后确定这100名。

[詹成付]第二个问题是，困难群众如何获得这本《慈典》。我们目前这本《慈典》大概印有2万册，我们通过邮局向由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596家国家级贫困县寄发《慈典》，每个民政局大约是20—40本，请我们贫困县民政局的同志再往乡镇的民政助理员发放，一般他们跟我们的帮助对象、困难群众联系比较多。同时我们还将把这本手册，在邮局、车站、码头、医院等一些公共场所发放，这样便于更多的人看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在互联网上，这样有更多的互联网群体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传播。

[詹成付]总而言之，多渠道的使这些信息让慈善组织知道、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叫供需见面。

[记者（中国青年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华慈善奖”的评选，想了解一下，下一届“中华慈善奖”的评选表彰活动大概计划在何时举行？我们看到新修改的《办法》里面，说没有对奖项进行固定的设置，就是每届有灵活变化，即将举办的这届怎么考虑设置的？另外，有关现在救灾情况的，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前两天海南省文昌有灾民领取到发霉的面包的事情，后来我们了解到现在已经问责了，我们想了解，以后在这种救灾物资的采购上、发放上怎么能做到更好的有差异化的、精细化的发放，而且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

[詹成付]第一个问题，第九届“中华慈善奖”的评选我们到今年下半年要进行启动。第二个问题，“中华慈善奖”按照新的《办法》，我们没有设置固定的奖项，主要就是针对以往的经验我们总结出来的，过去有固定的奖项，这次不设固定的奖项，主要是便于慈善评选表彰能够回应社会的关切，能够配合政府的总体工作，能够体现慈善事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比方说，当社会对社会救助很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年当届的慈善表彰中突出社会救助类的项目，目的没有别的，就是用导向性使我们的慈善资源真真正正的为老百姓服务，能为我们社会发挥作用。

[张卫星]刚才您问救灾物资的问题，我尝试着回答一下。应该说救灾物资是帮助群众解困的关键物资，也是关系到群众基本生活的重要基础，在保障救灾物资，特别是食品和饮用水的安全方面，应该是救灾工作的底线和基础。海南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民政部高度关注，也及时就这个事情跟海南省民政厅进行了沟通。据我们了解，目前海南省纪委、民政、工商以及食品药品监督、公安等部门已经就这件事情展开了全面调查，并且依法依规作出了处理。可能大家从网上也能了解到，7

月23日，海南省有关部门已经向社会公布了事情的经过，同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在保障救灾物资的个性化需求以及物资储备保障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政部和财政部共同建立了救灾物资的储备机制。

[张卫星]在储备布局上，按照《国家综合减灾防灾规划（2011—2015年）》中“自然灾害发生12小时之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的基本要求，民政部在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合肥、福州等18个城市设立了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和多数多灾易灾的县都设立了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全国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基本形成。在物资的品种上，各级民政部门是按照保障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净的水喝的要求进行储备。中央救灾物资主要侧重于储备生产周期长、通用性比较强的物资，目前主要包括三大类14个品种，主要涉及到帐篷类、被服类、装具类，地方民政部门主要是储备一些保质期短、符合当地特点的物资。

[张卫星]在储备的调运管理方面，这几年民政部会同财政、发展改革、交通等部门，以及军队建立了救灾物资的定期储备、大灾后的应急补充储备、以及部门协同配合、军地应急联动、省地级以上应急救援等机制，应该说无论是从汶川地震，还是这几年的玉树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芦山地震等等，都保证了救灾物资应急调运工作的高效进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从近年救灾的实际来看，与现阶段的救灾需求以及群众的期待相比，救灾物资储备不足、方式单一、品种不够丰富、救灾储备库的布局不够合理、管理手段相对落后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国家减灾委、民政部正在着手制定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力求通过规划以及有关项目的落实来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针对“中华慈善奖”的问题想问詹司长，您刚刚提到在以后的评选表彰工作中地方部门要参与进来，特别是地方慈善奖和中华慈善奖之间要进行关联，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打算？

[詹成付]目前为止，地方我们统计了一下，有16个省份设立了地方性的慈善奖，还有一些地级市的城市也有相应的奖项，在国家层面咱们就是“中华慈善奖”，这一次新修订的《办法》，把地方民政部门的因素也引入了，目的就是凸显全国一盘棋的效果，也是我们近年来一直想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具体怎么操作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每次在评选优秀慈善项目的时候，我们都会采用因素法的做法，从项目的效果、覆盖面、可持续性、创新性、可推广性等等这些方面进行打分，然后再作出比较，以后的评选过程中我们就不需要再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了，反而是获得地方性慈善奖就可以直接进行加分因素，同时这么做我们觉得也可以提高地方慈善评奖项目的权威性，也使他们的项目上档次。

[记者（“环球慈善”杂志社）]咱们的名额从100名减少到50名，对那些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企业，会不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詹成付]100名减少到50名，实事求是说，我们就是想提高“中华慈善奖”的含金量。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呢？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一方面，任何做慈善的人，我想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获这个奖，比如，“我做慈善就是为了获‘中华慈善奖’，这是我的终极目的”，就意味着他不是真正的做慈善。他的功利性太强。第二，我们还有一个提名奖，这个提名奖大概有100名，你获不了“中华慈善奖”，可以获“中华慈善奖”的提名奖。我刚才在介绍的过程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获得提名奖实际上就是对做慈善的一种激励作用。“50个加100个”我觉得是可以的，是比较适度的。

[记者（光明日报）]近期媒体广泛报道了广西的“杨六斤事件”，我想问一下，詹司长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詹成付]我还在广西挂过职，离那个地方还是比较近的。好像是百色的一个县，靠近贵州那一带。杨六斤这个事情凸显了很多问题，你看他很快地能够募集那么多钱，说明我们社会还是有爱心的，当大家发现杨六斤这个困难对象以后，自发的向他进行捐款，体现了我们的正能量，我们的媒体要很好的宣传。第二个，说明我们慈善组织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挥，还要进一步的加强。我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捐款的过程中没有向某一个慈善组织去捐，再由慈善组织交给杨六斤进行他们的项目呢？而是直接捐给他，这里可能隐含着对我们慈善组织不太信任，因为我们一些慈善组织近些年来暴露出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让人不放心，所以就“面对面”的捐款。

[詹成付]第三个，也给我们进一步规范慈善行为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我觉得杨六斤这个事情起码有这么三个视角，凸显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然在参与制定慈善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案例，我们也觉得随着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更多的通过慈善组织去做慈善，可能更有保障一些，当然我们也不反对“面对面”的进行直接的帮扶和帮助。

[记者（香港文汇报）]我想问一下“中华慈善奖”的问题，现在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在过往的一些慈善奖评选中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企业或者慈善家落马，我们在评选慈善奖的时候如何去规避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设立这个奖项的道德的标准？因为之前丁书苗还有四川的一些企业，在没有出问题之前，都是获得过慈善奖的，这次改革有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怎么去规避？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其实对“中华慈善奖”是不太好的，对它的信誉或者各方面都是不太好的影响，请问在这块是怎么考虑的？

[詹成付]我们在修订《“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过程中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有八个程序，从申报到最后确定、公示的过程中，包括有社会参与、社会网络投票，这本身就是把获奖名单置于广大公众监督之下，给了我们评选者来把关、审核的一个广泛空间，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还请地方民政部门参与，行业有关部门来审核。

[詹成付]有没有可能经过了这些程序依然会有漏网之鱼闯进来了？会不会有，我不敢打保票说

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惩罚机制，一旦发现就会撤销。他隐瞒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们发现，某某届的时候他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获奖的，或者隐瞒事实，有违法行为，那没关系，一旦发现，立即查处，取消他的荣誉称号。这样在评选过程中有一开始的公开投票，有公众参与，再有审核，再到发现问题后的撤销机制，我觉得这么一个闭合系统可以保证不给想对这方面试法的人机会。

[张卫星]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在会后联系部新闻办。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来源：民政部网站

地址：<http://ftzb.mca.gov.cn/asop/templates/n39/interviewlog.html>

[【返回目录】](#)

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曲淑辉组长出席社会组织改革创新暨 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研讨会并讲话

7月24日上午，社会组织改革创新暨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民政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曲淑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曲淑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全力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创新。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客观要求；是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内在需要。

曲淑辉强调，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中还存在着政社不分、职能混淆，收费不合理、不规范，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自律机制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监管措施不力等亟待规范的问题，部分社会组织确实还存在着一些违规或腐败现象，有些还比较突出，对预防社会组织腐败必须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

曲淑辉最后要求，社会组织是非营利组织，不同于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要结合社会组织特点，着重规范社会组织行为。下一步，要从继续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完善社会组织监管制度、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

会议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孙伟林同志主持，10个省(市、区)社会组织促进会代表

共3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同志集中讨论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对社会组织改革创新以及如何更好地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来源:民政部门户网站

地址: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7/20140700673710.shtml>

[【返回目录】](#)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意见

川办发〔2014〕67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2013〕1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川委发〔2014〕4号)和《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3〕111号)精神,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总体要求

(一)方式范围。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四次全会都明确要求,推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按照政府保障基本的原则,建立完善社会产品和服务提供制度。

(二)基本原则。

一是积极稳妥、有序实施。坚持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

二是科学安排、注重实效。坚持精打细算,明确权利义务,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把有限资金用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确保取得实效。

三是公开择优、以事定费。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费随事转,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

选择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力量，确保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平等参与竞争。加强监督检查和科学评估，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

四是改革创新、完善机制。坚持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衔接，推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及时总结改革实践经验，借鉴国内外有益成果，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健康发展，加快形成公共服务提供新机制。

（三）目标任务。2014年制定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在部分省直部门，选取一些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项目进行试点。各市（州）、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选择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启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试点工作。2015年至2016年，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在全省逐步推开。到2017年，全省初步建成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到2020年，全省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

二、积极稳妥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

（一）购买主体。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二）承接主体。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按照国务院规定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承接主体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 1.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 2.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
- 3.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
- 4.具备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资金的良好记录。
- 6.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购买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

为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促进政事分开、政企分开，各地、各部门应鼓励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积极承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但要与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公开、平等参与竞争。

（三）购买内容。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内容是：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重点考虑、优先安排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

和项目。

1.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教育、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公共体育、交通运输、农业服务、资源环境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2. 社会管理服务事项。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事务、法律援助、社工服务、慈善救济、公益服务、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公共公益宣传和社会组织服务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3. 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行业资格认定和准入审核、处理行业投诉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4. 技术服务事项。科研、行业规划、行业规范、行业调查、行业统计分析、资产评估、监测服务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5.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和技术性事项。法律服务、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服务、监督、评估、绩效评价、工程服务、项目评审、咨询、技术业务培训、审计服务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6. 政府维持自身正常运转所需服务事项。公车租赁服务、机关物业管理服务以及其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机关后勤服务事项。

7. 其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保密事项以及司法审判、行政行为等不适合向社会力量购买以及不属于政府职能的服务项目，政府不得向社会力量购买。

(四) 购买机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原则上按照部门预算和政府采购的程序、方式组织实施。

1. 编制购买计划。购买主体结合工作部署和本单位实际，编制年度购买服务计划，纳入当年部门预算，经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其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购买服务项目，应当编入部门预算中的政府采购预算。

2. 公开购买信息。购买主体应通过各级人民政府门户网、四川政府采购网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购买的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的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

3. 选择购买方式。购买工作应按照规定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4. 签订购买合同。购买主体应及时与承接主体签订购买服务合同，明确购买服务的范围、标的、数量、质量以及服务期限、资金支付方式、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并将购买合同报同级财政部门

备案，按合同要求支付资金。

5.加强购买监督。承接主体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购买主体应加强对服务全过程的跟踪监管和对服务成果的检查验收，严禁转包、暗箱操作等违规违法行为，维护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市场的良好秩序。

（五）资金管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在既有政府综合预算安排中统筹安排。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发展所需增加的资金，也应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列入政府综合预算。要严格资金管理，确保公开、透明、规范、有效。

（六）绩效管理。财政部门应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资金纳入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体系，建立绩效评估办法，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要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度编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预算和选择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切实组织实施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将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牵头，民政、工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职能部门履职，监督部门保障”的工作机制，认真制定并逐步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坚持政府购买服务和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并重，把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能力作为开展购买服务的基础性工作，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创造必要条件。

（二）明确工作分工。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共同监督”的要求，结合实际拟定购买服务目录，确定购买服务计划，指导监督购买服务工作。财政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牵头做好购买服务的采购管理、资金管理、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机构编制部门负责梳理部门职责，明确政府转移职能范围和内容。民政部门负责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进行资质审查，扶持社会组织并推进其标准化建设。工商部门负责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公示、执法等监管体系。监察部门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审计部门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购买主体负责购买服务的具体组织实施，并会同财政等部门对承接主体进行资质审查，对承接主体提供的服务进行跟踪和监督，项目完成后组织考评和验收。承接主体应认真履行购买服务合同，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确保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达到预期目标。

（三）强化政策衔接。按照“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在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研究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改革的政策措施，搞好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行

业协会脱钩等相关改革的衔接，实现“费随事转”。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防止“一边购买服务、一边养人办事”现象发生。

（四）严格监督管理。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规范管理和使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资金，不得截留、挪用和滞留。购买主体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承接主体应规范购买服务项目资金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接受并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严格监督管理。要及时通过公共媒体披露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相关信息，强化社会公众监督。

（五）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搞好调查研究，加强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及时总结经验，发现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逐步完善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确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顺利推进。

附件：四川省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7月16日

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

地址：<http://www.sc.gov.cn/10462/10883/11066/2014/7/19/10307825.shtml>

[【返回目录】](#)

上海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引入社会组织管理

7月18日下午，上海市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引入社会组织管理和诚信建设现场会在普陀区召开，会上，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与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综合处会签了《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引入社会组织管理和诚信建设的工作协议》，标志着上海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与管理在全国首次实现与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全面对接。

上海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后，取消了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的引入，既有利于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审核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也为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购买服务和孵化基地准入等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普陀区检察院介绍了与普陀区民政局开展“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引入社会组织管理”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

会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鲁宁和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王鹏作了主题发言，市民政局副局长匡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社团局、市检察院、普陀区各级领导以及各区县社团局、检察院负责人、媒体代表约40余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转自上海市市政府网站

地址：<http://www.chinanpo.gov.cn/3501/78676/index.html>

[【返回目录】](#)

上海浦东借鉴海外经验 探索设立社区公益基金会

24日从上海浦东方面了解的消息，上海浦东正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尝试探索建立“本土化”的社区公益基金会，用以资助社区公益项目、培育公益人才等，计划在3年内筹资至少600万元。

资料显示，社会公益基金会的雏形出现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当时一些富人在银行设立信托基金，并委托银行用于特定的公益目的，经过发展，现代的社会公益基金会在美国、欧洲国家等已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其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目前上海社会组织超过1万家，其中基金会146家，而真正由社区发起的社会基金会还十分少有。

上海浦东方面介绍，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注册资金40万元，主要来源于洋泾街道及社会捐赠，具体筹资途径包括社会募捐、项目筹资、专项基金以及其他来源。该基金会计划通过多种途径筹资，完成3年内至少筹资600万元的目标。据介绍，其资金将主要用于开展慈善救助、资助社区公益项目；资助公益人才的培育和公益组织的发展；传播公益文化等。

“社区公益基金会在欧美国家已是一种非常成熟、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方法，但在中国内地，尚是一个‘舶来品’，还需培育。”浦东洋泾街道方面称，社会公益基金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法律还不尽完善，在基金会的组织形式、内部决策程序、资产使用管理、社会监督机制等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此外，相关人士表示，社区公益基金会的良性运转，还有赖于社区居民的公益热情，以美国为例，其慈善捐款大部分来自普通市民。但近年来受一些事件影响，国内公众对慈善捐赠的信任度有

所下降，“在此背景下，社区公益基金会要以筹资、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的‘透明’，来赢得市民的公益热情”。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地址：<http://www.chinanews.com/df/2014/07-24/6423281.shtml>

[【返回目录】](#)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赵白鸽：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组织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当前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活力和作用。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的人道助手，必须遵循社会要求，明确定位，扎扎实实搞好自身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工作也提出了总体要求。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您认为社会组织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白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指出“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社会治理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都有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责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规模和功能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其他国家社会治理发展过程来看，社会组织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我国现阶段国情而言，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变化，确立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在治理水平实现现代化，而且要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体系化，实现各种范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再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突出系统治理，

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结合起来，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好性互动。

社会组织充满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社会组织一手连着党和政府，一手连着群众，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社会组织充满活力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实现这一点，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进一步明确权责、依法自主、发挥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既充满活力，又确保有序。

社会组织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这作为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多次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一方法论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项部署和举措之中。在社会治理领域贯彻落实这一方法论，必然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现代化。同时，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承接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矫正市场失灵、弥补政府不足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组织有着独特优势，长期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少差距，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需要尽快提升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

加快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记者：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转型期，应该怎样最大限度调动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赵白鸽：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社会之间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有效平台，是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须加快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加快推进政社分开，形成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尽快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重点培育和发展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这是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突出法治思维和方式，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我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具有“单位制”的许多特点，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需要在提高法治思维、突出

法治方式、强化法治保障上下功夫。应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社会组织权利和责任，以法律为自治准绳，推进依法自治；加强法律监管和评估监督，建立健全准入和退出机制，在法律层面严格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以及准入、监管、退出程序，使社会组织的登记和管理等都走上法制化轨道。

建立健全综合监督体系，强化社会组织公开透明。推进社会组织的现代化，须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应健全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资金管理、年度检查、查处退出等制度。通过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形成登记审批、日常监管等环节信息共享、工作协调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结构，加强自律，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

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提高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关键在人。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改革，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应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探索构建充满活力、更加开放的用人制度，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以专业的人才队伍推进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和技术手段的专业化。

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当好党和政府的人道助手

记者：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发挥离不开体制、机制、法治等外在环境和条件，从社会组织自身而言，尤其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之一，您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赵白鸽：去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莫雷尔主席时指出，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这一重要论述高度肯定了红十字事业，也为新形势下的红十字事业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国内具有代表性的骨干社会组织，我认为应该当好党和政府的人道助手，起到理念引领、服务民生和组织动员作用。

传播人道主义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道主义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00多年来，办了很多大事、实事、善事，在重大自然灾害等国家应急救援救护和扶贫济困、公益慈善、无偿献血等人道援助，以及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传播红十字精神和理念，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围绕核心业务，发挥党和政府人道领域重要助手作用。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动员社会力量，关心最贫困的人群、帮助难为继的人群，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协助党和政府做好人道领域工作。

特别是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围绕“三救”“三献”等核心业务，充分发挥助推社会发展、服务民生需求的重要作用。一是紧急状态下，积极开展应急救援。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参加了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菲律宾“海燕”台风和昆明暴恐事件等应急救援任务，在现场救助、灾后重建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二是非紧急状态，着力开展救护、救助、“三献”等工作。加强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 and 人体器官捐献、无偿献血等工作，提高信息化和规范化水平；推动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不断提高应急救护知识的普及率；依托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款实施“红十字天使计划”等品牌项目，已累计资助大病患者10多万人。三是做好人道外交工作。发挥民间外交优势，继续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配合中央部署，开展国际救援行动。2013年连续派出三批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赴菲律宾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发挥组织动员作用，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第一，以民生、助困项目为平台，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发挥引领作用，整合相关社会资源，提供更加完善和专业的公益服务。红十字博爱家园项目，与农村一事一议、农民书屋等其他党政、社会组织实施的项目紧密结合，最大限度提升项目效益，扩大受益人群数量和范围。第二，以青少年、志愿者工作为载体，开展应急救护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建设社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促进红十字志愿服务蓬勃开展。第三，以示范者、联系者为己任，着力推进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协助政府做好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和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增强服务发展能力。

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的五项重点工作

记者：您刚才提到，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骨干社会组织，可以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示范引领和组织动员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枢纽型骨干社会组织作用，您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重点方向在何处？

赵白鸽：发展中国红十字事业，必须立足我国国情。要按照党和政府要求，遵循社会需求，找准方向，明确定位，全面认识国际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形势及战略方向，紧紧围绕宗旨、使命和责任，深入开展人道传播和核心业务工作，扎扎实实搞好自身建设，努力成为社会组织现代化的一面旗帜，以社会组织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的现代化发展需要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应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理顺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有效发挥红十字会在人道救助领域中积极作用。改革和完善红十字会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强化民主决策机制，提高组织执行能力；加大红十字会组织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财务监督、业务指导、工作督查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红十字会的社会组织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建立“高效、透明、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强化法治建设。做好红十字会法的修改工作，进一步明确红十字会的法定地位、法定机构、法定职责等，为红十字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加强红十字会法、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执法监督，保障红十字依法办会，依法履责；加大对红十字标志的保护力度，依法查处擅自使用或滥用、篡改等违法行为。

加快信息化建设。公开透明是提升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公开透明的重要手段。各级红十字会应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真实、准确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建立综合监督体系。有效的监督是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应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综合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红十字会经费审查监督制度，加强监察、审计部门对红十字会的监察、审计；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加强组织队伍建设。推进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市、县级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建设，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加强对冠名红十字（会）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支持红十字会加强会员服务，保障会员权利；优化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人员构成，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强化决策和监督职能；创新选人用人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充实红十字会管理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红十字工作人员的职业化水平。

来源：光明网转自学习时报

地址：http://www.gmw.cn/sixiang/2014-07/21/content_12083191.htm

[【返回目录】](#)

◎专家视野

徐永光：企业家用不义之财做慈善是“伪善”

2014年7月26-27日，由《中国慈善家》杂志发起，慈传媒、正和岛主办的“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将围绕“国际家族企业传承趋势与成功经验”、“家族精神与百年家族”、“建立中国特色的家族[财富管理](#)与家族财富办公室”、“家族财富与慈善”等议题展开讨论与分享。

《中国慈善家》名誉社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说，如果不和创新、创造联系在一起，不和善联系在一起，家族财富的永续传承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的企业家先要当好企业家，再来当慈善家，不能让苗助长，如果挣了不义之财做慈善，这不叫慈善，这叫伪善。”他说。

以下是文字实录：

徐永光：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刚才曾先生问我，这样的会议在中国是不是第一次？我说这么大规模的肯定是第一次。这个会议叫“家族财富传承峰会”，它定的主题是“家族进化的命门与密码”，这个主题很吸引眼球，同时也很精准。

世界上有一个家族大家都比较了解，这个家族的财富传承已经到了第六代，他们依然是世界显赫的财富家族，但是这个家族更大的影响是用财富的力量改变了世界。这个家族造就了112名诺贝尔奖，这个数字大家听了有点儿吃惊，就是洛克菲勒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建立了一个慈善王国，他们有70多家慈善机构，在1891年洛克菲勒建立了芝加哥大学，这个大学造就了87名诺贝尔奖，主要是经济学方面的。1901年洛克菲勒建了洛克菲勒大学，这个大学造就了24名诺贝尔奖，主要是生物工程方面的。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从40年代到70年代在拉美和亚洲一些缺粮的国家推出了“绿色革命”，解决他们的粮食品种的优化，首席科学家也获得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说“绿色革命拯救了缺粮国家10亿人的生命，这个家族造就了112名诺贝尔奖”，我们的清华、北大们要反省一下了。

现在老洛克菲勒在世的还有一个孙子叫大卫洛克菲勒，今年正好99岁，是一位[银行家](#)，他还是美国福布斯财富榜里面名列前茅的。洛克菲勒家族财富传承正好验证了中国老祖宗的一句话，来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就是祖上做好事一定福泽后人。“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有灾祸了。慈善的传承和家族财富的传承是一个家族传承的很重要的密码，洛克菲勒家族财富的

传承让我们看到家族的财富要代代相传，我看应该有三个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元素是家族文化的凝聚，这些家族有自己传承文化的密码。第二个元素是家族慈善的传统，他们一定会拿出一部分财富做慈善；第三个元素是家族信托管理，那么我认为这三个密码当中前面两个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必备条件。

家族文化、家族慈善是必备的，而家族信托是一种方法，可能用家族信托的方法对于财富的传承会更加有效。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一些技术问题。家族财富传承主要不是讨论怎么造就富二代，刚才李君如先生也讲到了，我们要讨论怎么样培养创二代、创十代，善二代、善十代，我相信如果不和创新、创造联系在一起，不和善联系在一起，家族财富的永续传承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36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 2014 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国大路不包括港澳台，光中国大陆富豪上榜人数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在美国之后。两年以前，比尔盖茨到北京把我和王振耀先生到他的办公室，当时比尔盖茨对我说，在中国让富人捐财产比在美国让富人捐财产更容易，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因为美国的富人大部分是财富的继承人，他们有一个大家族，很难决定他们的财富的安排，而中国的富人基本上是财富的第一代创造者，所以他们能够自己做出决定。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我对盖茨先生说，不要着急，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家先要当好企业家，再来当慈善家，不能让苗助长，如果挣了不义之财做慈善，这不叫慈善，这叫伪善，就像大家最近关注到的上海福喜这样的企业，不仅祸害中国人，还祸害了肯德基、麦当劳，今天中国的企业家能够给我们大家提供安全的食品，不污染环境，不制造矿难，不制造尘肺病，这就是最大的慈善。中国的富人当然要做慈善，首先第一你们要学习怎么做慈善，不要以为我赚钱那么难都会赚，难道我花钱还不会吗？告诉你，做慈善要把钱花好真的不容易。王石先生说做慈善花钱比挣钱难多了。现在有很多培训班，希望我们的一些富人也参加一些慈善的培训班，把你的 1 块钱能够花出 2 块钱的效果，如果你不去学习，乱花钱的话，1 块钱可能只花出 1 分钱的效果，甚至是负数。所以，这次峰会上我还有机会和几位来自于美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企业家、慈善家一起讨论家族怎么做慈善，怎么样把做慈善的钱花好。谢谢大家！

来源：金融界

地址：<http://biz.jrj.com.cn/2014/07/26104217681692.shtml>

[【返回目录】](#)

刘东华：民营企业家只有善终 才有资格考虑传承

正和岛创始人、《中国慈善家》杂志出品人、慈传媒董事长刘东华说，善其终，是今天我们国内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自己怎么活下去，前一段[马云](#)也说过，说民营企业要善终很难，刘总德高望重，联想的缔造者柳传志很大的追求是联想怎么能够善终，民营企业家如何善终？所以，大家在这方面首先想让自己这一代能够活的好一点，然后才有资格考虑如何传承。

以下是文字实录：

刘东华：

尊敬的君如主席、永光老兄，尊敬的来自全国、全世界的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昨天晚上我们就拉开了一个小小的序幕，在中国院子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晚宴和一个序幕式的论坛。昨天易中天老师提出了家族财富传承为什么，传什么，怎么传？我也想问问几个为什么：

第一，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论坛？刚才君如主席说，正其时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民营企业家的20多年了，到了一个传代的时候了，往后更广阔的背景想一想，所有生命最大的恐慌、最大的恐惧是死亡，最大的渴望是传承、是放大，可能人类当中比较杰出的群体知道死亡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总要想各种方式方法能够传承生命的能量。所以传承是一个所有生命，尤其是人类高级生命，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永恒的需求。

第二个为什么，大家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刚才我说来自全球的各位贵宾，但是来自全国的大家熟悉的企业领袖们现场并不多，但是来自全球，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美国比较多，为什么？这说明家族企业的传承在大陆第一是刚开始，第二大家也不太有信心。善其终，是今天我们国内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自己怎么活下去，前一段马云也说过，说民营企业要善终很难，刘总德高望重，联想的缔造者柳传志很大的追求是联想怎么能够善终，民营企业家如何善终？所以，大家在这方面首先想让自己这一代能够活的好一点，然后才有资格考虑如何传承。

第三个为什么，这个更残酷，这个主题主要是我确定的，“家族进化的命门与密码”，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泱泱大国几千年，几千年来的瑰宝，中国人创造的各种瑰宝太多了，哪些传承下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族有多少应该传承的美好东西、了不起的价值没有传承下来，中断了、夭折了，有些流传出去反而扎根了、生长了、壮大了，那个命门是什么？那个密码是什么？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为什么。

刚才我说了几个为什么，传什么？我也斗胆问一句在座的朋友，不管是你所在的家族企业，每个人都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家庭的家庭成员，你觉得你们这个家庭，或者家庭背后那个家族最值

得传承的是什么？有多少值得传下去的东西？仅仅是物质财富吗？财富最多果。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八个字，叫圣人为因，常人为果，我们只是想传那个果，如果有一点儿果那个果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把因弄明白的话，那个果能传得下去吗？传什么？什么是值得传的？当然，在互联网，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精神上、思想上，包括价值观方面的价值已经很多了，通用价值已经可以淹死人，当然我们要传文化、传灵魂、传道德等等，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灵肉一体的载体，一个生命体，我觉得企业就是一个生命体，不是生命体的企业别说传，一代而终都不荣誉，非常容易夭折。什么是值得传的？值得传的从道到术，从文化到制度到方法，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生命体？我觉得那些传承的比较好的，今天的在座有很多华人传承的榜样，也有一些美国的西方的全球传承的榜样。为什么、传什么都解决的比较好，怎么传当然也很重要，包括刚才永光老兄说家族信托等等，我说这个世界上已经越来越不缺方法了。

去年在巴黎商学院跟一个领导力老师在交流的时候，我当时提出一个观点，我说哲学家每天都在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经理人每天都在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领导者，真正的企业家解决的是在为什么当中找到怎么办的强大动力，并能够对最好的结果负责的人。

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把为什么问的比较清楚，在为什么当中找到怎么办的强大动力，然后对最好的结果负责。从我们的家族传承到家族进化，社会传承到社会进化，我觉得都已经到了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认真面对，而且不但要做的比较好，还要贡献越来越多的价值的时候了。今年这个家族财富传承峰会是第一届，我们会一届一届把它做下去，而且我们会用一系列创新的方式。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国内外各种传统的，做的最成功的论坛也都在走下坡路，因为移动互联时代大家获得智慧，获得这个世界上最杰出人士的思想已经变得非常的容易，用不着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各种成本，像今天非要见面，除非价值大到不见面不可。所以我们除了每年一度，像今天这样让大家非见面不可，提供非见面不可的价值之外，我们会用各种创新的方式让大家随时随地的交流，把这个话题一方面探讨好，另一方面把它实践好。

最后，预祝大家健康快乐！预祝我们的峰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来源：金融界

地址：<http://biz.jrj.com.cn/2014/07/26104417681703.shtml>

[【返回目录】](#)

曹慰德：钱越多问题越大 财富必须要有目的

新加坡万邦集团主席、曹氏家族第四代曹慰德说，财富是资源，财富是目的，你把金子、钻石交给了猴子，它不是财富，给它一只香蕉反而更好，没有目的的不是财富，钱越多问题越大，所以财富必定是有目的的。

以下是文字实录：

曹慰德：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家族进化的命门跟密码跟慈善的关系。刚才刘先生也讲过了，昨天晚上探讨已经开始，昨天晚上易教授问我们企业家为什么传承，传承什么，再谈怎么传承？早上我跟一位二代苏总聊天，他问我什么是成功？刚才也听到了很多的演讲，也问了类似的问题，我一直坐在那边听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希望谈一些我的感受和看法，希望大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很有规律，但反正我们是在探讨嘛。

为什么传承？刚才还谈到了每个人要传承下去，因为中国人有句话叫“天命之谓性”，人性的问题，不是人性，所有的万物都要持续，都追求怎么传承下去。传承为了什么？进化。今天这个题目非常大，什么是进化？命门在哪里？这个题目今天早上提的非常高，我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有些人生出来就知道要持续，我们追求自由，希望达到自在，这是天生的。我们就要走这条路，怎么走这条路？我们要找到快乐，找到自在。所以我们心里已经告诉我们要走哪一条路。这个题目本身讲到根基，讲到人性的问题，中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国家，中国人在境外传承的主要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 worldview，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因为我们在境外生活，文化必须得跟本地接轨，我们带过去的是中国根基的东西，中国的 worldview。所以，我对中国的了解第一个就是中国的 worldview，它教给我什么呢？中国人跟外国人有分别，外国人很重视哲学思想，思想是物质文明的开始，思想创造一切。中国人探讨的是创造，探讨的是无跟有的关系，探讨的是境界。我们中国人很少说大是什么思想，而是大是什么境界。持续进化，进化的命门就是境界，这是我的看法，进化就是境界，就是觉悟。当然，家族是很重要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学到这个世界的文化，爱就是等于开始。我们生出来，一切的物质文明都是从家族开始的，第一步受到的爱也是在家族里面。当然家族很复杂，常常用爱的名义把我们的所有恐惧都交给我们的孩子，要保护他，这种问题很多，所以家族里面的关系非常复杂。

财富是什么？财富是资源，财富是目的，你把金子、钻石交给了猴子，它不是财富，给它一只香蕉反而更好，没有目的的不是财富，钱越多问题越大，所以财富必定是有目的的。这里面我们就

要考虑目的是什么，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的，刚才说了人类的目的就是进化，我们看到人类的财富积累是什么呢？人类积累的财富有物质文明需要的公路，还有知识的财富，还有精神文明，做人的智慧，追求的是人类境界更高。你想想，一个愤怒的人迟早有人倒霉，一个心平气和的人哪里可以打仗呢？没仗可以打，这样才天下太平。所以，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些问题，进化的是人类整体的境界，如果一个家族里面的进化到了领导的境界，一个家族的进化希望每一代出领导，这是一种进化。组织也是一样，组织只能做出领导的境界。探讨传承，我们是怎么传承的呢？其实传承很自然，你不要传，已经在传了，你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在传了。

我的儿子是科学家，他现在在研究未生胎儿在肚子里面的脑袋发育，就是你还没有生的时候，你母亲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传给你了。大家知道有DNA，DNA自己可以改，已经证明了DNA是可以变的，DNA从血统里面可以传下去，所以传代是自然的，你不传也得传。问题是如果我们悟到了这个，如果我们的境界高了，我们悟到了更多，我们就知道怎么传。有一个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谁想领导我们，死了几千年还在领导我们的人，他们在跟我们说什么，他们说不要恐惧，走爱之路，爱之路才可以达到你的人生目的，达到自在、达到快乐、达到进化。密码就在这里。我试过天主教，也试过佛教，也试过道教，一方面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佛，这是中国亚洲的思想；天主教说你信我的，我说你看你们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是人类进化的命门，都是人，密码在里面。本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家族企业的传承的经验，时间不够，下一场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这么多的演讲，这么多的挑战谈这个问题，分享我这个感受来探讨可能更好。

中国家族财富传承跟家族进化的命门是我们要考虑的真正的焦点，中国文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一定要相信，我们要看一下别的文化，才能真正看出我们的文化差异和中国真正的密码。命门是一样的，密码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过程。

家族企业刚才谈过了，我创办了家族企业亚太区的分会，也跟其他的国际的研究家族企业的[基金](#)合作，很多企业都是三条腿，一条腿是家族的管理，一条腿是企业的管理，还有一条腿就是爱的管理，就是慈悲向上的心是怎么的？怎么进化我们的爱心？就是爱人类，对人类之爱。离开了家族怎么爱人类？要培养，要修身养性，希望我们慈悲善心。你写了很多支票送给人家，有好处吗？当然有好处，对你有好处吗？培养了心里面的感觉，心灵的净化。我们做了慈善进化了我们自己，每个人有自己的路，除了爱自己的家族，爱自己的家人之外怎么爱人类，再能够修身养性，最后自己达到快乐的目的。慈善就是我们的命门，是我们进化的密码。所以家族企业三条腿走路，一条腿、两条腿，三条腿爱的管理、家族的管理，企业的管理，西方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一个印度的家族第三代说我们来是没有的，去也是没有的，怎么用？他们全球有75个家族的成员在里面工作，不停地产生新的东西，因为他们有宗教的背景，慈善就是在他们经营实业里训练爱自己就是爱别人，培

养别人爱自己之心，所以体系跟西方的很不一样。我们要谈到家族，尤其是企业家族，家族有很多，有些是军人家族，有些是文化家族，有些是企业家族。

日本最老的企业 1300 年，46 代了，这个企业有个故事，昨天晚上我说了，叫法师温泉酒店，过了 1300 年有多少间呢？还是一家。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地区有瘟疫，很多人在生病，他在山上找了一个温泉可以医这个病，所以很多人都来这个温泉医这个病，人越来越多，他照顾布勒，他就下山到一个小村里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牧像，这个人就搭了一个棚来照顾病人，人越来越多就变成了旅馆。有一天法师跟他说我要走了，这个温泉是大家的，你要发展好，你要保护好，他就谢谢这个法师，一守就守了 1300 年。他的后代知道是这个法师给他们的福利，因为住住这个温泉，不仅给了他们生活方式，还给了家族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很好，去培养他们家族的和谐，心灵的爱，住在那边的自在，所以 1300 年后还只是一间法师酒店。那边的酒店都用这个水，当水源不足的时候，大家都在减水，它永远持续跟的自然合一，1300 年。修总问我什么是成功？我说成功是需要谈判的，谈判到大家找到一个点，接班的人、离去的人都达到自己的成功，大家有一个东西是一致的，就是人性，我们追求一天离自由自在有多远。谢谢大家！

来源：金融界

地址：<http://biz.jrj.com.cn/2014/07/26110717681786.shtml>

[【返回目录】](#)

汤敏：国企应是最大社会企业 不能只想着赚大钱

《凤凰公益先锋》栏目第十八期：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专访，以下内容为本期节目采访实录。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 全世界都没有搞清楚

主持人李非凡：洛克菲勒基金会在 04 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 Impact Investment 的概念，但我们有一些翻译成社会影响力投资，有一些是社会价值投资。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汤敏：我觉得这个从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一个翻译问题对吧，在英文里面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变成两个东西。但是在中国有一点风险，风险都是什么呢？大家都是望文来生字。然后就是看这个字，自己就根据这个字去想象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没有人去认真研究这个定义对吧？其实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价值投资都是一码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些社会企业，社会价值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等等的都是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说是在全世界都没搞清楚。比如说社会企业

的问题，我专门查了一下，大概有40多种定义。

主持人李非凡：这么多？

汤敏：在每个人里头有不同的定义，有官方定义，非官方定义，学者定义。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才有10多年的历史，他跟企业不一样，企业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这个社会企业是企业与慈善之间的一个东西，大概有10多年的历史，10多年的历史里头，学者还在探索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混乱或者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解说，我觉得这个也不奇怪。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想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特别不能就是说按照这个名词我们来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应该去真正去了解他背后真正的定义是个什么？

社会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 但需要盈利

主持人李非凡：说到社会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看来，社会企业可以分红吗？

汤敏：我觉得分红不是一个最核心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社会企业的定义就是社会企业不分红的，比如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他的社会企业定义就是不分红。

股东最多的只能拿回他的原始投资的成本，他有这么一条规定，有些更严格的就是说连成本都不能拿，就跟捐助一样。但是也有的认为是可以分红，但是这个肯定股东不是追求分红最大化的，否则您跟企业有什么区别？分红不能太高，比如说跟社会平均利润或者说跟银行的存款一样，这个它也叫“红”，但是这个“红”跟一般企业的“红”意义并不一样，如果跟它完全一样的话，这个企业他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它就不是社会企业了。

社会企业是什么？社会企业是他追求他的社会的一个目标的最大化，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他不同企业有不同的追求目标，有的是环保的，有的是扶贫的，有的是怎么解决弱势群体等等。就看他这个企业的目标是什么了，他跟企业最大不同是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他的主要目标，而社会企业是追求这个社会价值的目标最大化为他的追求目标。

那么社会企业跟公益不同，就是企业两个字。企业是指它用企业的方式来做，第二个至少要自负盈亏，能够滚动发展。也就是说要有点小的盈利，它并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

所以社会企业是在公益和企业之间的，跟公益不同的，就是他是用企业化的运作，他至少要自负盈亏，而公益他完全得不断地靠捐助，社会企业跟企业不同，就是他不以追求利润化为最大目标，那么他跟他相同的是他还是用很多企业的运作方式，所以把这个想清楚了以后，至于分不分红，分多少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就比较清楚了。关键就是你是不是以社会目标最大化，当你的社会目标跟你的企业收入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你以哪个为主，这个是社会企业跟一般企业的最大区别。

只想赚钱就别做社会投资

主持人李非凡：现在有很多社会创业者，他们不愿意在社会企业里进行分红，可能怕舆论上的

道德猜疑。如若坚持不分红，会不会对社会投资，乃至之后的上市，包括社会企业交易所的建立造成影响呢？

汤敏：对，首先第一个，有社会企业，他周围就一大批。比如说有的社会企业，那么做这个社会企业的人就叫社会企业家，投资这个社会企业的叫社会投资者，投资这个基金叫社会投资基金等等。做社会投资，首先就讲清楚，什么叫社会投资？社会企业的投资同样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你的最大目标。如果你还是追求利润化，你就不会投资这个，那我就投利润最大化的，我投资企业去了，他一定不会去投社会企业。

所以凡是自称为社会投资的，那么这个基金一定不应该以利润最大化或者分红最大化为投资目标，一定是以某个社会目标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为什么投这个？因为我是看着社会目标达到的为达到，达到好的我就给他投，没有达到我就不给他投。所以分红不分红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我是一个投资，投资我起码得保本，因为否则的话我就跟捐款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我要保本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企业，如果他一个最低限度像尤努斯说的，如果能把本拿回来，我是一个投资，我投资进去，你把某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我是个投资，我至少得把本拿回来，因为我本拿回来我才能再投一个或者继续支持你。

如果有一点小小利润，我这个投资还可以大一点，那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么我就更高兴。那么这一点多出一点的是不是叫分红，你也可以叫他分红，你也可以叫他适度的收益。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冲着分红来的，冲着分红来你就冲着企业去，同样社会企业的一个股票市场。那么所有投社会企业股票市场的人，他也不是冲着这个股价，也不是为了升值来的，要冲着升值来他就到一般的股票市场去，他不会到社会企业市场去。

设置社会企业交易市场 可以有效评估好坏

那么他非什么要来投资，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股票市场呢，社会企业有一个股票市场来交易，这个交易第一个目的不是为了增值是吧？所有投股票市场的人在股票市场，上市的人，他都不是为了这个金钱的利益来的，大家都是为了某个社会的目标来的。他为什么还有一个交易所呢，因为我们有一些社会投资者，说我要出厂，我突然这笔钱我需要了，我要把他抽出去，就另外的社会企业家他就投进来。就起到一个滚动流动的作用，如果不滚动，不流动，他又跟捐款没有什么区别了。我这笔钱我把他放进去，永远不能抽回来的话，那我就跟捐款有什么区别，又不分红又不什么，跟捐款没区别是吧？

如果是社会企业，他对股东之间可以换是吧？今天我有笔钱，我愿意做点好事我投进去，后来这笔钱我需要了，另外一个人我要抽出来另外一个人进来，继续来支持这个事情，把他做好他。那么这个就起到了一个能够有更多的人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所以社会企业对股票市场或者交易所，

他的目的不是赚钱，他的目的是让股东有一个流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一部分钱抽回，这是第一目的。

第二目前就是说，有了一个交易所，我就可以评估好坏，比如说我有一笔钱，我想支持社会企业，我支持谁，我不知道谁好谁坏，谁有效谁比那个效率更差，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交易所，有几百个，有几千个社会企业在里头，那么社会企业交易所，那么第一个要有很严格的透明度，有很严格的标准。第二个他一定要有一个社会指标，在社会企业交易所里头，他一定有一个社会指标。

这个社会指标来区别哪个社会企业作得好，哪个企业做得差一些，那么作为投资者有这么一个企业我就投资进去，这个投资者就不需要到处自己去找，还要自己去评估，有一个市场就自然给你解决了。所以社会企业交易所的目的是这么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搞清楚以后，那么分不分红是不是社会企业交易所一定能成立不成立的基础，这个就不重要了。社会企业交易所可能就是一个交流，就是一个退出进入机制选择了一个机制，如果完全不分红的话，那我就是原始资本进出也行是吧？如果有一点分红，那我还可以稍多一点，多一点那就更好。但是这个分红，这个利润肯定不会商业利润更高。那么如果你想赚钱的话，那你到上交所，你要深交所去，就别到这儿来。

社会企业交易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市场

主持人李非凡：从很多言论看，您是个坚定的社会企业上市派。我个人担心一个问题，如果社会企业上市的话，会不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左右，会不会演变成社会企业最终为资本市场去服务，有这种担忧吗？

汤敏：第一个社会企业交易所，一定是跟其它交易所是分开的。是一个单独的，全新的规则，全新的方式，全新的人，全新的企业，全新的对这个给予关注的媒体，这些是全新的。

主持人李非凡：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是一个误读，对于社会企业交易所来讲？

汤敏：他只是叫了交易所这个名字而已，他并不是说是在上交所里头或者在深交所里头的一部分。他可以落在那个地方，比如在旁边再做一个，但是他一定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规则。否则的话你跟他搅在一起肯定搞乱。

主持人李非凡：英国，新加坡都在试图建立，或者已经建立了社会企业交易所。他们是如何去架构这个场所的？中国该怎样去构建？

汤敏：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他实际上是个虚拟的，他不一定说要实体地方，一定要有穿着马甲在那里跑的这种。他可以是个虚拟的，第二个呢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小众化的，他肯定不是个大众化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头追求社会目标最大化，总是小部分人，小部分的资本，小部分的企业，他是个小众化的。他就等于我们很多很多的，交易所有大的交易所，还有很多小的交易所，这些小的交易所在他们自己一开始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成员自己自娱自乐的，我们自己也愿意自己来股权换。那么慢慢，慢慢才会做大，包括新加坡的社会企业交易所，包括我们正在筹建的这些，他们

也都不大，都刚刚开始。如果整个社会企业才有1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社会企业交易所只有几年的历史，所以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价值目标可以被量化

主持人李非凡：刚刚提到社会企业的交易所，会设置一个社会目标为前导，但很多人疑惑，这个社会目标该怎么样去量化，怎样去评估？您有什么好办法。

汤敏：社会目标跟其它目标一样，都是可以量化的。有人就曾经说过，说这个体温啊，说这个温度啊是绝对量化不了的。因为温度是感觉，我觉得很热，那个人说我觉得不热，我觉得太冷，这个东西不可能，在温度剂没有发明之前，人家认为这个温度是不可能量化的，因为他是个人不同的感觉。最后出来一个温度剂，大家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包括社会财富，现在有了上市企业的价格，我们现在有GDP。在过去认为这个东西衡量不清楚了，GDP也是1930年代的才慢慢出来的，你看社会这么多阿猫阿狗都在交易，什么都交易。他怎么可能衡量出来。而且把一个国家，把他都做成一个数字，他觉得不可能的。

有什么比经济的活动更复杂的事情，最后发明一个东西，他也能衡量，社会影响力或者社会指标一样是可以的，现在实践已经有很多了。只不过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标准而已。

首先第一个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把他量化的，我把他叫Index，我把它变成一个指标，你比如说KPI，就是现在很多企业用的KPI。这个企业的KPI，实际上他不仅是一个利润的这个数字，他又包括企业的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等等，这个KPI里都有是吧？他也能把他量化出一个指标出来，社会企业其实现在最简单的，我就按照KPI的指定办法，到时候我就把利润最大化的那部分把他加强某个社会目标最大化，比如我这个是要创造就业，我这个企业是为了创造大量的就业。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把就业指标当成我最重要的只消，就跟一般的企业把他的盈利指标当成最大的指标，我这个企业是以环保，环保可能我以减碳为他最大目标，那我把这个定位为最大目标，我用这个来衡量。无非就是把各个目标的权重变一变而已。现在就是几个指标，一个是经济指标，一个是效率指标，一个是效果指标，一个是社会指标。所有的企业其实都有这四个指标，只不过企业一般的企业把这个经济指标，权重放得比较大，这些放得比较小，社会企业把这个公平社会影响力，我把这个放很大，这些权重变得比较小，这个一样可以做出来。

国企应该是最大的社会企业 绝不能只想着赚大钱

主持人李非凡：在您看来社会投资的主体应该是谁呢？

汤敏：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是说国企应该是最大的社会企业。为什么国家有办国有企业？如果国家办国有企业是为了赚大钱，那么这个他就可能跟整个社会产生冲突了，因为国企相当部分是垄断型的，垄断型的企业如果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话，他一定会损害社会的利益，这个很多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证明的。这个经济学已经有很多的理论来讲这个事情了，所以国企不应该以他的利润最大化为他的目标，国企可以保值，可以增值，但是不能够把增值最大化作为他的目标。

中移动 中石油的利益最大化 损害社会利益

那么我为什么要办这个国企？国家为什么要办这个国企，说我为了某个战略目标，说我为了某个社会目标。是为这个目标最大化，是作为我办国企的一个最重要的他的目的，那么也就是说我国家，我社会来衡量这个国企，我得看他这个而不是看他赚多少钱，看他翻了多少倍，如果把国企，都把利润最大化的话，那么这个国企肯定最后跟社会就是产生很大的冲突，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移动，对中国石油大家那么大意见，就是他为了追求他的利益最大化以后，他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国企就应该是社会企业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投资者也可能是国家，那么国家跟社会都可以投资，但是这个国企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把他放在一边，如果是一般的社会企业的话，就应该是对社会有兴趣的投资者，他也可能是个基金会，也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个企业，或者企业拿出一部分来做这个投资。

在国际上一般说来他是以个人，以企业，所谓企业是民办企业，民营企业，以他为主的这个投资。往往就是他企业每年会拿出他的一部分利润专门来投这个社会企业。但国家显然不应该去把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把它作成他的最重要的目标。把他做成他最重要的目标，这就很危险了，因为他就很可能把国企整个引导到跟私人企业一样，最后把我们国企的改革就会混淆了。

垄断企业由财政投资 应满足全民的需要

主持人李非凡：现阶段来看，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权重中占得比例非常大，这个时候让它去追求公益性而忽略效益的话，会不会这个过程很艰难？

汤敏：我觉得第一个不是让他忽略效益，他还得要保留效益是吧？他要保持效益，他要能赚钱，他至少要保值，这是第一个。

公益他当然应该有组成人员，为什么要做国企，为什么国家全民要拿钱来投这个事情，你要满足全民的需要，全民如果是为了你赚那点钱的话，可能国企赚的钱我用民企的话，收得税比你赚的还多。那么所以这个之所以用财政代表全民的对它投资，他应该是要满足国家的利益，我要满足国家的目的。

主持人李非凡：出资人的利益。

汤敏：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所谓公益不是个笼统的，我要办这个国企，那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目标，他跟那个私人企业不一样，私人企业就是一个利润目标，这个比较清楚，但是公益目标他就是有多元性的。那么办这个国企的目标是什么？先把他想清楚，然后怎么样衡量他做得好坏，得用这个方式来。

主持人李非凡：现在很多官办基金会，资助型基金都想做社会投资，这种现象合理吗？

汤敏：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得一个一个现象来分析是吧？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存在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多的社会领域的需要解决，紧靠传统的社会公益慈善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企业跟一般的公益慈善最大的不一样，因为就是他借用很多市场的手段，所以他效率比较高，而且他影响面比较大，规模可以滚动的比较大。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即使是关办公益的基金会，他们愿意去做实业社会企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具体他做什么，那个事做得好做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跟做企业一样，他有的企业能赚钱，有的企业还赔钱呢是吧？那没办法，你做企业就有风险。实际上就是纯公益，他也有风险，只是说社会上那个风险看不清楚而已。

社会企业在中国目前没有任何税收优惠

主持人李非凡：在现阶段一些人用社会企业欺世盗名。该怎么样建立机制来区别究竟这个是不是应该投资的社会项目呢？

汤敏：那么这个里头首先第一个我们社会本身对社会企业有一个误区，我们社会企业没有得到任何税收的优惠，我自个儿叫一个社会企业，我并没有得到你社会任何的什么。所有社会企业目前都是按照企业来注册的，该交税的交税，该干什么的干什么。

主持人李非凡：咱们现在还没有专门的一个社会企业注册的地方。

汤敏：没有社会企业注册，所以我叫个社会企业，我没得到社会任何优惠，我认为我做了好事，我认为我把这个做了，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来去指责来挑剔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个很多的娱乐，很多的公众，对这个不清楚，你觉得用了社会两个字，你就得要做社会公益，但是这是他们自己不清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有一些社会企业，用的是比如说用了民办非企业的，民非的方式来做，但是您看看民非的税收优惠的话，只有什么国家给你投资的，什么得奖励的，您办幼儿园了，这种的才有一些优惠。凡是没有得到国家的税收优惠的，我觉得对这些企业过多苛刻的要求，这个本身我们社会就不公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得到社会税收优惠，那么你就得严格按照民办非企业的规定来做，那么民办非企业，包括他的分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按照他来做，第三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领域，谁都不清楚是吧。

那么有人愿意，说我避嫌我不愿意做，那是他的自由，那么有人愿意说我就要创新，我不怕捱骂，我就愿意去做。那也是他的自由，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缺乏或者说创新的不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鼓励各种方式头要去试去。

公益市场化的定义不清是造成争论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李非凡：最近徐永光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引发争议，公益市场化的话题。反对者的核心观

点是，中国正在把 NGO 驯化成一个完全的公益承包商，从而忽略 NGO 与生俱来的政治色彩，您觉得目前为止我们需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吗？

汤敏：我看了一些社会上的讨论，关于这个社会市场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容易造成很多的混淆，因为什么叫市场化，就跟教育应不应该市场化，医疗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本身都是一个非常混淆的原因。首先咱们要定义清楚什么叫市场化，如果市场化就是说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话，那么显然社会企业不应该市场化，因为社会企业市场化的话，那他就变成企业了，叫社会企业就不合适了。

所以如果市场化指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这个显然不应该，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定义的市场化，指的是说能不能用一些市场的手段来做。比如说我能不能收一些费，能不能用这个市场的一些，比如说做营销的方式，做什么事的方式，如果市场的话指的是市场化手段的话，那么社会企业完全应该可以用应该市场化，因为社会企业本身他就得借用一大批市场的这种手段来做的。

但是现在你看看大家辩论的时候不清楚，骂那个不应该市场化的，指的就是你就把他利润最大化了。说我应该市场化的，就是说我市场的手段来做，实际上大家都用市场化这三个字，但是大家心里头想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然后炒得天翻地覆，最后实际上想得都是一个东西，大家都是同意社会企业不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建议用公益市场化一词 容易引发民众误读

最后吵了半天，吵得实际上就是定义不清楚，所以要炒得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定义各自先把定义摆出来，我们先看米的商业化定义是什么，我们再判断应该不应该商业化，把定义摆清楚了，其实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那么这个里头，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他们吵的双方怎么样，但商业化这三个字，在我们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被定义得很清楚了，或者说太有这个印象了。所以我建议不要过多的用这个商业化，因为你用商业化，不管你说得人怎么想，老百姓一般的社会公众，你是利润最大化，这样会造成一些误读。

主持人李非凡：政府，市场，第三方组织，在一个健康运作的社会里，应该以什么样的比例存在？

汤敏：我觉得是跟社会发展的程度，跟你的社会公益的发展这种国家的政策的引导，跟这方面有关的。不管怎么样，在中国这个领域显然是偏低的，跟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跟我们国家社会的需求是远远低于这个的。那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整个的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真正开放给社会的也是从汶川地震开始的，一共才有 5 年的时间，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因为这里头主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多民营企业的第一代，他刚刚正在爬坡的时候，所以他还没有想到这些，所以未来的 10 年。我觉

得中国的公益，不管是一般公益还是社会企业的公益，将是一个大发展的时候。

因为现在相当多的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怎么样利用好这笔财富了，也有相当多的社会专业人士开始放弃，或者说转到社会企业或者社会方便来，觉得自己做得以前的工作，他觉得想换一个方式了。所以我觉得未来10年，是中国的公益领域发展的最快的10年了。有可能有一天那可能不是10年，可能更长时间了，中国的公益慈善或者社会企业，可以世界的前面。

中国慈善捐助的税收制度不合理

主持人李非凡：今年全国两会，委员马蔚华《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被称为“最具‘含金量’”。2009年，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在宣布捐赠83亿元股权后，面临20亿的巨税，并未能将财产转移至基金会，引发社会对其“诈捐”的猜疑。2011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知难而上”，将市值35.49亿元股权捐给其家族公益基金会，缴纳税款6.72亿。若有成熟的公益信托，富豪捐赠将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公益信托法》在中国已经出台12年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案例出现，这12年来出台的落地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汤敏：曹德旺、陈华树他们的问题，其实不是金融的问题，也不是金融信托的问题。是税收的问题，是我们对慈善捐助的税收不合理，特别对股权捐助的税收不合理，所有的任何国家你要把你的股权，比如说把我的股权拿出去捐赠都得交税的，都得交的，就是税后你去那个。但是什么时候交，别的国家的规定是，我把我的股权捐到基金会里头，我捐了，完了这个你在什么时候开始交税呢，是你要把他股权变现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把一部分股权要把他卖了，我现在需要现金，卖的时候你交税，这个是国外的一般规定。

咱们国家是呢，你把这个股权交的时候就要交税，卖的时候交税是这个基金会在交税，现在是你捐赠者要交这个税，其实最终他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从这个股权里交得税，但是呢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模式就很不合理。那就等于捐助者，我这个股权还没捐给他呢，我先交一大笔税才能捐给他。除非我把这个股权现在马上变现了，我就一大笔现金了，我把他马上捐出来这样，那么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又不愿意把企业，就等于是我老板跑了，都卖了，我不控制这个企业了，我把他捐出来了。这个对企业也不利，老板也不愿意，对吧？对基金会也不利，对国家其实也不利。因为如果是好企业的话，他未来卖的时候再交税，那个税才高啊，因为股权在涨啊。

中国金融要是出问题 信托一定要出事

但是因为这个现象对中国太新了，我们过去在设计税收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出现，因为税收要改得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立法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个呢我觉得解决起来并不难，因为税，就是捐赠以后，您变现的时候交税这个更合理。

那就跟我拿了股票，我拿了股票马上交税没有这样的，都是我卖的时候再交税，你现在要捐的话，

你先要交税才能捐这个就不合理。你就等于把股权当成现金一样，这个就不太合理了，但是这个呢是因为这种现象太少了，我们过去没有考虑到这个，所以未来一定会这样改。这个跟公益信托无关，他并不是因为公益信托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我们《公益信托法》出了10几年了，到目前这个还不多。一个当然跟税收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公益信托并没有税收优惠，这个是一个，现在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出了一个公益信托的规定，但是很不细，所以到底他的权利什么的，这个谁来投、谁来监管，他是个人还可以，要是企业或者一个基金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特别合理，所以这个目前来说还没有很好的运作起来。但是已经有一些了。汶川地震的时候也还是有一些，已经做了，只是做得很不顺。

另一个就是他不仅是中国的公益信托，他是整个信托现在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现在如果要金融出事的话，信托很可能出一些事情。因为信托行业在我们国家，他也是历史并不是很长，那么公益信托的问题就是说，我委托了以后，这笔钱投到什么地方，他的风险大不大等等这也都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得慢慢来，特别是金融有关的话，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的。

若中国开征遗产税 公益事业将有巨大发展

主持人李非凡：未来若干年，中国或许会产生跟美国一样的遗产税，到时会有大批中国富人选择把慈善信托作为自己的公益事业的方式进行，现在公益信托是否正进入立法改进的过程，或者讨论的过程？

汤敏：这个我具体不是很清楚，那个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部分的，以后遗产税本身在社会上有很多争议，短期内也出不来，所以我们现在过多的去焦虑这个问题，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还没有这个必要，因为遗产税是一个大事。那么怎么收，收不收，怎么收更合理。这个呢是一个需要通盘的考虑的，他是一个收入分配的，更合理，整个的国家财产，居民财产，国家财产保护等等一系列的大事。当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是时间而已，早晚得收的，什么时候收，我觉得短期内现在还没有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议事事程，因为我们要改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紧要的事情。当然如果有了这个的话，那中国的公益事业可以往前大大走一步。

主持人李非凡：从今年年初两会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中国的热词，包括公益也在和它发生关系，现在网上出现了各种众筹的方式，公益组织用这种方法进行筹款有没有潜在的法律风险？

汤敏：因为你是众筹，那么在中国跟其它国家不一样，我们基金会就分成公募基金会，私募基金会，其它国家没有这个分界。很显然私募基金会就不能做这个重筹，否则的话你就类似非法集资的那种。当然你私募基金可以委托一个公募基金，跟他来做，你再怎么样的。如果这些捐助者，愿意定向的给你是吧？他通过公募基金他也可以转，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

私募基金会用众筹的方式募款 那就是非法集资

主持人李非凡：如何看待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筹款筹资的前景？

汤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力，因为跟我们一般老百姓想象的不一样，觉得发达国家主要都是大款，都是企业家的在捐助。当然捐助的总体数量比较大，但是实际上在国外在美国，大部分的捐助是小额捐助，80%的老百姓都有捐助，都在捐助，这个是大头，企业的捐助是小头。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都认为就应该企业捐，我只有指责的权利，我没有捐赠的义务。那么跟我们筹资的方式也很有关系，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公募、私募的这种区别，就造成了公募只是少数的公办的政府办的基金会才有公募的权利，那么政府办的这些公募基金会又没有这种激励机制，因为这个众筹很费劲，他要很创新，有很多很多人，那么对于政府办的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怕引起问题，抽了以后这个钱用不好，大家指责不得了，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所以造成了这种公募的缺陷，也不排除我们也有做得非常好的。比如说若干年前的希望工程，就把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这个也好啊，可惜这种好得太少了。

那么为什么少？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机制上的问题，但是这种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上的这种重筹的方式，很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主持人李非凡：您有过很多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实践案例，是否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做的一些心得和经验？

汤敏：比如说我在乐平基金会里头，我们做了几个社会企业，一个是北京郊区的保姆学校，我们这个叫扶贫的保姆学校，已经有两万五千到两万七千的毕业生了，做了10几年了，从02年到现在一直在做，那么这个学校也是一种社会企业，不断地滚动发展，那么他为贫困，每一个这些家政服务员，一个人出来就全家能脱贫，而且呢在帮助整个北京的很多家庭也找到了家政服务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社会企业，所有的股东从来没有分过红，所有的钱一直都在里头滚动。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办了两个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也是按照社会企业的方式，但是完全按照小额贷款公司注册，那完全是商业注册，那么我们完全所有的股东从来没有分过红，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所以我们这两个小额贷款公司，真正的在农村，现在全国9000多个小额贷款公司，基本都在城市里头是吧？我们这两个小额贷款公司真正是给农村在贷款。

那么这个里头也有一个摸索，也有一个跌宕起伏的，也碰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现在我们在走一个农业公司，也在探讨这种模式，有机农业公司也在探讨这种模式，就是有机农业，我们以前也在探索，那么这些都是社会企业，所有投资者，到目前为止都没分红。但是我们不严格一定不分红是吧？但是所有做这个事的人，所有投资的这些人，都没有想说赚钱，想赚钱绝对不会说去办这个事情。所以这些目前呢都是在做，而且也都是规模越做越大。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

们在友成基金会我们做了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教育这些就不是社会企业，就是比较公益的，但是他有很多创新，比如说我们把双十教学，把人大附中最好的中学的课本直接上到乡村学校里头，今年我们要上到一百个乡村里头，就是直接乡村学校的学生直接上人大附中的课，他们经过了半年，一年以后，成绩提高很快。

我们做得这个比如说创业咖啡，更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这个一个学期学分课，上个学期我们在70个大学里头在做这个，那么大学生有了创业的教育，他们就有可能未来出去创业。都不是传统的公益，都在做摸索，目的都是想较大规模的来解决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

来源：凤凰公益

地址：

http://gongyi.ifeng.com/xianfeng/special/tangmin/zuixin/detail_2014_07/21/37439180_0.shtml【返回目录】

许小年：自私的人才把公益事业持续下去

7月19日下午两点，“可持续的未来”——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两周年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发起人代表邓飞讲述他们发起大病医保的缘起与历程。

在他的感谢清单上，他说最要感谢的人是那些乡村孩子们，“因为这些孩子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除了愤怒的力量，我还看见爱和柔软的力量，我们可以行动起来，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社会问题。这些孩子就是我生命中的线索，让我有机会追逐和实现生命中的使命，我觉得我这样使用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大病医保基金政策顾问许小年随后上台讲话，主持人、凤凰网总裁李亚问了教授一个问题，说他读过一本许教授推荐的书单上一本书叫《自私的美德》，请教授谈谈自私与公益与美德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自私还会是美德呢？接下来，小年教授说了一番话，两度哽咽，令台上几百听众动容，掌声经久不息。

许小年讲话全文如下：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刚才，邓飞讲话的时候说到，他要感谢这些孩子，我听他的这句话就感到我们的可持续性有保障了，因为我们的可持续性就是来自于我们对孩子的感谢。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有自己的体会，我参加的公益事业的时间不是很长。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参与这些公益不仅是为了孩子，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以公益事业和自私没有任何的矛盾，

也只有自私的人才会把公益事业持续性的做下去。

道理在哪里?就在于我们对于自私的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事业,我先谈谈自己的体会,我是从512地震以后介入公益事业来,一周年的时候我和中欧的学生和教师资助了几个孩子就医。我去看孩子,一个女孩叫路路,还有一个男孩子叫阿贵,他没有双腿。他们正在外边做筹款活动,我在医院等他们,一轮明月挂在北京的空中,两个孩子看到了我,路路看到我开始哭,阿贵的眼泪在眼眶里,(哽咽,转身)

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人的信任如此之可贵,是一生难得体验到的几次,他们这种信任是无与伦比的。(再哽咽,转身)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付出一点的微小的努力,得到这么大的回报。我要感谢他们,他们对我的依赖和感谢,最主要的真诚的感谢,毫无阻拦的沟通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信赖我给他们带去帮助,这真诚的信赖带给我幸福和满足。

从那以后,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一样,我每一次出差都要去看他们,看到他们都觉得我的人生不一样了,我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能够享受这样的美好生活,远远超出在物质上、社会名声上得到的幸福感,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们,我没有对他们做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真诚和信任。这样使我的生命增加了意义,使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我获得了如此大的精神的享受,我没有道理不继续这项事业。

所以自私的美德跟公益事业根本不矛盾,关键是你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什么是幸福?做什么幸福,在这个社会上获得什么能够给你带来幸福,这个理解就能够很好的把自私的动机和公益事业结合起来。你只有把它结合起来,这个事情才可以持续下去。我们不必讲感到多大社会责任,说老实话,我没有那么宏大的社会责任,我想到的就是非常具体的路路和阿贵,他们信任我,他们真诚,他们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望,对我来说我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大的荣誉和幸福了。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路路和阿贵。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地址: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721/12765128_0.shtml

[【返回目录】](#)

熊丙奇：中国大学为何难获得企业家的捐赠？

近日,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 1500 万美元(约 9300 万人民币)的“SOHO 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时强调,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作为企业家,潘石屹拿自己挣的钱捐资,捐给谁,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一些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大学,是质疑错了对象,应该质疑的是,中国大学为何难以获得社会的捐赠,包括企业家的捐赠和校友的捐赠。

大约在四年前,中国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 8,888,888 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就曾在国内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却要把钱捐给耶鲁大学,网友们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不满甚至气愤。四年之后,网友们对潘石屹的质疑,与当年对张磊的质疑几乎完全一样,稍微不同的是,有网友质疑为何赚中国人的钱,却要去捐赠美国大学。

说实在的,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慈善捐赠环境,很多有意愿的捐赠者,不会在网友的道德绑架下改变自己的捐赠意向,成熟理性的慈善环境,应该尊重捐赠者的意愿,至于国内的学校、慈善机构如何获得捐赠,不是去指责捐赠者不爱国,而要反思自身的公益事业是否做得规范、专业。

我国大学相比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很不好。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而并不重视社会募捐,而就是获得社会募捐,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而国外大学,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方面,有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等。

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不会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可我国内地高校则不然,由于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被挥霍、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给内地的大学,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试想,时常听闻中国科研经费只有 40%用于科研这样的消息,有多少人认为中国大学缺钱,缺钱的大学会这样对待紧缺的经费吗?

就连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积极捐赠者也很少。大多情况下，一名学生从一校毕业之后，就与母校失去联系，只有等到有一天功成名就后，才会被母校“重视”。有一些高校担心学生一毕业就“人间蒸发”，还扣押毕业证书要求学生必须在离校前归还贷款。如此功利地对待校友，怎么可能让校友真正关注母校的发展？而美国大学，不但在学生求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权利，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就在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像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这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高达近70%），我国有哪所学校能做到这一点？

尊重捐赠者的权利，和尊重学生的权利是同一个道理，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只有每个办学者尊重学生的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不客气地说，我国当前的办学，并没有一心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而只是对政绩负责，我国大学在给学生奖助学金时，还采取“评议助学金”、“竞选助学金”等侵犯贫困学生人格尊严的做法，这都伤害大学的形象，但大学却没有采取措施扭转。这样的大学，能获得社会的捐赠吗？

来源：新浪网

地址：

<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4-07-25/10001958/1187989361/46cf47710102uxak.shtml?qq-pf-to=pcqq.c2c>

[【返回目录】](#)

王传涛：“慈善自由”的理念还需要普及多少年

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该企业CEO张欣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助学是希望更多中国优秀贫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学教育。23日，潘石屹也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

坦白讲，潘石屹向哈佛捐款，在当下的道德语境里，无论捐多捐少，都会遭到如公式般的质疑：一个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就应该在中国做慈善，把钱捐给中国人或中国的高校，捐给中国山区里的孩子们，捐给希望小学；更有偏激者认为，潘石屹此举是不爱国的，甚至于还是卖国的，好似弱国

小民的内心真得很脆弱式的。

之所以说这样的质疑是“公式般”的，原因是，近些年来，只要是捐款给外国慈善机构或是大学的国人与华人，都会遭到这样的质疑。因为，在质疑者的心目中，把钱给别人，就远远不如把钱给自己人。比如，2010年，某华裔毕业生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2011年，我国民营企业家馨稼向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该校伯恩斯工程学院开发清洁电池、太阳能以及可持续交通研究。而这些捐款，都被质疑过。

慈善自由的，正如道德也是自由的。一个人做不做慈善、如何做慈善，都是其个人自由，外人无权干涉。个人的捐款，与政府部门与公募组织的捐款很很大的差别，要区别对待，因为，个人的捐款，在没有捐出之前，没有附带任何的公共属性，别人也没有权利去质疑什么。更何况，为人家潘石屹也说了，捐款1500美元，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在美国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学生。

我相信“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的回应，是潘石屹进行的危机公关。而事实上，潘石屹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除了捐款属于道德自由的范畴之外，更为重要的，当下我国大学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捐款理由。哪怕是一个借口，也找不到。

当下的我国大学，一方面，背负着巨额的债务，有统计显示，我国所有的高校总共负责约4万亿以上，许多学校为了建设新校区，举借外债，而学校每年的营收却也只够偿还利息的。许多大学的校领导，面对巨额的债务，总是一拖再拖，想交给后来的校领导接过烂摊子，或者，想直接让公共财政买单，也想靠一些慈善家的善举来补偿一部分，但退一步说，无论是慈善家还是公共财政，都没有必要为我国大学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国大学严重的官僚化、行政化气息，造成了学术上的巨大腐败，学术不彰的问题倒在其次，关键在于那些所谓国家课题、重要项目的教育拨款，基本滚进了自己的腰包，即便要向我国大学进行捐款，这些捐款也未必能“用在刀刃上”。近日处于风口浪尖的厦门大学，其实不过是我国众多高校中的一个案例。当大学公信力丧失殆尽，你会愿意把钱捐给国产的大学吗？

慈善若无法实现自由，则慈善就会成为裹挟每一个人进行“强捐”的借口，我们的工资折里可能就会经常性被强捐几百元钱。再者，慈善不能回避现实问题，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捐款打水飘，每个人都想看到自己的捐款能够在透明的机制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一个社会只有宽容所有的“慈善自由”，并反思自己社会中那些不利于慈善发展的现实问题并着力解决之，才有可能把潘石屹等企业家的捐款由国外唤回国内。如果仅仅怀揣“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去进行质疑和责骂，则潘石屹们也没有回头的可能和必要。其他企业家亦然。

来源：新浪网

地址：

<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4-07-25/10461959/1505576400/59bd45d00102uycj.shtml?qq-pf-to=pcqq.c2c>

[【返回目录】](#)

Brian Tomlinson: 国际援助：探讨公民社会参与南南合作的可能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全球的关注聚焦于“南方国家的崛起”。南方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很多南方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卓越成效。

本文围绕“南方国家的崛起”同步出现的南南合作（SSC）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并细致地审视了有时被忽视的南方国家公民社会组织（CSO）^[1]参与南南合作过程所具有的潜力。文章主要基于UNDP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形成的报告撰写而成。^[2]

UNDP的这份报告从全球经验出发，对国际援助中涉及的一些广受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思考，并就政府与CSO合作开展国际援助可能形成良好实践的领域提供了建议。报告认为，南方国家在南南合作中，不应当只发展政府间的伙伴关系，还需要寻求和推动以公民社会为纽带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多元合作关系。

“南方国家的崛起”已经促进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多样性。南南合作这种新的援助方式，不只引入了新的参与者，同时还挑战了传统的北方和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模式并形成互补。有几个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度、南非、波兰和沙特阿拉伯，正迅速在南南合作中拓展新的角色和模式。据文献研究估计，截至2011年，南南合作投入的资金额度达到了172亿美元左右，并且每年递增。相比传统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ODA）数额止步不前的情况，2011年南南合作提供的援助金额达到了DAC实际提供的官方援助金额的14%，接近DAC援助中可规划的国家级援助（包括人道主义及食品援助）的25%。^[3]

南南合作的增长并非推动和影响全球援助结构演变和复杂化的唯一因素。过去10年，CSO作为重要的发展援助的行动者也蓬勃发展。据估计，每年通过CSO转投的资源在500至760亿美元之间，其重要性不容小觑，在数量上至少是当前南南合作援助金额的3倍，甚至可能达到4倍。^[4]

CSO参与发展援助，并非北方国家独有。在大多数南方中等收入国家，CSO一直是多样而老道的

参与者，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均创造性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它们主要和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或者北方援助国的 CSO 等外部资源方合作行动。在几个南方中等收入国家，如土耳其国内伊斯兰背景的 CSO，还同时动员国内资源参与发展援助。

许多南方援助国的 CSO 高度支持加强南南合作，而且乐于贡献出自身拥有的宝贵经验。南南合作伙伴国中的 CSO，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来自南南合作援助国 CSO 的知识和专业技能。

目前中国、土耳其、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几个参与南南合作的国家，正在审议它们的发展合作政策。迄今为止，南南合作中的主要合作方仍然以政府为主，但随着这个框架范围的扩大，也许现在正是对 CSO 参与发展援助的相关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以便为新的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时候。

CSO 能够给发展合作带来什么？

CSO 活跃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并在公共领域将千百万有着多元诉求的民众凝聚在一起。成千上万的组织在不同层面行动，推动发展、参与扶贫、使人民的声音在治理中更鲜明、并对人道主义危机做出回应。大多数 CSO 的工作很少直接涉及发展援助甚至毫无关系，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不断增长并高度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虽然历史上发端于北方国家，但现在也已经在南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在发展援助体系中维系着多种伙伴关系。

这些 CSO 组织形态多样，从大型跨国 NGO，到全国性 NGO、宗教组织、合作社、紧急救援响应、志愿服务组织、社区组织、工会、妇女权益组织以及人权保护组织等等，不胜枚举。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的大多数国际 CSO 会提供一系列的发展援助服务，有时是通过在当地设立项目，但也越来越多地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以及国家层面的 CSO 展开合作。发展中国家的 CSO 也越来越多地要求按照援助有效性原则（特别是国家拥有项目所有权原则）以及南南合作原则（团结、共有和不干预）来与北方国家的 CSO 合作。南方国家的 CSO 正寻求实现一种机制和安排，使自身能够取得领导权，并在长期筹资的背景下分享和协商决策权。

作为独立的志愿发展机构，CSO 会自行决定工作的轻重缓急，并相应开展项目和建立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官方援助的提供者也有着自己的目标、任务。那么资助方为何要决定通过 CSO 来执行援助项目，而不是直接将款项划拨给受援国政府来执行？与 CSO 合作，能够带来哪些潜在的优势呢？

研究表明，与 CSO 合作，能够在以下多个重要方面拓展、丰富和加深南南合作：

1) 提供服务。CSO 在服务提供方面与社区联系紧密，一些组织甚至直接在政府难以介入的贫困社区并肩工作。它们填补了政府项目未能覆盖到最贫困人群的空白之处，并与当地人民开创出应对问题的替代方案。它们能够针对政府可能难以触及的人群，以灵活的手段提供服务；

2) 人道主义危机救援的快速响应。CSO（特别是国际 NGO）能够针对人道主义危机做出快速有效的响应行动。在过去数十年内，它们对复杂的紧急情况已积累了协同反应的专业能力，拥有训练

有素的人员；

3) **为受冲突影响国家提供救援的有效渠道。**CSO 能够非常有效地为受冲突影响地区人群提供支持，而政府或者多边援助方则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束手无策。通过与当地组织和社区合作，能够重建社会关系和信任；

4) **分享专业技能。**CSO 具有针对目标国的特定的专业能力以及与当地社区和人群打交道的在地经验，能够帮助其他援助方以及 CSO 丰富自己的发展政策和方法，通过招募和支持基层的专业志愿者来提供专业服务；

5) **强化问责。**CSO 联合行动协助受影响社区和民众，要求各级政府对决策和项目担负责任，并提高透明度和问责，甚至可以成为反腐的重要力量。CSO 担当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与政府和多边组织合作，确定发展领域的标准、规范，形成有效的实践，确保它们与国际人权协议和发展的结果相符；

6) **扩大公众对发展合作的支持。**在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CSO 担负着引导民众关注全球议题的重要角色。将多元的 CSO 引入南南合作，能够大大增进公众对南南合作的理解，还能为受援国的民众提供志愿参与发展工作的机会。此外，向私营部门筹款也是 CSO 在援助国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援助国与 CSO 的伙伴关系：一些议题和思考

一方面，CSO 能够多方面参与并为发展合作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南南合作也有着自己的原则和方法，需要在其框架下思考如何更大程度地与 CSO 开展合作。数十年来，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的 CSO 已经嵌入到北、南国家之间提供援助的“资助—受助模式”并深受其影响。对中等收入国的政府和 CSO 而言，它们在南南合作中的伙伴关系，应当与上述模式有所区别。最为理想的情况是，这种合作是植根于共同的发展经验，并将这些不同的发展经验与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尽管 CSO 参与南南合作潜力巨大，但研究表明，能够将南南合作的官方援助框架纳入 CSO 中提供借鉴的经验少之又少。事实上，迄今为止，南方国家的政府很少与本国 CSO 通过对话来确定南南合作的相关议题，并探讨更多合作的潜力。尽管如此，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的官方援助机构，还是组织了论坛与 CSO 进行了更加包容的对话。为 UNDP 发布的这份报告所做的背景研究表明，随着此类对话的发展以及南南合作援助国开始考虑将 CSO 纳入援助政策，有以下重要问题值得考虑：

1) 法律和监管条件

作为发展领域的独立行动者，CSO 的有效运行需要有利的法律环境。南南合作的援助国和受援国想要在发展合作中与 CSO 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都应当认识并在其法律法规中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发展中国家对 CSO 的管制充满复杂性。很多国家的法律法规颁发于数十年前，已无法适应 CSO 的增长及其在发展合作中发挥作用的需要。在诸如巴西、印度一类的几个南南合作的援助国，它们

的法律是将自己作为受援国为前提来形成的。例如，巴西的法律体系并不允许巴西的 CSO 直接向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转移资金，极大地降低了这些组织参与南南合作，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受援伙伴提供灵活的资金支持的能力。

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CSO 正面临法律环境收紧、活动空间受到挤压的问题，包括强制注册、选择性执法、须提交繁杂的报告、限制 CSO 自主筹资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调查员 Maina Kiai 在 2013 年 4 月提交了一份报告，提请人们注意“在有关接受资金方面对 CSO 越来越多的控制和过度限制”。CIVICUS[5]发布的《2013 公民社会状况报告》列出了做出这种限制的 23 个国家的名单，指出在某个国家出台这种限制性规定后，往往发生其他国家竞相效仿的“传染效应”。这些规定通常针对本国 CSO 接收国外资金在国家层面上开展政策倡导和人权保护活动进行限制。特别调查员呼吁各国“改变观念，强调资助公民团体有助于多元独立的公民社会的繁荣发展，指出这是有活力的民主社会的特征”。他同时还提出，国家必须“允许 NGO 接纳国际资助。作为国际合作的组成部分，公民社会与政府一样，享有同等的参与国际合作的权利”。

2) CSO 的问责和透明

南南合作的援助国，特别是那些刚开始与 CSO 合作并缺乏相关经验的国家，由于对 CSO 部门缺乏了解而面临如何选择合适的机构进行合作的现实问题。CSO 也相应面临需要向各类支持群体提高项目的透明度，问责加强的挑战。

由于 CSO 非常多元，要建立一个标准化的问责机制非常复杂。然而在过去 10 年内，CSO 已经对这些挑战进行了回应。它们通过遵守全球公认的几大问责标准并发布报告的方式来体现问责。这些标准包括国际 NGO 问责宪章（International NGO Accountability Charter）、基于环球计划所开发的人道援助标准（Sphere Project's standards）、以及人道和紧急救援 NGO 指南（guidance for humanitarian and emergency relief NGOs），此外还包括伊斯坦布尔 CSO 发展有效性原则及相关实施指南（Istanbul Principles for CSO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and related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许多国家的全国性 CSO 已按照一些志愿的问责准则联合起来，确保相关框架的质量。

尽管这些志愿联合的机制仍存在欠缺，但依然有助于改进 CSO 的问责，同时通过足够的灵活度来保证机构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国际 NGO 问责宪章和几个国家层面的准则还通过同行审议的方式得到加强。许多 CSO 已在过去 10 年中，通过网站发布机构财务和其他信息方便公众获取，提升透明度。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还与其他援助方一起，被要求根据国际援助透明计划（IATI）的标准来公布相关数据。随着更多的 CSO 按照 IATI 标准进行信息公开，将为南南合作援助国汇集并比较 CSO 的项目

信息提供独特的机会。

然而，由于参与发展援助的各方差异很大，CSO 在透明和问责方面还面临以下特殊挑战：

在回应不同群体需求方面存在压力（包括对资助方、政府管理部门的法律责任，以及面对受益群体问责的道义责任）；

需要提交报告来满足法定的管理要求，回应 CSO 部门的志愿机制、机构内部管理流程以及合作关系维护等要求；

为主要受益对象提供 CSO 的数据和项目信息；

CSO 之间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它们需要公开更详细的项目和预算信息；

隐私保护问题。透明可能会导致一些 CSO 和个人（如人权保护者）处于不利境地。

为有效开展在地合作及项目执行，在南南合作的受援国，越来越多的 CSO 开始建立自己的行为准则。希望扩大与 CSO 合作的国家（包括南南合作的受援国及援助国）如果能预先了解 CSO 的优势和弱点，可能会事半功倍。

3) 与 CSO 合作的制度安排

迄今为止，南南合作中的援助国在选择采用何种机制与 CSO 合作提供援助服务方面尚缺乏经验。但援助国在探索合作选择时，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不同的制度安排（资助或政策对话）将对商议的合作结果产生影响。所有发展援助的提供方都将注意力放在确保接受资助的组织履行受托责任的最大化上面，这固然不错，然而在资助安排上，还需要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去对问责机制加以明确。同等重要的是，资助政策和相关安排的条款会对不同国家的 CSO 实施有效的发展项目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产生影响。

4) 资助机制

发展援助的资源可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入发展中国家的 CSO：

直接资助地方性行动（通常由援助国大使馆进行协调）；

对合作伙伴提供资助，由设在援助国的 CSO 对伙伴关系进行协调；

不同的援助国集中资金，统一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资助机制；

地方政府执行援助资源。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最常见的资助渠道，是通过主要设在这些国家的 CSO 和国际 NGO，与发展中国家的 CSO 进行合作。

在发展中国家的 CSO 看来，来自援助国（无论是政府或者国际 NGO）的不同的资助安排和对资金的管理条款，产生了以下特定问题：

限制对组织的核心成本提供支持，长期而言会损害 CSO 的可持续性以及 CSO 与支持群体的关系；

受到援助国（包括国际 NGO）对资助优先级次考虑的影响，地方 CSO 可能因对外部资金的需求驱动而做出项目选择。发展中国家的 CSO 通常很少能够参与援助国的决策过程，这会对当地 CSO 切实响应本土需求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本土 CSO 之间有时候会因竞争而影响工作成效，损害 CSO 在国家层面开放对话、合作开展项目的潜力；

许多 CSO 并没有享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方面，CSO 的当地项目常常受到援助方对问题重要性考虑的影响，却对援助方的计划缺乏知情权，从而丧失获取资助的机会；

有时候，CSO 对政府发展计划的实施效果存在很大疑虑，尤其是在这些计划缺乏社会包容和协商参与的情况下，但 CSO 在资助方的压力下还是与政府项目保持一致。在 CSO 与政府之间缺乏持续对话沟通的情况下，在实践中要与地方政府保持合作和协同有其难度。

目前存在 4 种类型的资助安排：①对特定的 CSO 项目提供支持；②竞争性招投标；③通过跨年的合作/框架协议为 CSO 提供机构核心支持；④为快速响应人道主义危机预先达成资助协议。这些安排都各有优劣，可能还包括为 CSO 提供技术援助的内容。1990 年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的志愿者参与发展援助之风盛行，这些活动主要由各种各样的专业或者非专业的 CSO 进行管理。有人估计此类志愿者数量每年已超过 5 万人。

5) 与援助方及受援方政府伙伴进行政策对话

CSO 与发展领域的其他参与者，包括援助方的合作越来越多，从而影响了政策方向并建立了学习性的环境。过去 10 年里，CSO 还成为加强政府问责的主要推动者。通过独立研究与发展合作方法，基于事实和证据进行倡导，加强公众和政府的责任感。CSO 还独立监督援助资金的流向，保证资源向目标人群转移并实现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北方国家的 NGO 主导了这个进程，南方国家的 CSO 网络也开始在诸如联合国机构以及其他全球行动的国际舞台上参与政策对话，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声音。

过去数十年中，很多参与南南合作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本土 CSO 还在国内政策对话和倡导方面表现积极，并从国际发展的富矿中汲取经验。随着南南合作进一步发展，这些 CSO 将能够在不同的社群之间增进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南南合作伙伴国的 CSO 所关注的问题予以回应。

现有的几项独立评估特别举出了有效影响政策倡导的一些关键因素：

由 CSO 和政府双方为对话所进行的循证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和记录，能够为相互沟通改进政策和实践创造共同基础；

长期稳步渐进而非一次性的合作更有可能实现相关各方的成功合作；

CSO 与受项目影响社区和相关支持群体的紧密联系，是 CSO 在政策对话中拥有公信力和合法性

的基础；

很多 CSO 通常缺乏政策对话的能力，可以通过培训来提升。同样，政府官员也可能需要掌握新的技能，了解与 CSO 行动者进行磋商的有效方法；

CSO 形成联盟和网络是推动自身加入政策对话的一种手段，既是与政府进行对话磋商的渠道，也是加强和拓展自身服务于各类目标群体的方式。

发展政策往往影响到既定的利益格局，CSO 需要将排斥在政策进程外的人群的声音表达出来，以推动新的法规出台和社会变革。致力于挑战现状的 CSO 会面临重大的不利条件，使它们参与政策对话的渠道和有效性受到限制。

结论和反思

参与南南合作的国家应强调以下旨在改进援助效果的关键方法：

加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坚持国家自主权，以不附加政治条件进行干预为原则；实行平等互利原则；从现实的发展经验出发，回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

很多有意参与南南合作的 CSO 都有自己独立行事的原则、议程和计划。南南合作要保持与 CSO 的有效关系，就需要将共同目的和目标予以明确，对合作的潜力予以认可，同时认清其中的局限。对很多 CSO 而言，这些局限包括援助方可能对 CSO 进行的收编和吸纳。

针对扩大 CSO 参与南南合作的范围并深化 CSO 的角色，UNDP 提出以下意见：

1) 在南南合作的官方政策中明确 CSO 的参与。不少南南合作的援助国将发展合作的目的和安排明确写入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与 CSO 合作的依据、选择合作方的标准、合作伙伴关系、财务安排规划等问题，以及基于这些问题轻重缓急等方面的考虑，并对计划和政策对话做出承诺；

2) 为 CSO 参与南南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不同国家的 CSO 面临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并不相同。特别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针对 CSO 的清晰透明的法律框架；

3) 加强南南合作中的 CSO 能力。中等收入国家的 CSO（在过去）往往是作为受援方在国内环境下开展工作。CSO 和援助方不能理所当然地假设开展南南合作所需的技能都与国内环境下获得的技能相同。在尊重南南合作原则的前提下，分析开展发展援助合作的适当方式，把能够促成有效而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各种条件准备到位，具体分析特定国家中影响发展进程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对促成有效的南南合作非常重要；

4) 打造信任的环境。在尚无前人经验和知识的情况下，CSO 在南南合作中的角色将是一个需要援助国和 CSO 反复探索实践，积累知识并由双方通过时间来建立信任的过程；

5) 政策对话和学习空间。持续的政策对话对南南合作的不同伙伴之间建立信任和积累知识至关重要。CSO 联盟和国家平台常常在多元而广泛的 CSO 之间促进了非常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而单个 CSO

要接触到发展援助的提供方以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容易。

近年来，政府、传统资助方、南南合作的援助国、多边组织和 CSO 对改进发展服务的措施达成了共识。许多 CSO 通过从上述相关各方学习经验，成为更为有效的发展行动者。南南合作也在逐年迅猛发展。也许，思考如何利用 CSO 的经验，把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多元而更为广泛的影响作为南南合作的基础，其时机已经成熟。

[付涛译，原文由 Shawn Shieh 审校编辑，部分注释和内容已进行了删减。作者来自加拿大援助观察 (AidWatch Canada)。需要原文的读者请联系：office@cdb.org.cn]

[1] 公民社会组织 (CSO) 可以被定义为家庭之外，非市场和非国家的组织，人们以这种方式结合起来，在公共领域追求共同的利益。本文用 CSO 来指称所有类型的带有志愿性质的各类协会。本文中的国际 NGO，则是指正式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 NGO。

[2] 报告全文参见网址：

<http://www.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working-with-civil-society-in-foreign-aid/>.

[3] ODA 的真实数额是 ODA 总额除去债务减免以及用于学生和难民资助的费用。可规划的国家级援助 (CPA) 是 ODA 中可由发展中国家受援国合作伙伴自行统筹规划的资金。人道主义和食品援助通常要从 CPA 中扣除，但此处为方便数据比较，将其包括在了 CPA 中。

[4] 相关数据和计算的背景资料见 UNDP China, 2013, P31, 根据作者的计算，2011 年，全球 8 大国际 NGO 联盟（包括分支机构）囊括的收入超过 117 亿美元，相比 2005 年，收入增长超过 40%。

[5] 编者注：CIVICUS 是 1991 年由全球 20 家公民社会组织联合成立的联盟机构，致力于推动公民参与和公民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健康运行的前提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达成平衡。目前总部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452>

[【返回目录】](#)

◎行业观点

中国青年报：海南风灾后 为何红会身陷“舆情风暴”

连日来，台风“威马逊”造成的数十万受灾群众牵动人心。参与救灾的中国红十字会，也许不会料到它调拨的数千条棉被和夹克衫，也将掀起一场舆情“台风灾害”。

7月20日至今，红会、网民、媒体就“盛夏送灾民棉被”风波展开激烈论战。究竟孰是孰非？中青舆情监测室剖析发现，舆论场中三大“误区”陈陈相因，造成了目前风波难平的“死结”。

误区一：“盛夏不需盖被子，因此救灾一定不需要被子”

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舆情走势看到，最初，在网络上“引爆”风波的是7月20日多家媒体的报道《“威马逊”台风后红十字会三伏天里送棉被》。其中，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中直接评价：“把宝贵的人力、财力和运力用错了地方。”

当天15时后，网络舆论迅速形成第一个负面传播高峰。“盛夏、海南”与“棉被”这组关键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违背常识”，迅速引发网民围观。

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统计7月20日的2000条网民评论显示，超过九成成为负面舆情。其中，45.6%网民直接质疑红会此举“荒唐”，认为是“捂瘁子的救援活动”；30.2%网民以此批评红会“官本位”，是“坐在空调房，拍脑袋决策”；21.7%网民则质疑红会的棉被物资采购、调拨程序，怀疑可能存在“棉被积压、借此清空库存”等“黑幕”。

而7月20日晚海南红十字三亚救援队队长陈锐，和7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等出面回应“棉被是救灾必备品”、“棉被并不厚”，可谓对多数网民“不需要棉被”的质疑，进行了一次“釜底抽薪”。

在红会第一轮回应后，负面舆情出现了第一次回落。但正面回应的扩散速度、广度，仍落后于前一天的负面新闻。

中青舆情分析师认为，在“棉被用途”被回应的同时，红会仍未充分解决网民的三点疑问：

一是棉被不能防潮，为何救灾物资没有选用防潮垫等其他防潮用品？二是距离1998年洪灾已十余年，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和调配，是否仍存在滞后问题？三是能否公布相关棉被、夹克衫的采购价格？

舆情的“导火索”未能完全熄灭，公众对红会的质疑，也就有了继续延烧之柴。

误区二：需不需要某物资，不是灾民说了算？

中青舆情分析师注意到，在红会、媒体和网民的这场热烈争议中，海南灾民的实际需求，却一

度成了“灯下的暗点”。

比如7月20日以来，多家媒体报道，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重灾区的政府干部曾表示：“安置点里的群众需要凉席、毛巾被，但棉被肯定是用不上的。”在广东、广西灾区的未断电地区，不少网民也纷纷自陈“不需棉被”。

有不少网民以上述情况为依据，认定“棉被无用论”。在和红会“掐架”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海南灾民的声音去哪儿了？

直到7月21日，媒体报道海南文昌灾区孩子被冻发烧，以“棉被肯定无用”为主的网络论调才发生变化。

实际上，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湛江灾区位于雷州半岛，文昌灾区位于海南岛东南沿海。前者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后者至今仍没有机场。两地的房屋受灾损毁程度、居民生活现状，可能都存在差异。

同样，红会一方也未能完全“就事论事”。

7月2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方微博引用评论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最受欢迎的救灾物资是军绿色的薄被和羽绒大衣，比其他任何赈灾物品都管用、耐用。”这也被不少网民指出：“湖北的气温和海南是有区别的吧？”

至此，红会和一部分网民的辩论，已经逐渐偏离了以赈救“威马逊”灾区老百姓为第一要务的初始方向，而部分地步入“彼此对垒，互不买账”的僵局。

误区三：“站队之争”里容不下监督批评？

实际上，为“威马逊”引发的负面事件“买单”的，不止红会一家。但比起民政部门“救灾面包发霉”的责任，“红会”两字引发的“讨伐”声浪显然更巨大。

从郭美美事件至今，红会近几年中持续遭到质疑，也一直在回应，公众形象却很难说有明显提升。

“你是反红会，还是挺红会？”在连日来的网络舆论场中，红会“送棉被”风波逐渐变味，脱离就事论事，某种程度上成了“站队之争”。中青舆情分析师注意到，在当事方红会、网络舆论的对擂台上，可以说双方都“不够淡定”。

一面是红会公众形象不佳，催生了诸多网民的“有罪推定”心理；一面是红会急于“洗刷罪名”，在澄清的同时也和网民“掐架”，造成了一部分反效果。

但是，“站队之争”里容不下监督批评，却是红会应对公众质疑时的一个极大“失分点”。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从7月20日起截至发稿，红会的新浪微博仅发9条相关微博，腾讯微博共发36条之多。前者收获的正面评价比例，却超出后者。

过犹不及。红会腾讯微博虽然应对非常积极，却时有“用力过猛”。中青舆情监测室总结，其主要有三次“失言”。

第一次是在红会澄清发霉面包并非红会物资后，有网民评论：“小编，吃一堑长一智，要改进的东西太多了！再被骂三五年，怎么办？”7月21日17时15分，红会官微回应称：“被骂，那是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认，但不是我们做的，不能扣我们头上！”

第二次，是网民“幽默一下下”建言官微：“如果小编可以在发布事件真实情况的同时感谢社会团体的监督，同时欢迎质疑者的监督。那么，谁愿意做坏人站在你的对立面？”7月21日21时4分，红会回答说：“我们欢迎来自各界的监督和指导，但实在无法忍受不专业的报道导致的所谓的批评。”

这种“斗气式”的“口水仗”，在同日晚间出现了第三次，也达到顶峰。在网民评价红会公众形象不佳、期待中央领导“揭底”时，红会官微的回复语气愈加激烈：“我们真等着习大大在我们这发威的那一天！”

红会这三次回应的“理直气壮”，再次引发网民不满。绝大多数网民认为，红会官微不宜频繁“发怒”。网民“黄川华”的评论颇具代表性：“民众有知情权，红会有解释真相的义务。有人关注你，是对你工作的支持，网友责问你的过程，也是你重塑形象的过程。你无法忍受，是‘官本位’的思维在作怪。”

网民“e_lu”则坦率地说：“脸是自己丢的，也要靠自己去挣！你若真的好，质疑声自然会渐渐消去。你怒了，说明心态还没正回来。”也有支持红会发棉被的网民忍不住提醒：“作为红会官微，不要在评论里陷入无谓的争论和斗嘴。因为，不管是结果是输是赢，你很有可能都是输家。”

看来，红会的公信力重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双方心怀善意，才能敞开心扉；而当双方都不“淡定”时，红会则更需要学会倾听，方能从善如流。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地址：http://zqb.cyol.com/html/2014-07/23/nw.D110000zgqnb_20140723_2-03.htm

[【返回目录】](#)

新京报：潘石屹捐款哈佛有多少可行性

潘石屹个人的钱，他爱怎么花是他的自由。不过以基金会的名义捐赠，如何把这个项目做成功、做成一个中国民间海外捐赠的样板，还要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挑战。

前几天，潘石屹以“SOHO 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美国哈佛大学签订了 1500 万美元的捐赠协议，据张欣介绍：未来将在全球范围内捐助 1 亿美元，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家庭年收入 6.5 万元以下的学子都可以申请。

更该问，是否调查过贫困生能否考入哈佛

经济学家姚树洁叫板潘石屹，质疑在中国赚钱的地产商为何捐资远在美国的哈佛大学，不少网友也跟风疑问，“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这样的看法自然有失偏颇，1921 年的美国也是社会矛盾重重，成立不久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拨款 100 万美元，捐助建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中国现代西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标准。慈善公益是一件从人性出发的事情，姚树洁把这事扯到国家和民族层面上来讨论，显然是“跑调了”。

潘石屹捐款 1500 万美金给哈佛大学用于支持中国贫困学子是一件好事，并无不妥。如果社会的关注与争论以道德绑架慈善，就是以“恶”出发，其结果只会阻碍更多的富人进入慈善公益领域。讨论一个慈善公益项目是善还是恶，是否公平，应该更多地关注项目的运作程序，才能发现这个公益项目是否真正做到扶贫济困，是否真正推动了社会。

回到潘石屹捐赠的事上，有网友质疑潘石屹，是否调查过有多少家庭年收入低于 65000 元的学子能考入哈佛大学？这样从程序出发的质疑比其他论调更理性、更到位。在很多网友看来，潘石屹设立奖学金所要解决掉的问题和“三伏天送棉被”一样根本不存在，这么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显然只有潘石屹本人能回答。因为，目前还没有公开信息透露“SOHO 中国基金会”和哈佛之间协议的内容和项目具体的操作办法。

中国民间该如何“海外捐赠”

按照张欣的介绍，潘石屹是以“SOHO 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哈佛大学签署的捐赠协议，那么如何把这个项目做成功，潘石屹和“SOHO 中国基金会”的项目团队还要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挑战。

对于“SOHO 中国基金会”首批捐赠哈佛大学 1500 万美金，以及计划海外捐赠 1 亿美金该如何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并无明文的规定。即便是关于基金会涉外管理的法规，也只是界定了国内基金会如何接受海外捐赠的相关行为规范以及汇报制度，并未涉及国内基金会“对外捐赠”行为的管理。国内的基金会“涉外”基本是以“接受”为主，鲜有“捐出”例子。

初尝“海外捐赠”的“SOHO中国基金会”，首先要解决的是“1亿美金海外捐赠”是否符合基金会所登记的“业务范围”。按照公开的信息，“SOHO中国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涉外援助”。即便这1亿美金是潘石屹个人或者“SOHO中国”通过“SOHO中国基金会”定向捐赠给哈佛大学，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海外捐赠也可能不被许可。

其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SOHO中国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的善款要从中国汇至美国，需要提交包括捐赠协议在内的诸多单证及《服务贸易、收益、经常转移和部分资本项目对外支付税务证明》等文件。而这中间如果“SOHO中国基金会”接受这1亿美金善款的捐赠方潘石屹或SOHO中国公司，根据《捐赠法》享受了善款税前列支的鼓励政策，那么又存在抵扣近3000万美金公共财政税收的问题。

此外，如果潘石屹和“SOHO中国基金会”做成一个中国民间海外捐赠的样板，他们还要面临着海外慈善公益项目管理，如何监督哈佛大学按照捐赠协议实施项目，如何保证受助学生遴选的公平、公正、公开，如何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透明以及接受社会的质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是善意，更是专业。

众议

@吴必虎（北京大学教授）：有人质疑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这个问题还是要拷问中国教育部门本身。教育体制不改，教育经费不足、效率不高、创新遭抑的问题难改变。捐款纳入企业成本，也应入法受到社会鼓励。

@向松祚（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此事看起来无可厚非。只要符合法律，企业和企业家有捐款自由。然而，为什么中国富人愿意给国外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意给中国教育雪中送炭？为什么中国精英们都迫不及待将子女送到美国和英国欧美受教育？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能矢志不移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

@詹国枢（全国政协委员）：其效果有三。一、雪中送炭。钱花在了真需要的人身上。二、锦上添花。凡能上哈佛者，必精英也。好钢用在刀刃上。三、知恩图报。这些人毕业后，大都是栋梁之材，由他们感恩，价值不菲也。

来源：新京报

地址：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7/25/content_525964.htm?div=-1

[【返回目录】](#)

新快报：怎样吸引邻里做公益

居民通过学习手工、家政、护理等技能，为辖区内其它居民提供服务，就能获得“社区时间券”，并兑换粮油等小礼品。

社区，并非一个地理区域性质的简单划分，社区中每个人之间，是生活上、文化上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认识。在我们这个人均GDP超越北京、上海的城市里，怎样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激发人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维系力和内部归属感，是每个人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目前，有一些公益组织，正在运用各种公益项目，激发着社区内民众互助的热情。

华林街 单亲妈妈为独居长者 “煲靓汤”！

社区义工为辖区内的独居长者、残疾人士和困难家庭提供每周一次的煲汤服务，义工有相当部分是辖区内的单亲妈妈、困难家庭妇女。

接近中午时分，上下九步行街已经迎来了大批逛街悠闲的市民。穿过华灯，刘社工在一个不太显眼的路口拐了进去，眼前瞬间变成充满老城区特色的蜿蜒小巷，“陈伯早晨！去喝老火汤了没？”“李婆婆小心慢走，下次带孙子一起来！”短短几十米，刘社工就碰到了几个熟悉的“老友记”街坊。再往前走就是华林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办公室，站在门口就能隐约闻到香味，让人不禁想像那一口正在咕嘟咕嘟响的汤锅。

这是一股许多广州人都十分熟悉的老火汤之味。揭开锅一看，健脾益气、清热润肺的清补凉！不到几分钟，志愿者就将汤水装满了多个保温瓶，并分成几个小组出发。就在同一个时间，90多岁的李婆婆正独自站在自家门口，伸长脖子，等待着这些来自“家”的味道。

在华林街，与李婆婆一样习惯了每周一汤的，还有20多个街坊。在这里，邻里，不仅仅是一层地理上的关系。”

这是华林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组织的“健康进华林，金秋暖心灵”活动，从去年6月开始组织社区义工为家住在华林街辖区内的独居长者、残疾人士和困难家庭提供每周一次的煲汤服务，通过一碗碗营养丰富、热腾腾的汤水让居民感受到温暖和关怀。而更难得的是，这些包办活动组织、煲汤、派送等工作的社区义工，有相当部分是辖区内的单亲妈妈、困难家庭妇女。社区义工，往往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内社工人数的好几倍。

早在2012年，广州已经基本在每个街道至少建立1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每个中心政府投入的项目资金为200万元，覆盖100多条街道，承担长者服务、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等多个领域。然而，服务需求量大、社工人手短缺等问题，意味着社区服务不能完全依靠家综，更重要的是挖掘与发挥社区自身的活力。而华林街的每周一汤，就是一次成功的实验。

金沙街 为邻里服务可换取大米食用油

赋闲人士提供家政、艾灸、手工等,为其它居民服务,只要满足一定的时数,就能获得“社区时间券”,换取大米、食用油等。

虽然不是老城区,但金沙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也同样面临着辖区内困难群体相对集中的问题,金沙洲平乐社区是位于广州市区的最大型保障性住房社区,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低保、低收入和边缘困难家庭已占总户数的17.07%。而中心的社工阿 Ben 希望,用“社区时间券”,让街坊之间互相熟悉,建立自信,继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推行“社区时间券”的想法已经在阿 Ben 心中酝酿多时。2011年金沙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开业时,新面孔阿 Ben 与居民互不相识,手上也没有开展活动的资源,而到了现在,阿 Ben 已经成为了居民口中熟悉的名字,中心也联合华南师范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在今年春节正式推行“社区时间券”。

经过摸查,中心社工组织一群赋闲在家的妇女、残障人士,学习一些特别的技能,如家政、艾灸、手工等,为同一辖区内的其它居民服务,只要满足一定的时数和内容,就能获得“社区时间券”,换取大米、食用油等礼品。目前已经有十多名居民加入到学习当中,而中心也送出了超过100张“社区时间券”。

“假如有足够的物资,我们会希望有更多居民可以加入到‘社区时间券’的项目当中。”阿 Ben 告诉新快报记者。虽然试行了短短半年,他已经发现了一些喜人的小变化,有从中心学习了艾灸技能的妇女,非常乐意为一些孤寡老人、邻里街坊服务,但不要求拿时间券换取粮油,“她们会认为,做这样的公益服务很开心,而不是因为可以换取礼品。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只让她们加入‘社区时间券’活动中,而是通过服务互相认识、建立自信,继而更好融入社会,让社区恢复它自有的功能,而‘社区时间券’是其中一个工具。”阿 Ben 说。

南沙区 志愿和物资在“时间银行”交易

“时间银行”的会员将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存储起来,等将来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提取所存储的时间获得相应的服务或物品。

假如说老城区可以利用固有的紧密邻里关系,更好地发起社区互助公益项目,那南沙的“时间银行”,就是利用了特有的技术资源,在这块试验田中,尝试将邻里关系放到了互联网平台上。

“时间银行”是南沙区民政部门于去年启动的一项社区互助服务项目,由南沙国际技术合作服务中心承接项目建设,并负责“南沙时间银行运营管理中心”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时间银行”的会员将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存储在时间银行中,等将来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提取所存储的时间获得相应的服务,也可以通过银行兑换系统用服务时间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就在今年7月,“时间银行”(http://www.nstimebank.org.cn)完成测试正式上线。与金沙街的“社

区时间券”一样,“时间银行”也使用了一种介质—时间币。至今,“时间银行”实名注册会员超过2万人,发布超过百个公益服务需求,至今也有近40个服务已完成“交易”,服务范围涉及老人陪护、家政清洁、小孩托管、家教培训、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健康咨询、购物接送、专业技能等多个领域。作为管理方的南沙时间银行运营管理中心更会定期为空巢老人、残疾人士、贫困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帮扶对象发放时间币,让困难群体也有能力“买”服务。

“服务,并不是高端群体只能跟高端群体接触,底层只能与底层接触,社会是融合的、金字塔型的,各方是交流的。”南沙国际技术合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费振宇告诉新快报记者。虽然南沙并非老城区一样传统意义上的成熟社区,但“时间银行”希望做的是,搭建规则,而剩下的由社区来自我完善、自我运作。

“我们只是设定好基本规则,在规则下面,这盘棋下得如何,就是棋手的问题。时间银行其实并不需要政府力量过多地出力,我们希望把规则设计得更合理一些,就能让社会去做更多的事。”费振宇说。

无论是在传统实体社区或是互联网平台,无论是煲一锅老火靚汤或是为孤寡老人做一次艾灸,推动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区之间的黏度,就能焕发更多社区本身应有的活力。

来源: 新快报

地址: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4-07/21/content_498582.htm?div=0

[【返回目录】](#)

环球网：公益众筹看起来很简单 的 5 个案例

随着公益众筹的兴起,环球公益也按捺不住内心对他的好奇,在近期策划的《探索中国》公益项目中加入了“众筹”元素,目前已进行近一周的时间,作为新兴的公益筹款模式,实际推进并不如以下案例中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后续我们会将《探索中国》众筹经验分享,希望能给跃跃欲试的大家提个醒。

(1) 阿菜的环球社会创新采访

数字: 26 个话题 428 支持者 164, 240 众筹资金

关键词: 支持多 筹款多 创新 推广

这个项目是2013年发起的,在当时无论从传播度和最终的筹款额来讲,都属翘楚,阿菜成功最大的原因有,直观展示自己行动的视频、积极的推广宣传,在大学校园和参与活动的现场做推介,

使线上线下形成整合。而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项目本身的创新度，阿菜作为一个寻求创变的年轻人敢想敢做，给很多人带来刺激和影响，支持他个人也相当于支持了自己的一段梦想旅程。

(2) WOMEN（我们）的故事：TEA+女书店

数字：6 个话题 163 支持者 50, 400 众筹资金

关键词：女性支持多 定位精准 美图美文

这个项目的文案中这样写到：TEA+女书店的创建基于这样的信仰：身为女性，我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长，在实现潜能和放飞自己的路上，需要更多关爱、鼓励和正能量。在属于女性的空间里，有阳光，好书，热茶，思想，不同形式的活动和交流让我们能相互扶持，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伴，一同绽放美好天性。

项目的发起人是两个看上去有些文静的女孩，希望打造出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给所有想放飞自己的女性和她们的同路人。项目发布后果然吸引了很多女性支持者，很多人觉得女性创业本来就不易，能坚持下来尤为可贵。并且项目文案的风格非常鲜明，从图片到文字到弥漫着清新典雅的气息，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同样也起到了聚拢用户关注和支持的作用。

(3) 圆恩墙上咖啡——喝咖啡谈公益

数字：13 个话题 87 支持者 21, 140 众筹资金；

关键词：精心策划 基金配合 高效执行

整体上看，项目的执行和筹款都很顺利，这与前期的精心策划密不可分。策划阶段，平台方与发起人反复讨论文案，合理设置项目回报；项目上线后，众筹网做了积极的推广，发起人也非常配合，及时更新项目进度，回报的发送也很及时。另外，平台方的积极推进和发起人的密切配合都是项目成功的原因。

(4) “孩子与自然”自媒体——传递乡村的爱与美

数字：8 个话题，152 位支持者，300, 626 众筹资金

关键词：支持多 筹款多 名人效应 粉丝经济

这是由邓飞发起的一个自媒体公益项目，邓飞作为公益“明星”，其影响力可见一斑。捧场的多，出钱的也给力。其中“上官冰淳”支持 8 万，“刘一明”支持 8 万。此外发起平台与我们分享了三点成功秘笈，首先是与发起人的通畅交流，为项目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发起人发动了自身的传播资源，扩大了传播效果；第三，平台推广。

(5) 为孤独症儿童筹款 让天真者遇到天真者

数字：15 个话题 115 支持者 7710 众筹资金

关键词：筹款速度快（4 天完成目标） 真挚情感 特色回报

这个项目的成功，是向大众展示出了公益温暖而美丽的一面，“天真者遇到天真者”，让大家了解了孤独症这个群体和他们真实的生活，给很多人带来的启示是，做公益不都是需要煽情和凄凉悲惨的画面，只要触动了心灵，同样可以激发人们做公益的心。同时，具有艺术气息的独特画册，吸引力十足，供不应求。

案例由追梦网、众筹网推荐

来源：环球网

地址：<http://hope.huanqiu.com/exclusivetopic/2014-07/5075075.html>

[【返回目录】](#)

社会创业家：慈善的“未来基因”

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慈善传统是一种严肃的职业行为，或者是当人们在退休以后才开始的行为。现在，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一代——年轻的财产继承人、年轻的富豪和年轻的高收入者，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开始慈善活动，并正寻求新的和更综合的方法来平衡慈善与其他行为。

当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家族成立了一个小型基金会，我开始接触到慈善并逐渐深入其中。时至今日，作为一名社区组织管理者，慈善开始慢慢地浸润到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并成为了我学术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研究慈善对政府政策变革的影响。我还以志愿者的身份成为几家基金会的董事会核心成员。2010年，我成为了“勇士慈善”（Bolder Giving）第一个全职执行董事。

首先，我需要向大家解释一下慈善“未来基因”这一术语的含义。在我刚开始接触慈善的时候，我曾困惑于如何理解慈善的“未来基因”，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渗透力的概念。

谁是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下一代？

相对于传统的代际划分，如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美国婴儿潮一代，我们对“慈善代际”并没有如此明确的起始界限划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慈善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捐助者，都是在晚年开始涉足慈善。当下，有更多的人在二十多岁，三、四十岁时便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这个现象的背后有如下几个因素：全球背景下慈善文化认可度的上升以及其社会认可度的提高；科技型企业中较快积累财富的年轻一代；美国和西欧国家中财富的大规模代际传承。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所说的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下一代指的是哪些人？一般而言，我们所指的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下一代是指二十到四十岁的青年慈善人群，这个年龄跨度的慈善人群中

存在显著的变化，而且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先进的南非”研究所慈善咨询师阿曼达·布洛赫回应了这种不确定性，她说：“我不是很确定，自己应归属于上一代还是下一代慈善家，我刚刚步入40岁，也许把自己定义为当下的一代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吸引我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对慈善“未来基因”的两项早期研究结果的深度分析：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于2012年发布了《慈善未来之星》报告，这是一项对北美、欧洲、亚太地区国家1500名年轻慈善家的调查报告；美国的大峡谷州立大学约翰逊慈善中心于2013年初发布了《慈善的未来基因》报告，这是一项针对310个美国高端年轻慈善家的调查，其中包含30个深度访谈。这两项研究为我们探讨全球慈善“未来基因”人群的异同提供了基础，并反映了年轻的慈善家针对这一问题的反馈、访谈和分析。

我读到这些近期公布的报告有所共鸣，也发现了自己的经验与这些调查和访谈所表达出来的想法存在偏差，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年轻的慈善家存在着不同。

两代人看待慈善的差异

下一代的年轻捐助者比起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早地接触和参与慈善，慈善似乎更直接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并被看作是表达自己激情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行动。这逐渐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巴西 Geração 研究所主任伊莱恩·史密斯注意到，虽然巴西还不见得会马上出现新的大规模的慈善捐赠行动，“但是这里似乎出现了一种潜在的思想转变，人们不再忽略慈善，而且不再仅仅通过商业来创造和分享价值。”本着同样的精神，来自印度一家战略慈善基金会的慈善论坛负责人尼塔·萨洛奇注意到“年轻的一代没有将慈善仅仅定义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和阶段，他们把慈善作为一个生命中的连续的统一体”。

与其说这是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如把它看成是年轻的慈善家开始其慈善旅程最初阶段的一种现象。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慈善传统是一种严肃的职业行为，或者是当人们在退休以后才开始的行为。现在，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一代——年轻的财产继承人、年轻的富豪和年轻的高收入者，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开始慈善活动，并寻求新的和更综合的方法来平衡慈善与其他行为。

当被问及参与家庭慈善事业的影响，亚历克斯·巴菲特·罗泽克(沃伦·爱德华·巴菲特的孙子)指出，“我最大的顿悟，可以这么说，起始于对基金会的参与，为什么我仍然心怀感激地参与直到今天，其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空间来储存对世界的看法。”

随着年轻的捐助者在他们的生活中更早更深入地参与慈善事业，我预测我们将继续看到商务和社会活动之间、慈善事业和投资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下一代慈善家将为社会的综合变革开发出新的模式。

寻找系统性改变的机会

同样，当我们面对全球财富日益不平等，气候变化威胁到对国家和全球治理的挑战，下一代捐助者似乎将优先权给予了解决那些最紧迫的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并寻找系统性改变的机会。我认为自己的慈善行为以及与其他具有“未来基因”的捐助者的多年合作正反映了对这一变化的推进，如社区组织优先，倡导退伍军人服务，儿童福利事业等等。美国慈善机构“代际资源”执行董事杰西·斯佩克特认为这是年轻的捐助者“了解我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和寻找新的方式以支持社会体系改变”的兴趣。正如埃及马迪社区基金会创建者马尔瓦·埃尔·戴利指出，来自“古埃及”的年轻慈善家想要回应社会的根本性原因，而不是仅仅解决一些表面化的社会症候。

这些问题正在获得所有代际的关注，来自阿拉伯之春和新占领运动的一代日益感到，如果要为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创建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就必须要用超越传统的方式来推动慈善事业。制造社会抗议运动源自一系列政治理想的幻灭，它不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好的社会，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慈善推进会产生产改变社会的影响力。阿曼达·布洛赫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她描述了南非的“下一代”慈善家当民主没有实现时候的“气恼和失望”，这些慈善家希望通过对社会正义的倡议和支持来表达他们的理想。

更多地公开谈论捐助

公开谈论捐助行为并与其他捐助者分享捐助故事是“下一代”捐助者比较明显的特征。我认为这是数字时代发展的结果，在线生活和社交媒体的联结产生了实时通讯并改变了隐私准则。如尼塔·萨洛奇所说，当我们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印度年轻一代的捐助者感到自己有责任倡导变革，积累来自朋友和同行的支持，从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来改善我们的社会……年轻一代似乎在书写围绕慈善事业的全新对话并准备向下一个阶段推进。

“下一代”的捐助者认识到从来不会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相对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我们更快速和更热情地支持捐助发言人并应和其倡议，我们明白分享我们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服务行为。如杰森·哈奇森·奎利恩在访谈中所提出的：“我想要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些令人惊叹的秘密：慈善不仅可以使其他人生活得更好，而且也将让你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从遵循父母到独立

“新一代”的捐助者都经历了一个先遵循而后独立于他们的家庭的慈善实践历程。我看到美国下一代捐助者就动物保护、环境、公民权利等事件进行宣传。青年、家庭、教育等基本问题作为与我们父母和祖父母讨论的议题而被高度关注。这使我意识到，我们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与我们的父母有很大不同。

研究证实，关注艺术和文化、宗教和健康的组织现在需要更多地注意从事慈善的“新一代”捐

助者，并且需要面对捐助者不断老龄化的问题。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有更多的时间来探讨艺术，面对更多的健康问题，并在我们开始抚养子女时更多地关注宗教，这些都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目前应注意的重大变化。

很多的“新一代”捐助者正在寻找与他们父母的慈善主张相应和的方法。《慈善未来之星》作者指出，“这一代青年比他们之前的一代人更接近他们的父母。他们互相分享价值观、利益和目标，他们希望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父辈和自己对价值的看法。”

亚历克斯·巴菲特·罗泽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可祖父沃伦·巴菲特的理念，认为应该把钱捐给他们最了解的人。但与祖父做法不同的是，他创办了一个大规模开放式的在线课程 MOOC，将人们聚集起来，并通过捐助基金会向他们提供资助。

我们还将目睹来自我们这一辈捐助者的更多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我们的经验、成功与挑战之上。家庭的参与也将定义我们的慈善路径。

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会发生什么？

新一代的捐助者在未来几十年将如何发展是一个公开的话题。积极参与我们所支持的慈善机构的行为将不断增加？或者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会减少我们的行动？在推进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将面临更大挑战？我们是否对推动社会变革的捐助行为抱有持续的激情？我们是否会因变革的节奏过慢而甩手不干，并回退到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去因循守旧地开展一些传统的慈善行动？面对风险，我们的倾向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吗？

当我被要求谈论“新一代”慈善家的问题时，我总是会界定年龄与代际之间的区别。青少年经常反抗他们的父母，但这是一个年龄的阶段性问题，而不是代际的原因。代际的特征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动态地持续，呼应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规范，并产生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事件。接下来我们才可以看见哪些是“新一代”慈善家的持久性代际特征，哪些只是第一代人在青年阶段参与一定规模的慈善事业的年龄特征。

我期望，当下的“慈善基因”将以不同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方式继续从事慈善。我以一颗同样好奇的心，想看看未来的一代将给慈善带来哪些事件和思考。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转自社会创业家

地址：

<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554&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25>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小额信贷的中国式进程

追根溯源，小额信贷的概念始于哥伦比亚和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微型金融公益探索，但至今鲜被提及。

而不得不说的人物，就是有“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穆罕穆德·尤努斯，他在孟加拉进行的公益实践为小额信贷大规模进行扶贫改造提供了更多可复制的经验，成立于1976年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向贫穷的农村妇女提供担保面额较小的贷款，如今在孟加拉国有2200个分店，职员近2万人。

20世纪90年代，小额信贷来到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小额信贷的扶贫模式被更多人寄予厚望。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认为，小额信贷是有普世意义的，“即针对穷人的、含有扶贫公益性质的金融信贷创新，另外，就是单笔贷款规模，按照国际公式不大于人均GDP的两倍。”

有数据显示，贷款公司单笔贷款规模平均超过150万元，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小额信贷的平均单笔为30万元，并且需要不同程度的信用抵押。相比商业的信贷模式，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有着自己的使命感：从几千元到1万、2万元的额度，弥补银行小微贷的不足，并将穷人从民间“高利贷”中拯救出来。

而小额贷款作为一种扎根基层的普惠式金融，其自身的特性又不同于传统金融，来源于民间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古老的信用机制，可能更加适用于民间，公益机构在其中对于重新塑造基层的信任和金融方式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助推作用。

20多年来，中国的公益人和实践者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适于在中国生根成长的小额信贷模式，学术研究与政策推动也未停止过摸索。几经发展、挫折、再出发，不少社会组织梳理总结出与自身与当地发展相适应的路径。

国际支持下的起步

“小额信贷的发展在中国有不同的历史阶段。刚开始创立的小额信贷是以扶贫项目的形式出现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对记者说。

1993年小额信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孟加拉乡村银行引入，此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或双边机构陆续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试点，由国内社会组织参与执行和管理。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由国际机构捐助或国内社会组织开展的小额信贷项目覆盖了全国200多个县。

在初始阶段，不同的机构也试验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几种模式，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一直是

国内绝大多数项目青睐的模式。

由于项目起步由国际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支持建立发展起来，试验期的小额信贷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和所有项目一样，小额信贷项目有既定的项目周期和目标，项目结束后，如果资金得不到保障项目也会随即终止，除了国际资金外没有实现资金的多渠道多元化，另外，彼时的项目执行与政府关系紧密、受行政干预较大，也没有法律法规，一切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王行最表示，小额信贷项目数量在国内由兴盛一时到现在锐减，说到底是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前中国的大多数小额信贷项目都发源于国际机构援助的项目，配套资金里有两部分，一是中央政府的配套，另一部分是地方政府配套，民间机构在其中实际上是一个项目管理机构。按照常理肯定是谁出钱谁说了算，那么这个钱是谁的呢？谁都说不清楚。一旦产权不清晰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管理体制不顺，绝大多数项目也是因此做不下去的”。

转型与独立之路

2002 年以后，小额信贷项目数量在中国从兴盛一时、遍地开花，到一路锐减。一方面政府通过扶贫贴息贷款由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小额扶贫贷款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减少或取消，另一方面，项目陆续到期，中国的小额信贷面临着去留存亡的选择。

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项目小额信贷开始向机构小额信贷转型，直接注册为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来实现由项目型到机构型的过渡，并且总结经验教训后，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和提高小额信贷的管理、后续跟踪服务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并且开始各自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项目注册为县级的乡村发展协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了专门的小额信贷部。但事实上，始终无法找到为小额信贷正名的合理身份。

直到 2008 年，中国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虽然《意见》还未充分考虑中国小额信贷公益机构长期期待的合理合法化身份问题，但毕竟有了实质性前进，数家小额信贷公益机构利用机会，转型为小额贷款公司。

政策出台后的不到四年，小贷公司或机构数量直线上升，截止到 2012 年 3 月，达到 4878 家，贷款余额增长到 4447.25 亿元。快速发展的背后，无论从政策设计还是金融实践上来看，小额信贷的概念和公益属性也愈来愈模糊，竞争带来的混乱不可避免。真正意义上为弱势群体、低收入穷人服务的民间机构，若想站稳脚跟势必艰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开”。

2011 年 6 月，作为中国 P2P（个人对个人）小额扶贫贷款模式首倡者，“我开”选择在网上运行了 4 年后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成立“我开基金”，这家注册于美国，却一直致力于中国扶贫小额贷款的民间公益组织，从两个人开始，一度在全球 15 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累计发放 1500

笔小额贷款，帮助 961 位中国贫困农村申请者实现创业梦想，并实现了 98%的还款率。但是在获得公募资质不到一年时突然终结。时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的葛振江分析，募款困难只是一个结果，导致募款困难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人员、方式、项目可信度等。

求解当下问题

尤努斯曾在接受《公益时报》专访时，针对中国的小额信贷公益机构如何实现自身造血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时，指出了中国与国际的最大差异。“中国目前小额信贷一直没有比较显著的增长，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事情都是由 NGO 来进行的，NGO 在提供贷款之前必须要找到资金，但往往他们这方面能力有限，这些发放小额信贷的机构只能提供贷款而没有吸储能力。拿孟加拉乡村银行来说，我们允许两只脚走路，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不断扩大的关键所在。”尤努斯说，单只脚走路，就需要中国的 NGO 找到自己一套可行的、可复制的模式，并要把它推广出去。

不可否认，P2P 网贷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借贷双方的资金对接效率，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但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业态，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宜信公司总裁助理刘大伟就表示，产品与服务能力不足、成本较高、支付与征信体系等不发达以及风险管理与监管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当前中国普惠金融面临的现状与挑战。

P2P 网络借贷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征信环境以及信贷风险控制能力，由于 P2P 机构未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使这类机构无法像银行一样借助其了解借贷双方的资信情况。此外，网贷平台之间也没有实现信息共享，借款人违约成本很低。2013 年关闭的“齐放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王行最表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资金发放需要农户自愿结成贷款小组、五户联保，通过最传统方式解决信用问题。同时，培养农户的金融和技术能力，保障他具备还款可能。

与其等待政策法规尽早完善健全，公益组织不如先从管理、IT 技术、产品和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涵养自身，降低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吴国宝对公益组织的建设提出了建议：小额信贷机构应选择合适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兼顾业务增长、提高机构盈利水平与服务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确立与目标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控制贷款风险。

（数据来源于《小额信贷在中国》）

2012 年 3 月

政策出台后的不到四年，小贷公司或机构数量直线上升，截止到 2012 年 3 月，达到 4878 家，贷款余额增长到 4447.25 亿元

2011 年

P2P 形式的网络信贷开始兴起

2008 年

银监会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随后小额信贷公司在中国大规模发展。一些公益机构转型公司化运作，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部该职位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04年

新修订《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基金会设立分支机构

2002年

大批项目到期转型，多家机构转型改制，小额信贷由项目向机构转变

20世纪90年代

初期成长，国际机构支持下，国内公益组织开展小额信贷项目，数量一度达数百家之多

199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孟加拉银行引入小额信贷项目

1981年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AD 在内蒙古实施的“北方草原与畜牧发展项目”首先引入小额信贷。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7/22/content_9355.htm?div=-1 [【返回目录】](#)

NGOCN：对话冯世锋律师-公益合作如何能保障双方权益

从灯塔计划就“幸福列车”项目发出谴责声明，到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达成项目重启共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冯世锋律师就一直关注事件进展，并为灯塔计划提供了建议，站在律师的专业角度，公益合作如何能保障双方权益呢？

NGOCN=N 冯世锋=F

N：灯塔计划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幸福列车”项目在7月21号宣布重新启动，你可否从合约和法律的角度，说说你在这个事件中观察到什么？

F： 我的感受是，公益合作项目双方如果没有伙伴意识，就不可能订立出符合契约精神的合同，双方的合作也就不可能顺畅。

伙伴意识，首先是平等。虽然大家都是公益机构，都在为弱势群体服务，但如果没有平等意识，订立的契约（合同）就会偏向强势的一方，出现忽视弱势一方权利的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

另外，互相尊重彼此的公益理念也很重要。如果不能彼此尊重和理解，很难体会到这个项目为何要投入大量资源以及价值所在，也容易因为“项目人员离职”、“担心孩子水土不服”这些原因而单方终止协议。

总之，如果缺乏伙伴意识，制订的合同可能倾向保障其中一方，即使签署了“完善”的合同文本，也可能违约，会损害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

N：在草根 NGO 要与基金会或者企业进行合作的时候，双方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以保障各自权益？

F：无论是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还是公益组织和商业机构的合作，首先讲清楚各自的公益理念，包括沟通好行动逻辑和项目期望等等，形成互相信任和理解，否则容易变成伙计关系。另外，本着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原则，尽量让合同能够达到“目标明确、权利义务清晰、可操作性强、违约责任合理”来保障各自权益。

我建议可以尝试通过以下几个机制来减少分歧，尽量避免项目终止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伤害。

1、确立受益人利益优先原则

公益合作合同一旦违约，受到侵害的不仅仅是守约方，还包括了合同外的弱势群体。因此有必要约定：和项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遵循项目受益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优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争议期间，双方均有义务对受益人进行解释、安抚工作，避免对受益人造成伤害。

2、建立全过程的沟通机制

公益合作的纠纷往往是由于沟通不充分，反馈不及时造成的。建立及时响应的沟通机制后，发生任何可能影响项目进程的事件，双方都有权启动沟通机制，由指定人员协调各方资源妥善解决。

3、信息透明和观察员制度

公益合作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不妨在保护受益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将合同签订的过程透明化，接受社会的监督。对于不方便透明化的项目，可以考虑设置观察员制度，让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观察员对过程进行观察和监督。

N：合作的时候要充分沟通，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要形成伙伴关系往往耗费大量的沟通成本，大部分项目可能耗不起这个成本，作为合作的双方可以怎么办？

F：作为草根 NGO，在诸多的社会问题面前，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面对资源的时候，往往倾向于“与其磨磨蹭蹭丧失机会，不如先拿了再说”。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伙伴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的，需要在项目开展中培养。

如果个案上缺乏沟通，行业上没能建立契约精神、伙伴意识，在强大的资源面前，草根 NGO 包括其从业人员的使命和价值发生扭曲，最终伤害受益人群的情况是极大可能发生的。因此，倡导平

等规范合同范本、优树立受益人权益优先原则、引入外部力量建立观察员制度和公益调解制度、倡导遇到不公平待遇时要勇于发声，这些都是有助于改善公益合作现状的措施，值得共同努力。

N：在合作的细节上，听说部分草根 NGO 做项目可能连基本协议也没有，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技巧，比如如果签合同需要注意有哪些条款，或者一些基本原则之类的？

F：如前所述，因为（草根 NGO）处于行业领域的相对下游，在资源匮乏的公益生态中处于相对的弱势，若单由其一方自下而上推动形成契约精神、伙伴意识的形成，并推动签订平等、合理的合同条款，是不太容易的。就像消费者不大可能推动调整银行的格式条款。当然，捐赠方、资助方目前还不都像金融机构那么强势，仍然有很多沟通的空间，因此，我建议可以考虑：

由资助方、项目执行方、受益人代表、政府管理部门、公益法律人士、公益研究人士等公益圈的力量一起，草拟一些适合典型公益合作类型的合同，在这些合同中贯彻契约精神、伙伴意识的条款，并倡导各方去使用这些范本。这样可能更为实际。

N：多年来，行业一直在倡导草根 NGO 与基金会或企业合作双方需有伙伴意识，但就目前行业现状来看，契约精神和伙伴意识都相对淡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又可以如何推进呢？

F：契约精神和伙伴意识的相对淡薄，不单是发生在公益行业，在成熟商业社会的某些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形，行业垄断、资源集中、竞争缺乏都是其原因。目前公益事业刚刚起步，公益需求大，资源匮乏，草根 NGO 比较弱小，不平等关系可能会长期存在，契约精神和伙伴意识的基础不够牢固。

但另一方面看，公益机构圈子较小，各方的理念并未僵化，绝对性的行业垄断尚未形成，有利于通过行业的倡导实现对话和沟通，达成公益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并推动契约精神的树立。

来源：NGOCN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809>

[【返回目录】](#)

NGOCN：厦大学生联名“撑”博导：性骚扰共犯结构中的“好心人”

你指出这种关系的真相，提出性骚扰的控诉，很可能打破了环境中的某种平衡，而被视为不识抬举的异类；得罪的不见得只有骚扰者，很可能是工作环境里的大多数。厦大历史系学生的联名信，无法证明任何人的清白，却再一次证明了性骚扰共犯结构的存在。

厦大女博士生“汀洋”投诉博导性骚扰的事件，调查尚无进展，却有122名厦大学生隔空发声，联名为博导的师德背书，对投诉者进行指责，对于正在舆论漩涡中的大学，我的感受是：“有这样的朋友，还要敌人作什么？”

任何针对机构内的人员职业道德的投诉，都可能伤害机构的声誉；然而，只要指控者不是诬告诽谤，她就无需为这指控的后续媒体效应负任何责任。举报和传播，只要没有捏造事实，都是个人的权利，也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叫板强势一方的必由路径。何况厦大无需为内部任何一名学生和雇员的行为负无限责任，只要它向社会表明，对于内部的性骚扰行为，有着透明公正的调查程序，并且立场坚定地反对这类行为。

这些联名者声称：“我们愿意实名以证：吴春明教授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老师，‘汀洋’在微博中指控吴老师利用导师之便对众多女生行不轨之事与事实不符……”逻辑上，如果有更多学生具名指控某博导确有性骚扰的行径（很多时候这类行为都不仅仅针对一人），确实能够作为举报者的重要旁证；但是，其他学生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经历过骚扰、性交易和渎职行为，并不能证明性骚扰和渎职不存在。

更有趣的是，这封联名信对举报者出示的证据——酒店赤裸上身照没有作任何解释（正常师生关系很难接近到这个隐私距离），却对博导的学术成就和师德大唱赞歌，真让人哭笑不得：性骚扰——尤其是交易型的性骚扰，怎么可能由不起眼的小人物实施呢？实施者通常都是功成名就高位权重、在关系中拥有权力、外部形象良好的人啊！

厦大学生这封联名信，反映的是一般人，尤其是“共犯结构中的好心人”对于交易型性骚扰的错误理解。

法律问题道德化的搅混水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因为偶然的機會揭示和描述了职场内部性侵害发生的机制，我从此成为各路朋友的一个大树洞。我知道的故事，一些已经报道出来，另一些并未事发，尚未事发的单位，性骚扰实施者目前都还是媒体宠儿和正义的化身。

2005年，全国人大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订，尽管妇女法学界准备了一大堆反性骚扰立法的建议文件，最后写入法律的只有一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可是对性骚扰的定义和表现形式，法律未作细则规定。在妇女法学家呼吁之下，一些地方性立法明确了用人单位犯骚扰责任，但毕竟国家立法缺位，发生在教育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很难被惩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害者能够得到的法律救济很少，性骚扰就是以这种“尚未事发”的状态，成为生活中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法律缺位，再加上为厦大事件媒体信息披露的不准确和不均衡，以及举报者不按牌理出牌，关于此事引发的言论误区颇多。譬如微博@彭晓芸等说，性交易归根结底是女性的问题，是有些女性“智小而欲大”，想“不劳而获”，认为女性只要找职业能力能被社会看见的职业（譬如运动员或学术研究）就能规避潜规则；要么就是“汀洋”或“青春大篷车”（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这是两个人）自己既然接受了交易，又有什么理由出来举报，举报者自己是“撒泼打滚的女流氓”之类。

先且不说@彭晓芸自己举例的“职业能力能够被看见”的体育或学术领域都是性骚扰的高发区，荒谬之处还在于，这件事情最后变成了挑剔举报者的道德水准，张扬被举报者的师德水平，而事情最具公共性的部分隐匿不见了。

事件的核心，并不是双方的道德水平，而是相关的人有没有利用自己作为上司（博导与博士生的准人身依附关系是既定事实）和老师的优势身份，与下属和学生发展性的亲密。只要发生了，而弱势的一方表示自己当时别无选择，性骚扰便成立了（并且不会因为一方顺从、没有反抗，而改变性质），其他方面再多的道德文章也是枉然。

性骚扰者的主场

教育和职场的性骚扰，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首先这类行为非常隐蔽，它们通常都发生在实施者“主场”的空间：办公室、研究室、出差时上司让下属到自己下榻处——不像公共场所的骚扰，骚扰者无法掌控环境，容易被抓现行。之所以“主场”，是因为双方关系中，性骚扰实施者大多数是强势一方，他们能够决定见面的时间地点，掌控双方的互动形式。

再者，实施的方式，也通常不着痕迹，只要寡人有疾，越是身居高位的骚扰者，越是连暗示的功夫都可以省去。中央编译局事件中，常艳固然是准备好钱、色双管齐下去贿赂学术官员衣俊卿，但整个过程中，衣顺理成章、无缝对接的接受过程也让人目瞪口呆。以他的学术和政治地位，自然是顺者昌逆者亡，但关键是，他说都不用说——要么出局，要么交换。

与上司搞好关系，是获得发展机会的基本前提，这是职场常识。如果你的领导找你去他房间谈工作，到了房间他（她）像对恋人一样追求你，或者深夜谈好工作来句淡淡的“别走了”，甚至仅

仅眼神和身体语言，你能抓到什么把柄？难道还指望等你按下录音键，TA说：“你陪睡，我让你上位吗”？遇到这种事，无论男女，即便是巧妙、客气、不失尊严地回避过去，事后难免对自己的前途惴惴不安。按@彭晓芸的建议是遇到这种上司就该撤离这个职业领域，可凭什么该离开的不是骚扰者？人们凭什么要因为做一件对的事、表达自己的意愿而遭受职业挫折？职业环境凭什么要求弱势一方卖艺加卖身，接受性的不平等条约？

在有性骚扰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性骚扰通常被分为两种：敌意环境型的性骚扰和交易型的性骚扰。前者包括以色情化和性别歧视的方式对待同事，讲黄段子，要求长得漂亮的同事陪领导，逼迫性的劝酒陪酒（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女教师王炎因此而在饭局后被性侵导致其自杀，女公务员、女教师在这类场合被骚扰性侵时有发生），不顾对方不欢迎而发出与性有关、针对对方的语言和动作等。后一种，就是以是否发生性关系作为业绩考评、给予各种机会的条件，相对来说，后者更为隐形。

无论哪一种，因为中国目前没有反歧视专门立法，社会大众对性别歧视不仅没有警觉，反而常常把肉麻当有趣，在这种文化氛围支持之下，骚扰者往往觉得自己没错——是啊，“爱慕”、“关心”一个下属或学生，或者向她们求关爱，至于说说黄段子、点评同事是否性感、上下其手吃吃豆腐的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开玩笑”而已，甚至是一种友善的表示，“放不开”是被骚扰者的事情。

举报投诉被骚扰的人常常被视为不合群，性格怪异。得罪上司，通常意味着大多数他的下属也会跟你保持距离；再者，你觉得被骚扰怪恶心的，没准有些人因为拉近了跟领导、业界权威的距离而沾沾自喜呢。你指出这种关系的真相，提出性骚扰的控诉，很可能打破了环境中的某种平衡，而被视为不识抬举的异类；得罪的不见得只有骚扰者，很可能是工作环境里的大多数。厦大历史系学生的联名信，无法证明任何人的清白，却再一次证明了性骚扰共犯结构的存在。

常艳事件之后，我从相关学术圈子听到的传言，是认为男方很冤，认为男方是位好学者和好领导，而常艳则被描述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女疯子。我看常艳十几万言的记录中，男女双方无论是性交易还是金钱交易，都是比上便利店还平常的平常心。这样普通人惊心动魄的情节都撼动不了“好学者”“好领导”的评价，这中间的利益勾连和结构性共犯是多么的难以动摇。“正常”人要么躲开，要么沉默，所以，打破平衡的人，真是非要有疯子的奇葩个性不可。

没错，当年指责男导演潜规则女演员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张钰，说出学界权色交易的是个自恋成癖，忽忽如狂的常艳。因此，厦大历史系学生跟澎湃新闻记者说“汀洋”性格孤僻没朋友，一点都不出奇。

性骚扰就是性别歧视

当事件媒体化，集体的声誉受挑战，自认为凭着实实在在的能力上位的人，尤其是与举报者同一性别的人，会认为举报者声称的事实是对自己的冒犯。这也许是一些女学生加入厦大联名信的原

因。

美国第一位神经外科女教授 Frances K. Conley 在她分析医疗界性别歧视的著作《不与男孩同一国》中反思，自己刻意将自己“中性化”，对周围女护士们遭遇的歧视和骚扰总是视而不见，直到自己登上学术高位而因性别歧视升职失败，才知道自己的境遇与女护士们是一体的——处处贬低自己纵然是名医仍是“小姑娘”的竞争对手，也是性骚扰的老手。

职场和教育性骚扰发生在最有效率的现代组织中，这些组织不仅影响的是人们最难忽视的利益，而且组织内部有强大的规训力量，让内部人员认同组织的决定和规则，排斥秩序挑战者、恢复常态。

由于被骚扰的往往是弱势一方，而骚扰者在机构内位置更重要，或者根本就是一把手，很多单位接到性骚扰投诉之后，对策是保住骚扰者，让投诉者被孤立，被暗示或者迫使辞职退学，都是经常发生的故事。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规则的时候，需要处理的状况之一。类似像厦大这样内部人起来指责投诉人，为被投诉人辩护的公开信，不管是只递交给调查组，还是向媒体公开，都让举报者处境更为困难，且有惩罚举报者的意味。这也可以被视为阻止性骚扰被调查和惩处的“敌意环境”，它的目的就是让投诉者闭嘴。

女性大规模、成制度地进入家外职业领域，也仅有一两百年，大多数职业领域，尤其是管理位置，仍是男性主导，这是不争的事实。严格来说，性骚扰当然可能是女对男，也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但是由于职业领域的性别结构使然，大多数性骚扰是男性针对女性。

Conley 的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讨论了男性文化如何与特定的专业结构结合。不仅仅从医学图例总是以“70 公斤男性”作为范本，更重要的是，性骚扰已经与一些专业的“仪式”结合——譬如，女护士们手术前消毒好双手后，男医生会搂抱磨蹭她们的身体，而护士们不能反抗——重新消毒会影响手术进程，而有权力评价她们手术表现的，就是医生们。

作为女性鲜少涉足的高精尖医疗领域的学生，Conley 尽管有着斯坦福教授子弟的“二代”优势身份作后盾，她仍需要自我调适，不仅在专业上加倍努力，更多的是认同男性医学精英，对这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行不介意，不闻不问。

经常有厌女言论认为，女性要在职场出头，必须把自己“中性化”；普遍的说法是“职场是不分性别的”，然而，事实上职场从未去除它男性化的一面，它要求去除的“性别”，是女性安排时空的习惯，和对尊严和性的感受——前面所列举的性骚扰种种表现形式，从劝酒、三陪、黄段子，到商务会谈场合时间的安排，基本上是以异性恋男性的性需求为中心，不仅普遍存在于职场，并且已经成为“日常仪式”。这些言行的存在，等于宣称女性从业者属于次等性别——你要负责美丽性感、负责陪伴和服务，你的意义在于你的性可以被消费，而不是你的专业能力。

男性主导的职场文化再一次把女性分为两种：“中性化”和“性化”的，她们扮演的角色各不

相同，生存的策略却只能一致：扭曲自己的认同，对性别歧视的职场文化缄口不言。一个对性骚扰宽容的工作环境，不可能对女性有公平的评价体系，同样，性别歧视就是性骚扰的温床。当中国女生在大学教育领域占据比例越来越大，我们听到各种男学者公开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这也可以视为高校性骚扰兴盛的隐性指标。

“非自愿”和“不受欢迎”

通常，人们对性侵害和性骚扰受害人的同情，以她们“不自愿”作为前提；通常，舆论会要求这些受害者能够证实自己的“反对”和“拒绝”和“反抗”。如果这些人顺从了，事情就变了性，从“强奸”变成“和奸”，“性骚扰”就变成了“性贿赂”。

不过，在社会生活中，表达意愿并非在真空之中发生；我们在很多时候难以表达意愿，因为我们不在那个能够表达意愿的位置上。譬如三更半夜你的领导说有紧急工作任务，你能说不吗？你的老师先是当众狠狠剋你一顿，之后又处处抬举你，这下他找你去家里谈心，去还是不去？放在没有权力关系的情境下都可正常拒绝的事，在权力关系之下说“不”很难。

我们苛求被害人道德上的洁白无瑕，是来自我们对权力关系中人的处境的失察。上下属、医生与病人、教育监护者与被教育监护者，双方权利严重不对等；我接触过很多性侵害和性骚扰事件的受害人，她们确实因为种种被“削权”的情境，而失去了表达“反抗”和“反对”的机会。

譬如，一位受害者，她的家人在自己亲身体会一位“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服务机构任职，但因境外身份无国内执业证书）的“奇效”之后，充满信任地将受害者交给“老师”，期待被“治疗”者能够去除多年的心理隐疾。而这位老师先是推荐催眠疗法，然后在夜晚、密闭卧室中告诉受害者，跟他发生性关系是治疗的一部分（咨客的心理障碍与性有关）。当发觉情况不对的家人知情时，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最后，当着我们的面，这位“咨询师”承认他与咨客发生了性关系，但后者是“自愿”。此时警方虽然介入，但无能为力，因为咨客早已成年，警方无法认为性行为是强奸。

我还接触了广州城大学城成功学培训师黄波的很多受害人，黄波与她们的关系，混杂了老师与学生（参加成功学培训营）、雇主与雇员（其公司用传销模式雇佣学生推广）以及心理咨询师与咨客（黄有心理执业证，以“心理咨询”为借口与学生单独相处）的关系。在课上猛批一个人让她丢面子，然后再夸她，是最后受害者们总结出来的辨识其他受害人的不二法门，黄波用这种方式显示他的话语权威，轻易左右轻女孩在同侪中的位置，这是常用的、但不是唯一的伎俩——厦大举报者也如此总结某博导的行为。他在心理咨询中取得学生信任，学生大哭倾谈自己的心结之后开始性的触摸。他在声称要着力培养某人，让她留在自己房间喝酒实施性侵。侵害者对自己在每一个节点被拒绝的可能，都有清晰的算计，对自己权力影响的方式，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性骚扰发生的情境复杂，被举发的状况也很多样。很多职场性骚扰、性侵害受害者出来举报的

时机，往往不是因为她们拒绝了骚扰，而是因为不愿意再忍耐。可能是忍耐超过极限，譬如被骚扰者想回归正常生活；也可能是结束了孤立无援的境遇，发现了反抗的同盟者；或者是交易破裂。

譬如，美国的 Meritor Savings 银行 Mechelle Vinson 案，身为女性的 Vinson 担任分行助理经理，是被男上司 Sidney Taylor 一路拔擢，从介绍进银行，到最后进入管理岗位。但是，Vinson 后来起诉在两三年间被男方强迫发生性关系四五十次，直至自己找到男友之后关系才断，但男方仍然不断对她进行性方面的纠缠，并且不断使其工作环境恶化，譬如工作上穿小鞋，篡改她的人事记录、在其他员工面前羞辱她等，最后将其辞退。这个案子在初审法院被认为是“两情相悦”而不是性骚扰，银行也不要担责；但是，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却完全推翻初审判决，最高法院认为，性骚扰问题的关键，不是被害人是否自愿，而在于是否受欢迎。而银行虽然有一般性的性骚扰防范制度，但在这个个案上却对女方的申诉没有支持，因此要负法律责任。

因此，当事人是否屈从于施暴者的性要求，并不能改变施暴者行为的性质。如果我们认可，一个人受教育和职业发展是基本人权，那么有任何人给这基本人权加上任何门槛以满足自己欲望，那都是侵权。

近年来，关于“同意”的司法实践，我知道的最为前卫的司法案例，是东莞的芦禹安案，卢在举办产品营销培训班时，以帮助女学员突破心理障碍为借口，将女学员叫到芦的房间内相处，声称只有在其面前脱光衣服并与其发生性关系后，才能突破不敢与陌生人沟通的心理障碍，从而提高营销业务水平。他以这种方式强奸了 9 名被害人，这些人都已经成年。但法官最后以强奸罪判处了他 11 年徒刑，关于受害者的意愿，法官有一段论述：“上诉人使用欺骗手段，逐步削弱、麻痹被害人的反抗意志，使被害人陷入无法强烈反抗乃至不知反抗的境地，被害人在此状态下反抗不强烈乃至放弃反抗都不能被视为‘同意’发生性关系……行为构成强奸罪，上诉人的无罪辩护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社会不平等让人们处在复杂的权力格局中，“自愿”深受权力位置的制约；这也是各国的性骚扰立法中，给优势一方更多责任（包括日常行为规范，以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并且要求机构负起防治性骚扰责任的原因。深究各方的道德无助于解决问题，建立规范才是对各方最好的保护。惩处性骚扰不仅仅是对个体越轨的惩戒，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促进。

在厦大学生发布支持博导的联名信一周之后，网上出现了另一群厦大校友致信厦大校长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规范的联署，她们希望母校从危机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范再次发生。两群校友的诉求，到底哪个对学校更有利，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NGOCN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823>

[【返回目录】](#)

华西都市报：政府购买服务“上架” 社区“雇员”转向社会组织

《四川省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19日经省政府门户网站对外公布，我省确定了7大类共计267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内容。其中包括政府部门公车租赁服务向社会力量购买，以及保障性住房信息（房源信息等）征集与发布等辅助性服务，高校毕业生人事档案管理，公益性学前教育等。

今年我省将在部分省直部门选取一些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项目进行试点，2015年至2016年在全省逐步推开。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雪梅认为，此举将催生和壮大一部分社会行业，如汽车租赁市场这块蛋糕必然变大。

买什么？267项服务内容 向社会力量购买

今年3月，成都市武侯区首批139个区级部门下沉社区政务服务事项集中“上架”，由各方社会组织竞价承担。接下来，解决居民买菜难问题的“菜宅送”进入了簧门街社区，社区还发放给低保户每月50元的买菜固定经费；玉林东路社区自培育组织“睦林长者互助社”引导社区1000多位老人相互陪伴与帮助……

与民生密切相关领域的服务由社会组织承担，恰好是反映在《目录》内容中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内容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优先安排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和项目。

《目录》共确定了7类一级目录，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社会管理服务事项，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技术服务事项，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和技术性事项，政府维持自身正常运转所需服务事项，以及其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细分为267项内容。涉及教育、人才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救助、法律援助、行业资格认定和准入审核、行业调查、法律服务、绩效评价、公车租赁服务、机关物业管理服务等。

怎么买？570余名社区协管员“转移”到社会组织中

今年3月武侯区正式启动政府购买区级部门下沉社区政务服务事项后，原本被赋予提供社区综合服务职能的570余名协管员，在“平稳转移”的原则下，转移到社会组织中，进入了政府购买服务市场。晋阳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含荣介绍，此前在社区综合服务站工作的20名政府雇员（社会综合协管员）全部与社区解除劳动关系，目前包括书记、主任在内，社区工作人员只有8人。

社区综合服务协管员与社区“脱离关系”，分流至社会组织等机构，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后的结果，按照“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在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行业协会脱钩等相关改革必须衔接，做到“费随事转”。包括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以防“一边购买服务、一边养人办事”的现象。

热点

政府用车

开始纳入租车行业对公经营范围

昨天下午，成都市民高小姐的手机里弹出一则短信：“你好，我们公司是某公司，公司有各种大中小型号车辆，专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租车服务……”作为一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高小姐的思绪一下跳转到了前日公布的《目录》上。

“公车租赁服务—‘购、用、养、修’服务”，《目录》将政府维持自身正常运转所需服务中，涉及公车租赁的服务确定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的内容。“这对整个租车行业来说，肯定是利好消息，”成都锦宏商务旅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告诉记者，公务用车租赁走向社会化、市场化，意味着会有一个崭新的市场。

尽管有不确定性，成都各汽车租赁公司已经在行动。记者调查了解到，从今年起，包括锦宏、雨龙等本地租车公司，已经把政府公务用车纳入对公经营的范围。

同时，本地某小型租赁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正在考虑量身定制政府青睐的车型，“即使是政府租车，也可能细分成政府接待行为租车，或者政府工作人员出差租车等不同情况，不同的情况意味着会有不同细分市场，我们可以抓住不同的市场。”高小姐已经感受到了租车公司的急不可待。

解读

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雪梅

观点 1

租车市场“大蛋糕”

好看，未必容易吃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雪梅称，“社会能做和适合社会做的事情，过去没有机会做，今后有了机会，都将受到刺激，必然都会蓬勃起来。”租车市场这块蛋糕或许会很好看，但未必容易吃。她指出政府租车不同于一般消费者租车，对租赁公司的规模和实力要求会更高更严格，甚至需要新的服务规范等，“可能会导致租车行业大洗牌，小的租赁公司或许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租赁公司也要细化服务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观点 2

公务用车租赁、公益性教育或将迎来行业大洗牌

张雪梅认为，《目录》上涉及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的服务分为三大类，包括执行类，调查研究类和中介评估类，由此她表示，未来可能催生或壮大市场蛋糕的行业与这三大类息息相关。张雪梅

觉得，对相关行业的刺激有多大，最核心的关键是政府对该政务服务的财政投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在既有政府综合预算安排中统筹安排’这点要求，就已经决定了相关行业的市场有多大。”诸如公务用车租赁服务，公益性学前教育和公益性义务教育等，或将迎来相关行业的大洗牌。（华西都市报记者李媛莉）

案例

南京幼儿助学券

为全市家庭省下 3100 万

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南京市全面实施幼儿助学券政策，本质是政府向符合相关规定的幼儿园购买学前教育服务，以抵扣相应保教费的形式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在园幼儿。目前南京市公办园的在园幼儿数为 97625 人，占到了全市在园幼儿总数的近六成，换言之，助学券每年将为全市幼儿家庭共计省下约 3100 万元。

来源：华西都市报

地址：<http://www.wccdaily.com.cn/shtml/hxdsb/20140721/226881.shtml>

[【返回目录】](#)

新疆经济报：那些公益组织为何消失了

新疆青年组织促进会有一份公益组织的花名册，记录有各个公益组织的信息。该会副秘书长刘李云告诉记者，花名册上登记了 150 余家公益组织，目前，他们已和上面的 20 多家公益组织“失联”，“我们会定期对公益组织做回访，但这 20 多家电话打过去不是号码换人了，就是长期关机，平时也听不到他们搞活动的消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团队发展的情况。”

记者统计发现，这些失联的公益组织成立年限多为 3 年左右，最长不超过 5 年，其主要服务领域是助学、助贫等。有的公益组织还保留着用于联络的 QQ 群，但基本上没人说话，有的则已消失。

缺人：“老大”走了人心散了

小陈是一家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者之一，他所在的公益组织多通过 QQ 群联系、组织活动，帮扶对象以老人和贫困学生为主，平时组织活动较多的是去养老院看望老人，或为贫困生送文具，群里约有 100 多名志愿者，从 2013 年开始团队再也没组织过公益活动，原因是团队主管调往外地工作。

“群主要调往江西工作两年，临走前，他将这个公益群托付给其他管理者，但自从他离开，群里组织活动就变得非常困难。”小陈说，由于交接工作有些仓促，新上任的管理员基本上没组织过活

动，部分志愿者对于新上任的“领导”也不“服气”。

“去年5月，群里发起一个看望残疾人的活动，报名的志愿者寥寥无几，原本需要20名志愿者，后来只有6人报名参加，最后不得不取消活动。管理者逐渐没有信心再组织活动。”小陈说，究其原因，是他们团队没有培养可以接替的管理者，团队失去主心骨后，变得死气沉沉。

同样的情况乌市雷锋车队也遇到过，车队的队长尤佩纪在一次公益活动中，不慎将以前的手术刀口拉伤，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在他住院期间，车队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7月21日，尤佩纪康复出院上班，车队才恢复以前的活力。

“这次经历让我觉得，寻找合适的管理继任者很重要。”尤佩纪说，他已在雷锋车队挑选出两位师傅进行培养，“为了车队的长远考虑，培养管理者很重要。”

目前，大部分公益组织仍处于“人治”阶段，筹款及运作过于依赖个人，在组织建设、管理模式、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都十分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严重的人员流失。

缺钱：提钱伤感情

据了解，首府大部分公益组织在组织活动时，产生的费用由志愿者平摊。在“钱”的问题上，一些人认为公益组织可以找企业拉赞助，可一些相对较小的活动，公益组织是很难拉到赞助的。

志愿者“小幸福”说，他们团队组织的公益活动不大，每次大约需要800至1000元的活动资金，平摊到每位志愿者身上。

“去年冬天有一次，团队打算搞一个慰问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活动，希望大家每人凑100元，为孩子捐赠围巾手套之类的东西。活动方案公布后，几名志愿者表示不愿再参加类似活动，他们觉得自己既出力又掏钱做公益很不“划算”，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后来团队不再组织活动了。”“小幸福”说。

一些公益人士坦言，经费问题是相当数量公益团队停滞的主要原因。

缺时间：非专职难坚持

记者拨打了另一个“失联”公益团队负责人的电话，提示是空号。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另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对方表示该手机号已转为办公电话，不再用于私人，公益团队工作目前处于停滞状态。这名负责人说：“我们团队里的志愿者多是公司内部员工，现在公司工作特别繁忙，只能将公益活动停下，未来会不会继续做，还要看大家的时间。”

刘先生所在的公益团队以前经常组织志愿者参加各种活动，近两个月，他们原本活跃的团队变得有些“低调”。“最近这段时间，部分志愿者工作任务繁重，原本我们经常组织各种公益活动，现在也因招募不到人员而作罢。我曾在群里公布过几个活动，很多志愿者回复说要加班、有事等，不过我们只是暂时休整，等大家有空时我们还会恢复以前的状态。”

来源：新疆经济报

地址：<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571&extra=page%3D1>

[【返回目录】](#)

【资助者说】第14回：谈一谈我眼中的小额资助

作者：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 吴军军

所谓小额资助，是指资金额度偏小的资助，虽没有统一规定，但普遍可认为是5万元以下的资助。以小额资助著称的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lobal Greengrants Fund，以下简称GGF）自1998年开始直接资助中国的民间组织。GGF的平均资助额约为3500美元，合2.1万元左右。目前国内一大批活跃的、较有影响力环保组织，例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安徽绿满江淮、甘肃绿驼铃等在其发展早期阶段都得到过GGF的支持。

然而，国内的基金会却很少采用小额资助的方式，已开展这项工作的基金会也多将其视为“副业”。那么，小额资助到底有何魅力？小额资助管理成本高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小额资助的社会效益如何？在這一期的《资助者说》，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考，为更多的伙伴和基金会提供一个视角。如有不足之处，请海涵和指正。

为什么要坚持做小额资助？

开始做小额资助始于2012年。我经常在公益机构和各项目点之间奔波，也常常和一些一线公益人接触。他们就会问我，能否支持一下小型的公益活动。邮箱里也时不时会有一些公益伙伴们发过来的、期盼提供小额资助的邮件。

这些项目的特征是：周期短（最短的可能只有一天）；资金量小（有的几百、上千元就可以）；多以带动志愿者参与为主要执行力量。这些小型公益项目让资助者很担忧的一点就是：多为一次性活动，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模棱两可。

但据我的观察，对以推动社会变革和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基金会来说，小额资助仍具有很大价值。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每年有大量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对于初创的基金会，小额资助项目可以降低运作风险，并且可以快速累积资助经验。

2013年初，我们看到了一位从广州返乡、进行公益创业的社工做的“驻校社工”方案，即在农

民工子弟学校设立社工站，由学校或老师推荐学生，社工进行个案辅导或小组工作，来降低农民工子弟因长期被人忽视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时这位社工提出的“驻校社工”的公益服务概念在福建地区很新，而且在本地也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借鉴。但通过我们和她一起去农民工子弟学校实地考察，和校领导们会谈，了解到这样的项目与外来务工子弟的需求很契合。但执行人员是否靠谱？这一项目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对于刚刚成立基金会的我们来说都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支持一个社工大半年的行政办公经费（约为3万元左右），看看这个项目的成效到底如何。

一年来，该社工除了在项目执行上兢兢业业，得到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的好评，同时她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发起多方募捐物资活动，吸引媒体来关注民间社工和驻校社工等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2013年底，我们通过对项目的走访、评估后发现该项目值得持续关注，于是决定继续支持该项目并适当调整支持额度。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从原来的1个人发展为3位专职工作人员，并顺利注册了民非组织，目前福建兴业证券基金会也和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2、大多数小额资助项目具有广泛参与的特点，对于企业基金会来说，可以很好地与搭建志愿者平台相链接。

福州有一家从事盲人服务的志愿者机构，每年会策划一到两次“盲人群体去户外游览、感受大自然”的公益活动。尽管户外体验并不是该机构的核心业务，但对于提升盲人群体的凝聚力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时因为照顾一个盲人就需要一位志愿者，志愿者需求量大。

对于这样的一次性活动，按照惯例基金会是不愿意资助的。但在项目设计环节中，他们增加了社会志愿者参与服务的内容，并且整合了社会其他资源一起来举办这样的盲人户外体验活动，比较符合小额资助中“人人公益”的理念；同时我们也及时把志愿者需求和基金会的企业捐赠方对接，企业员工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不仅体现了个人价值，还对公益、对企业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3、小额资助在快速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是极具魅力的。

一位公益伙伴提出，他所在的地区，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对于财务规范都不甚了了，急需在本地挖掘一个有多年财务经验的人，通过学习非营利机构领域的财务知识，来为本土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而目前他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为他提供一笔小额培训和学习经费。

伙伴说尽管现在有不少人才类的资助项目，但均有明确的申请时间限制，往往拖了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申请上。而快速审批、拨款的小额资助，可以让这位财务志愿者马上参与到合适的学习课程中去，并且很快就可以为公益机构服务了。

如何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降低小额资助的管理费用？

单个的小额项目的确很难发挥出影响力，但有意识进行的、一大批小额资助就有可能实现更大的价值。然而，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面对数量繁多的申请，怎样才能有效筛选到“正确”

项目的同时，降低行政成本呢？

从我有限的了解中，目前应对这一难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 GGF 采用的“导师站”。他们在全国几个重点区域，选择在环保领域有丰富经验的、认同 GGF 理念的人作为导师，负责推荐项目以及对项目进行初筛。这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了 GGF 项目官员的工作量，大大提高了项目的精准性。另一种方式就是基金会项目官员主动出击寻找合适的项目，不公开接受雪片般的项目申请。

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和挑战。GGF 采取的方式对于导师要有充分的信任，而且找寻这样热心且有辨别能力的个人难度比较大，同时他们作为个人，渠道也相对狭窄。第二种方式则效率低，规模小，很多时候只能当做兼职业务。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近年来，随着对非营利组织的注册政策和税务政策逐渐放开，很多省市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催生出了一些为本土公益机构服务的平台型机构，它们大多有整体行业发展观，已经累积了相对较多的经验和资源，汇聚了类型多样的公益组织和义工组织，对于本土公益发展现状以及各机构的发展情况也十分了解。

因此，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目前在江西、安徽和福建等地，支持这类平台型公益机构开展小额支持业务。对基金会来说，充分利用了平台型机构熟悉本土现状以及拥有本土公益网络的优势，既能够更快速、更精准的回应本土小额资助的需求，又降低了行政成本；对于平台型组织来说，本身就肩负着整合资源，提升本土公益组织能力的使命。在试验初期，我们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各合作伙伴商量设置合适的微公益资金池，并鼓励他们根据各地的优势开展不同主题的小额资助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对他们给予信任和放权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巧用杠杆原则，让小额资助发挥更大影响力？

今年，除了继续支持平台型组织开展小额资助外，我们还惊喜地看到了它更多的可能性。

2014年，北京农民之子的林炉生终于下定决心返乡进行公益创业，来福建做支持型机构——福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筹）。鉴于他在公益圈的经验 and 资源，我们当时决定把福建的微公益委托他执行。不过他再次公益创业，机构资金量很少，福建本土各方的资源也还比较少。怎样把微公益有限的资金、最大化地用于福建本土公益机构的发展和整体氛围的改善？怎样通过微公益的平台快速地整合本土多方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这是一个大挑战却也是一个大机遇。

他使用的策略是采用资金配比的方式。一方面微公益的3万元，做了6万元甚至更多的事情；另一方面通过配比模式快速建立了其他社会关系，为这些资源持续进入本土公益行业打下基础，还推动了财务透明和为整体发展发声。这样的小额资助策略，结合了机构初创发展的需求以及本土的公益资源现状，比较好地将机构利益和行业利益整合在一起。

在小额资助的世界里，我相信还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还没看到（或者创造出来）。作为一名项目

官员，还得多打开视野和思路，去捕捉和回应现实的需求，努力做到更大胆、更开放、更包容和更信任。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811>

[【返回目录】](#)

善达网：公益机构用微信建立品牌的5个必看攻略

艾德叔叔(公众号 ID: UncleAid)，一家专注制作原创儿童安全动漫的社会企业。他们靠创意和传播的专业支持，针对儿童安全教育的滞后，致力于为孩子们提供互动娱乐性强的安全知识，用动漫形象来传递安全应急自救知识。目前开发了满足4-10岁的安全知识系统课程、教学教具、动漫故事绘本等。

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目前有3万多订阅用户，腾讯新闻客户端也有一万左右粉丝，这虽然不比诸多微信大号，但比起一般的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已经高出很多，不但活跃度很高，每天文章的阅读量也很大、粘性高。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最近，艾德叔叔创始人之一邹立晖就这个问题接受了善达网采访，下面是采访记录：

Q：众所周知，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微信关注都比较低，请问您是通过什么手段进行微信推广的呢？有没有可以供公益组织借鉴的推广策略呢？

A：关注低不是因为推广不好，是因为内容和体验太差。没有哪个普通用户会天天关心这个NGO又搞了什么活动，又收到多少捐款，又资助了多少个儿童，又有哪位领导哪位明星关照了。用户关注你是因为你有用。做微信公众号需要用产品经理的角度去思考，你带给用户什么价值？定位清楚之后，就明白自己要服务什么人群，就去这些人群出现的地方推广自己。

Q：请您分析一下公益组织的不管网站流量还是微博微信关注都很低，您认为其原因是什么呢？

A：因为用户在你这里得不到有用的东西。用户感觉是跟一个冷冰冰的机构打交道，不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沟通。所有打着“小编”旗子的官微博、公众号都会死，更别说连“小编”都没有的高大上NGO。

Q：作为公益组织是否要在内容选取方面多下一些功夫，您觉得什么样的内容更受公众喜欢？

A：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用户是谁，才能知道他们的喜好。像艾德叔叔 UncleAid，定位就是服务0-10岁的妈妈，向他们传播日常生活中实用有效的安全知识。用户定位清晰，内容定位清晰，再去

探索用户的喜好，什么样的安全知识才是他们喜闻乐见的？简单的、可操作的、亲身体验的、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列表式的、总结式的……只要坚持做下去，就能摸清楚。

Q：有某互联网专家批判公益组织，说他们只是简单的把线下业务搬到线上，完全没有新意，没有以用户为中心去塑造产品，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A：赞同。不仅仅是没有新意的问題，而是没想明白自己要干嘛。如果没想清楚，那还不如不做。国外包括香港都有很多 NGO 是从来不使用什么互联网工具的，一样做得挺好。如果 NGO 想要使用互联网，请招一位靠谱的产品经理。

Q：您认为公益组织利用互联网作为传播工具最缺乏的是什么？

A：首先，将互联网作为传播工具就已经是一种偏差。互联网本质是一种生产工具，要根据互联网的特性和自身的属性，设计基于互联网的公益产品或品牌，然后通过耐心树立品牌的人性化特征，建立优异的用户体验，再寻找到恰当的引爆点，将产品的设计—体验—传播—销售—服务形成一个闭环。

来源：善达网

地址：<http://sdg.shanda960.com/article/1530>

[【返回目录】](#)

白鹤：筹款可以很休闲

“休闲式公益筹款活动”其实是“行走类公益筹款”的亲戚，因为这两个类型的活动有着太多相类似的基因。首先都是民众类的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社会人群，而不是特定的、单一的人群，比如捐赠公司的员工等；其次，基本上这两个活动都是在户外进行的；第三，现场参与人也是捐赠人。所以总结起来这就是大型、户外、群众性活动。

大型、户外、群众性活动考察的是一个基金会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对外资源拓展的能力，几乎所有的户外大型群众性活动都必须得到政府和传统公众资源的支持。同时它还考验基金会筹集善款的能力，包括商家给予的捐赠赞助、参加活动的个人捐赠等等。

“休闲式公益筹资活动”区别于“行走类公益活动”的特点就在“休闲”两个字，它不是骑自行车，不是跑步，不是徒步走，而是一切能让参与者舒适的、有意义的、欢乐的大派对，是一个体会生活美好的时间段。到底什么样的活动才是“休闲式公益筹资活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黄鸭快跑”欢乐休闲活动吧。

在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每年都会举办“黄鸭快跑”的比赛，善款捐赠给 PA Research Foundation 基金会用于对癌症的研究。这场休闲活动的主角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小黄鸭，参与者按个人或家庭或朋友团队购买小黄鸭，然后得到一个参赛编号。比赛当天，成千上万只小鸭子被统一倒入河道之内，在规定的“赛道”上游泳，第一名获奖者将得到一笔不菲的现金奖励，参加完游泳比赛的鸭子也将集体收回，用于来年的比赛使用。

布里斯班每年的这一天都极为热闹，全城老少齐出动，观看鸭子比赛。很多人为了纪念这一有意思的活动，还会购买活动的很多产品，比如鸭子头饰的遮阳帽、钥匙链、签字笔，当然更多人买的是能拿回家去摆放的一只仿比赛鸭。为了让这只塑料鸭子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人们都为它精心打扮，带泳帽和泳镜的都根本不算什么，更有甚者还为它穿西装打领带，有的给鸭子带上披肩假发，整个活动现场就是一场超大的嘉年华。在公共区域有活动主办方贩卖的各种饮料、食品，以及供宝宝娱乐的蹦床……这些收入全部用作慈善。除

此之外，商业的宣传、广告的收入也是一笔善款的来源。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都能知道什么是休闲式筹资活动了吧。你可以不爱参加体育活动，但是每个人都有其休闲的方式，所以如何能利用休闲的时间，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有趣味性的、有公益商品、传播公益文化、有品牌价值的活动是我们各大基金会应该思索的，而不是一股脑扎堆都去行走，都去跑步。

让公益成为一种休闲，让利他成为一种时尚。

文/白鹤 公益人俱乐部“十一座”创始人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zhuannlan/baihe/2014/0723/6778.html>

[【返回目录】](#)

褚葑：公益行业价值链缺失

“价值链”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他认为，企业的全部生产活动，包括设计、生产、销售、发送等，都在为企业创造价值做出贡献。这些活动集合在一起，就是一条价值链。所以，企业间的竞争是整条价值链的竞争，而不是单个环节间的竞争。

笔者赞同波特的观点，并且认为，价值链并不仅限于单个企业，也可以放大到整个行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行业同样是一个巨大的价值链，其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在为该行业最终的价值产出做出贡献。虽然在行业价值链中存在着同类主体间的竞争，但是，不同类别的主体间的相互合作，并为整条价值链的最终实现贡献力量是主流。

行业价值链需要多个中心，在中心内部构成竞争管理，而在中心之间则构成合作关系。在经济领域，我们能够很轻松地找到四大中心：金融、实业、咨询、研发。其中，“金融”提供了资金流的支持，实现资金的高效流动；“实业”提供最终产品；“研发”提供智力支持；“咨询”提供的是品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产品，促进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这四大中心相互合作，推动经济领域一路高歌猛进。

公益行业也是一条巨大的价值链，其内部同样具备四大中心：金融、实业、咨询、研发。这四大中心对应四类主体：基金会、民非、咨询机构、研究机构。这四大中心的紧密合作，确保了整条价值链的最终实现。

那么，我国的各类机构是否发挥了上述职能呢？结论是否定的。

第一，各类基金会的定位严重偏移，承担的职能其实是“实业”，而不是“金融”。绝大多数基金会都未能成为“管道”，承担“聚财、生财、散财”的职能，而是去和民非组织“抢饭碗”，开展各类公益项目，仿佛自己就是一家硕大无比的民非组织。所以，其最擅长的并不是品牌管理和筹资，也不是资产管理，而是执行各类公益项目。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完全看不到的，美国的私有基金会中绝大多数都是资助型基金，规规矩矩地扮演着“管道”的角色，发挥着“金融”的职能。

第二，为数众多的民非组织虽然承担了“实业”职能，但却不足以撑起整个中心。我国的民非组织受到多面夹击，加上其本身实力弱小，能力不足，所以无法单独撑起一个中心。其大都堆叠于一处，在一两个具体的领域（教育、济贫等）中发起各类项目，而对为数众多的其他领域视而不见。由此，在其“主政”的中心内出现了多处空缺，这些空缺成为公益行业的市场盲点，并引来了数量众多的商业机构。这种越俎代庖的情况在国内十分常见，而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才是“正宫之主”。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业务领域相对分散，且机构数量众多、能力完备，丝毫不惧怕商业机构的竞争。

第三，“咨询”职能几乎完全空缺，因为咨询机构几乎看不见。受到市场空间的影响，我国的公益咨询机构连生存下去都存在困难，也就更别提发展壮大。由此，这个中心也就难以放量增长，而只能等待其他中心先行做大。

第四，“研发”职能完全偏移，因为现有的研究机构大都是政府的帮佣，而不是市场的弄潮儿。我国公益研究机构大都是体制内的机构，其虽然也有市场化的冲动，但受到自身身份和市场空间等多方面的影响，几乎一边倒地承接政府的各类项目。由此，其研究成果只能供政府参考，与市场实际需求完全绝缘。在这种情况下，其也不足以撑起“研发”这一中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公益价值链几乎完全坍塌。在整个价值链中，连一个中心都没有构建起来，就更别提四大中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想象公益行业在社会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自身的病态状况导致其难以应对社会的各种现实需求，乃至各类社会问题只能被搁置，或者由政府包揽下来。这也就是说，公益行业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社会上其自身就是一个弱势的存在，就更别提帮助弱势群体，服务社会大众了。

随着公益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行业产业链构建是必然趋势。我们在推动行业转型时，必须多点开花，齐头并进，而不能专宠一方，导致行业价值链的缺失。否则，从世界上的成熟经验看来，其前景堪忧。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7/22/content_9371.htm?div=-1 [【返回目录】](#)

顾远：限制催生创新：一个击败冰箱的非洲“罐中罐”

前不久在一次活动上我听了一些年轻人分享自己的创业想法。其中的一位创业者表示自己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一种有意义、成本低、售价可以高、大众又都接受的产品来卖，做到一炮而红？”我把这个问题发在了自己的微信上，很快就收到了包括“卖人、卖笑、卖彩票”在内的各式回答，现场气氛一片欢乐祥和。

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创业当然不会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创业，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发生的。“约束条件”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时间，可能就是每个人做事情时最经常面临的约束条件。很多人不喜欢有约束，认为限制了自己的行动，特别是限制了自己的创造力。有时候的确如此，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比如“急中生智”的情况，再比如微博内容140个字的硬约

束，催生了多少精炼隽永的段子和不明觉厉的表达。

对那些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言，创业时面临的约束自然不会少。不过今天这个时代，创业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资金可以众筹、行政可以外包、场地可以联合办公、工具可以免费下载……这些创新正是被那些创业时常见的约束催生出来的。还有一类约束是针对解决方案的。它们要比创业本身的约束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更不易识别，而一旦正视这些约束，则可以催生出许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社会创业领域，这种情况尤其突出。

前年我去尼泊尔旅行。在首都加德满都的一家公平贸易商店里，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是从自助游宝典 Lonely Planet 上知道这家店的，所以它在当地应该属于有很好品质的店。从建筑规模和装饰风格上看，也的确比市内一般的店面高出几个档次。在结完帐后，我注意到给我的小票印记非常模糊，只有在太阳的强光下才勉强看得清上面的内容。显然，按照“正常”标准，店里的打印机早就该更换墨盒了，而根据我对当地整体经济水平的判断，没有更换的原因十有八九是因为钱。问题在于，这样够上一定档次的店面却提供如此印记模糊的小票，我大概可以判断要么它的消费者可以接受这样的打印品质，要么压根就不在乎。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的创新性解决方案：设计并向当地推出一种打印效果只能勉强可见，但是却非常省墨的打印机。这种方案与一般的商业思路正好相反，不是推出品质更高的、技术更先进的产品给用户，而是针对他们的需求推出“刚好够用”的产品。这样既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又满足了“购买力”的约束条件。当然在同样的约束条件下，还可以有其他的解决方案，读者们不妨动动脑筋。无论是怎样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必须首先基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小票只是工具、打印只是手段，它们究竟要满足的是什么需求呢？现在让我们来解决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农民把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运到乡镇的集市上买，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天气炎热，东西运到集市时已经不新鲜了，卖相也不好，所以卖不出好价钱。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小农户来说至关重要。

要怎么解决呢？最容易想到的解决方案自然是冰箱之类的产品。我们可以把市场上现有的冰箱做减法，像上面提到的那种打印机一样，只提供“刚好够用”的功能，还可以减少相应的零部件，说不定还能微型冰箱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市场。

然而现实是，遭遇这样境况的农民往往家境贫困，冰箱成本和价格降到再低，还是买不起；即便买得起，当地也难以保证供电，农民自己又买不起发电机和燃料；再退一步，如果冰箱坏了，谁会修呢？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都必须直面这样一些约束条件：无需用电、使用本地材料、可以本地制造并维护、价格低廉。

在这些约束条件下，非洲的社会创业者们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异乎寻常的解决方案。他们用当地的粘土为材料，制作出一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把小罐子放在大罐子里，中间的间隔空间里装满沙子，

再倒上水把沙子浸透,把瓜果蔬菜放在小罐子里,用一块布覆盖住整个表面,运输途中时不时往沙子里和布上浇些水,一个简易的冷却系统就完成了。不要小看这么简陋的设计,它的冷却效果足以保证瓜果蔬菜在运到集市上时仍然会是一副新鲜可人的模样。更奇妙的是,天气越热,这个冷却系统的效果就越好。至于为什么,翻一翻初中的物理课本就会明白。这个名为“罐中罐 (pot in a pot)”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成本只需 2 美元,却为使用的农户们带来了 25-30%的收入增长!2010 年,它被美国 CNN 评为年度“改变世界的十大小主意”。

试想,如果没有之前的那些约束条件,如果创业者们都在一门心思地想着改造冰箱,还有谁会想到这么简单实用的“颠覆性”创新方案呢?

经常有一些社会创业者慨叹自己的解决方案是多么的美妙,只可惜当地的条件不具备,所以难以实现。这种“因为自己有了一把锤子,所以满世界寻找钉子”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总是需要先明确约束条件,再探索如何满足、甚至利用这些约束条件。创新,特别是社会创新,重要的不是“缺什么”,而是“有什么”,因地制宜,将寻常之物做出不寻常之用。

为了训练社会创业者们对于约束条件的敏感和约束条件下的创新能力,我在工作坊中经常会设计这样一个活动:让参与者列出某项寻常事物发生的各项必要条件,然后逐一去掉,或者变更条件,让大家针对每种情境头脑风暴,构想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让原有的事情发生,同时产生新的解决方案。拿我所关注的教育领域为例,大家不妨构想一下:教育一定需要教师吗?教育一定需要教室吗?教育一定需要教材吗……如果你是教育部长,在教育预算削减了 90%的情况下,你会做些什么……从这些情境 (scenario) 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关于教育本质的洞察,又能激发出哪些改变教育的创新性想法呢?

优秀的创新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发生,而一名优秀的社会创业家,正是愿意热情直面这些约束,并把它们作为肥沃土壤的物种。

来源: Bottledream

地址: <http://www.bottledream.com/?p=3274>

[【返回目录】](#)

◎行业动态

世界艾滋病大会中国获奖者调查发现 昆明“低龄女”的威胁

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怀孕、重复怀孕、流产等数据均比一般性活跃青少年高两倍之多。

一场惨烈而罕见的空难使得第 20 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受到空前关注——6 名正准备参会的艾滋病研究专家在马航 MH17 航班遭遇空袭遇难。

和这起空难同样少见的，是本届大会颁奖礼上的一张中国人面孔——多年从事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状况研究的张旭东（女）获“妇女、女孩与艾滋病研究者奖”，这也是中国研究者第一次获此殊荣。

这项令张旭东获奖的研究自 2012 年开始，对象为昆明市 20 岁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小的 15 岁。据 310 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性病和流产在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十分普遍。

性病、怀孕多见

2014 年 7 月 21 日，张旭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 20 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做题为《中国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的报告。

世界艾滋病大会是艾滋病防治领域最权威、最前卫的学术会议。该奖项由国际艾滋病学社（IA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国际妇女研究中心（ICRW）、国际受艾滋病影响妇女共同体（ICW）共同颁发，旨在鼓励中低收入国家开展针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女孩的研究，让她们从中受益。

张旭东所从事这项研究自 2012 年开始，由昆明市卫生局立项、出资，对象为该市 20 岁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龄为 18.7 岁。真正有效的问卷只有 310 份，张旭东说。

该调查结果显示，性病和流产在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过去一年有性病症状。44%的人有流产经历。在有怀孕经历的女孩中有 54%人经历过与流产相关的后遗症。

这几个数据和 2009 年第一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对比发现：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怀孕、重复怀孕、流产等数据均比一般性活跃青少年高两倍之多。

此前的 2010 年，张旭东还在昆明主持了关于性病和艾滋病感染与药物滥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风险性行为的关系的调查。201 个样本中，1%感染了艾滋病，30%感染一种或多种性病。

当时调查并非专门针对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但研究发现，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性病很普遍，艾滋病感染率和成年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同，非意愿妊娠和流产的比例也很普遍。这些从未披露的区域性调查结果，让昆明市卫生局和当地 NGO 都有些意外。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么原因导致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怀孕的几率偏高？这是该获奖研究项目中的核

心问题之一。

据调查，83%的低龄性工作者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其中92%辍学，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其职业选择的空间也就很小。但同时面临着生活和经济压力，她们更多进入收入较高的娱乐行业；而娱乐行业低龄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甚至有少女情结、处女情结等。在201个样本中，93%的人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性交易是她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张旭东进一步研究发现，该群体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识，70%的人无法回答80%的相关问题，能完整回答的仅1%。“她们比较封闭，很少接触传统媒体、互联网等，也很少从学校获得相关知识。”

调查中，她们不肯反映吸毒情况，但会如实告知饮酒情况。在夜场，饮酒是受鼓励的，而酒精滥用者在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更少使用安全套，怀孕、性病感染等几率因此增大。“酒精对这个群体的影响一直被忽视，NGO也很少干预。”张旭东担忧地说。

98%的调查对象都不希望怀孕，但大部分仅依赖于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于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长效的可逆的节育方式，如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植入剂等。

张旭东说，对于此种高风险职业，双重保护才能既预防艾滋病又能减少怀孕几率，但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的仅占2%。“竟有高达40%的调查对象仍使用传统低效危险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冲洗法、下蹲式等。”

显然，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殖健康的服务严重缺失。调查还显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识来自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少数来自学校；其他都来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联网、传统媒体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龄女”调查困境

公益组织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补充，但现在普遍生存艰难。

云南省是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盘龙区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较为集中的区。自2002年始，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项目进驻云南开展针对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因为有性工作者和妈咪的参与，调查和干预网络得以快速建立。

张旭东的研究正得益于这样一个网络。2012年，她主持并参与的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获得了昆明市4个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当地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务的NGO，比如牵手女性互助小组（以下简称“牵手”）也参与了其中的调查工作。

“以前，人手足，每个人服务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时间单独交流，更易于建立信任关系，甚至可以交换电话，所以工作效果很明显，她们也会积极参与检查活动。”“牵手”的同伴教育骨干吕唯唯说。

2010年国际资金撤资后，“牵手”只能暂时借用昆明市盘龙区疾控中心办公室开展工作，专职工作人员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现在的4个，所以只能同时面对多名性工作者的讲课，动员检查的效果大为下降。盘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为该组织发放工资，并组织医生于每周四为性工作者抽血、化验，但由于缺少经费，现在只做梅毒和艾滋病的检测。

在盘龙区，“牵手”的4个专职人员需覆盖所有娱乐场所，该区约有四十多家娱乐场所，4个人分片区每月干预一次。主要是讲课，讲解和性病、艾滋病相关的知识，并动员性工作者们做妇检、VCT检测；传播正确的求医行为，因为她们常去小诊所，易上当被骗；还讲避孕措施。“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在娱乐场所，很少有人没做过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会怀孕了”。

“关系好的主管会帮助维护秩序。为了能进入场所，要和娱乐场所的老板们搞好关系，告诉她们，我们没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执法单位。但负责人一开始都很反感，她们都会说‘我们都很健康’等等。我们只好反复做工作。特别抵触的，才会通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协调。”吕唯唯说。

艾滋病感染者低龄化

事实上，将年龄作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个划分标准，在学术研究界存有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军认为，不应该以年龄来划分，而应该强调场所和从业方式的差别。

“桑拿、洗浴中心等专业化、组织化高的场所，感染风险较低，因为这些场所有培训，既传授性技巧，也培训性病、艾滋病等防治知识。而且这种场所还有同伴教育机制。所以在这种场所，即使低龄性工作者也有很强的安全意识。相反，如夜总会等，从业者安全意识就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较低。”赵军说，“这些场所只是提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场所也收台费，但睁一眼闭一眼。这种场所不对从业者进行培训、管理，她们交易的场所也不在夜总会、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处于一种自我管理状态，同伴交流也少。这种风险就比较高。”

和赵军的观点不同，在“牵手”工作了8年的吕唯唯说，“实际上在出租屋里，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风险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龄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从人流手术的情况来看，低龄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龄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调查的基础上，“牵手”向昆明市防艾办申请了为期一年的低龄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预项目，主要对24岁以下的性工作者进行单独干预。

“申请时也有争议。防艾办是防治艾滋病、性病的专门机构，不应该有明确的年龄划分。但考虑到低龄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异性，所以通过了申请。”昆明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曾子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所谓“低龄”，是指24岁以下。“牵手”通过多年的调查和工作发现，24岁以下的女孩们经

常聚在一起玩，没有生活目标，她们吃好的，穿好的，出门打的，从不坐公交车。花钱大手大脚。没钱了，又进入娱乐场所挣钱。“自我保护意识很差。遇到帅的，即使不要钱，也愿意上床。她们使用安全套的几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要小，因为不用安全套可挣更多钱。”吕唯唯说。

在娱乐场所，销售人员还给小姐们规定喝酒的任务量，她们的“老公”、“男友”一年换好几个，有的一个月换一个。实际上只是固定性伴，并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们发生关系时，她们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药。

“我们告诉她们，信任不等于安全。”吕唯唯说。一个明显变化的数据让其担忧，2014年前6个月，仅在“牵手”就检测出3个艾滋病感染者，年龄均为16岁到19岁。以前，查出来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议独立开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牵手”的另一个发现，在盘龙区，24岁以下的超过50%，最小的14岁，不少是在校生，有职高、专科，甚至本科生，多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区的。

在2012年的这项调查中，昆明市防艾办还发现，80%的低龄性工作者进入这个行业不到一年，但性病、艾滋病、怀孕、流产、无保护性行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风险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计划短时间内赚到钱就不再干了，她们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会主动与公共卫生人员接触，躲避干预行为。因此相关机构和NGO不能只关注熟面孔，更应该注重新面孔，建议尽早进行干预。”张旭东说。

但让张旭东、吕唯唯等研究者、干预者担忧的是：近年大规模扫黄行动使得干预和研究网络中的性工作者目标人数锐减。据统计，盘龙区娱乐场所低龄女性性工作者在扫黄前约有一千人，现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么转入县区，要么转入出租屋，或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工作。以前，“牵手”甚至可以对发廊、站街女进行干预，但现在她们都在深夜十一二点钟出来，或去城市小花园打毛线，行为更隐蔽。

等“牵手”再去娱乐场所宣传时，老板们的接受程度也不如从前了。昆明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曾子怡也称，尤其今年以来，由于扫黄等原因，开展干预工作时，寻找目标人群也变得非常困难。

赵军建议，应该尽快立法，确保卫生系统可独立开展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与公安扫黄行动切割。“即使我们暂时不能改变法律，但应该改变观念，她们的安全是公共卫生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

在赴墨尔本参加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前，张旭东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她认为：要尽可能地实现服务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别针对罪刑化和边缘化的青少年。“目前，计生服务机构已建立了庞大的体系和网络，但只为已婚人群服务。而占总人口20%的性活跃、性观念开放了的青少年，

却被卫生系统忽略很多。所以卫生系统要把青少年的人权考虑进去。”

来源：南方周末

地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550>

[【返回目录】](#)

红会回应酷暑救灾送棉被：基于地方需求 棉被用处广

“向南方灾区调拨棉被，主要是根据地方上报的物资需求，此外，即使在夏季，棉被在救灾中的用处也是多样的，此次救灾中，民政部门也调拨了棉被。”针对网络上关于“红会酷暑救灾送棉被”的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 20 日作出上述回应。

连日来，今年第 9 号台风“威马逊”肆虐海南、广东、广西三省区，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天气，引发洪涝等灾害。在超强台风影响下，上述三省区数百万人口受灾，部分地区出现人员伤亡情况，来自各方的救灾物资也不断向灾区运送。

但是，20 日，有媒体报道，琼粤桂灾区正值三伏酷暑，在受灾地区普遍高温的背景下，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的救灾物资中，却出现了大量棉被。一时间，网络上关于“红会酷暑救灾送棉被”的质疑和调侃之声不断。

20 日晚间，[中新网](#)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

“舆论出现这些质疑，其实是对一些救灾知识的不了解。”杨绪生说，在救灾中，不管是红会系统，还是民政部门，棉被都是救灾物资的选项之一，即使在夏季救援中，作为救灾物资，棉被也是非常常见的。

“受灾以后，比如房子倒塌等，灾民居住环境随即完全改变，好的可能在帐篷里，不好的，就住在临时搭的一个简易棚，里面搭一个简单板床，或者连床都没有，加之昼夜存在温差，而棉被又能铺又能盖，所以在灾区是非常实用的。”

杨绪生说，除了御寒之外，棉被还有铺垫等舒适方面的考虑，其在灾区是多用途的。从政府和红会的救灾经验来看，棉被确实是一个保留项目，即便在夏季，经常给灾区调拨棉被也较为常见，“此次台风救灾中，不仅是红会系统向灾区调拨了棉被，民政部门此次给三个省份也调配了棉被。”

正如杨绪生所言，记者查阅国家民政部官方网站获悉，民政部 7 月 19 日发布的消息显示，在此次台风赈灾中，广东、海南两省民政厅确已分别向湛江和文昌市调拨 1000 床和 300 床棉被。

此外，杨绪生介绍，根据琼粤桂三地的受灾情况，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给海南调拨了 2500

个“家庭包”和5000件夹克衫，总价值93.35万元；给广东调配了1500个“家庭包”和3500床棉被，总价值68.87万元；给广西则调配了1000个“家庭包”和100顶帐篷，另外还加了5万元现金，即救灾紧急备用金，主要用于为广西当地采购大米。

“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的这些救灾物资，都是依据各地上报的物资需求，我们不会提供地方上不用的物资。”杨绪生说，民政部门向此次受灾地区调拨了棉被，这也说明当地灾区确实需要棉被。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地址：<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7-20/6405244.shtml>

[【返回目录】](#)

全国首个社会服务交易所成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7月24日上午，顺德社会服务交易所正式在顺峰山公园南薰别馆的创新园内挂牌启用。今后，这个具有顺德特色的社会服务综合平台将通过线上、线下的社会服务对接，实现服务信息资源共享，并促进区内的社会组织及服务项目与不同的社会资源建立合作关系，助推顺德公益事业的发展。

顺德社会服务交易所由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倾力打造，在启用当日，就已吸引了5个社会组织、团体进驻。顺德城市网记者了解到，这个刚刚启用的社会服务综合平台在整个珠三角地区乃至全中国都是一个新鲜事物，在新加坡等社会服务较为完善的地区也难以找到建设经验。为什么顺德要打造这样一个社会服务交易所？

对此，区社会创新中心副总干事黎仁刚回应，称自2011年启动社会综合改革以来，顺德大力扶植了一批社会组织、团体，并相应加大了社会建设力度，而通过一系列长时间的调研摸底，区社会创新中心发现，随着政府、企业等单位给予社会建设资源的加大，本地的各类型社会服务需求也变得越发显著。

“顺德的社会改革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比较分散。”黎仁刚表示，为了让相对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无穷的能量，并尽可能地解决市民日益增长的各种社会服务需求，在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子上，顺德需要一个集中化的服务场所对各种社会服务资源和需求实现有效配置，由此，顺德社会服务交易所应运而生。

佛山市顺德区社会服务联合会正式成立线下的社会服务交易所已经正式投入运营，记者了解到，一个集合展示和“选购”社会服务项目的线上社会服务网也正在加紧建设，在不久的将来，顺德所

有的社会服务项目都会在这个并合线上线下服务的综合性“超市”里进行展示，感兴趣的市民除了可以来到社会服务交易所进行现场选取，也可以在网上“选购”自己需要的社会服务。当日，除了顺德社会服务交易所揭牌启用，佛山市顺德区社会服务联合会（以下简称“顺德社联”）的成立也让创新园洋溢着另一股喜庆的气息。记者了解到，经过前期的筹备，顺德社联已发展了66个单位会员，成员类别包括了公益慈善类团体、枢纽型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社会企业等，服务领域横跨各类人群。

顺德区委副书记杜镜初在出席顺德社联的成立大会时点评了过去两年顺德在社会服务发展的优点与不足，同时，他希望成立社联能够进一步促进顺德各类社会服务机构的联合，加强社会问题和社会服务研究，推动社会服务机构间的合作和交流，并打破社会服务机构“单打独斗”和“信息孤岛”的局面，打造一个具有顺德特色的社会服务品牌。

来源：中国公益慈善网

地址：

<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ColumnID=460&TID=2014072517250897117>

[8618](#)

[【返回目录】](#)

首届青年导演计划 用影像改变公益传播

公益组织需要什么样的公益传播？完成一部公益宣传片需要面对哪些挑战？如何在一分钟的视频中抓住受众的心？是否存在一套解决所有传播问题的通用逻辑？以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许多公益组织所共同面对的，也是“青年导演计划”希望帮助他们寻求解答的。

7月16日，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周密筹备之后，由颗粒公益传播发展中心发起的首届“青年导演计划”终于正式拉开帷幕。18名经过严格选拔的“青年导演”，将作为公益影像制作与传播的“超级志愿者”，在接受“青年导演计划”集训营的训练之后，为6家同样经过甄选入围的优秀公益组织拍摄公益宣传短片。他们所完成的最终作品将交由著名导演陆川、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与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吕静莲以及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共同组成的评审团进行评选，并决出多项“诱人”奖励。

作为全国首个专注于公益影像制作与传播的公益人才培养计划，“青年导演计划”有望在公益影像制作与传播需求和影视人才实践与创作需求之间建立起互动的渠道，在为公益领域培养传播人才

的同时，推动公益传播介质、渠道与策略的变革。

18名“青年导演”

为公益组织拍摄宣传片

经过严格的甄选，入围本届“青年导演计划”的6家公益组织包括雷励中国、一公斤盒子、家工作营、满天星公益、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等，分别涉及青年成长、社会创新、特殊群体救助、儿童阅读推广及留守儿童关爱等六大公益领域。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与18名“青年导演”密切合作，以最终拍摄出最符合他们特点的公益宣传短片。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道理同样适用，所以传播很重要；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偏重倡导的公益组织来说，影像的传播更是至关重要。”入围首届“青年导演计划”的一公益组织负责人阿强表示。

他告诉记者，之前他们也曾找过一些朋友帮忙拍摄纪录片、宣传片等，但发现行业内既懂视频制作又了解公益行业的专业人才并不多，加上视频制作成本较高，以及传播渠道狭窄等问题，影像传播做起来并不容易。而记者也通过采访了解到，类似问题其实在其他的众多公益组织当中也普遍存在。

现在，“青年导演计划”成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次新的尝试。阿强表示：“希望能通过‘青年导演计划’成就一个相互学习与支持的过程，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供这些年轻人通过镜头来讲述。”阿强说。

公益理想与创作激情

共同成就年轻人的梦

在18名入选的“青年导演计划”的年轻人当中，既有来自高校影视专业的学生，也有在影视行业内奋斗多年的职业人士，但都对于影像制作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愿景，对于公益传播怀着真诚的兴趣和期许。对他们来说，这一计划也将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层面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杨柯南，2013年毕业于宁波大学数字媒体专业，现在家乡贵阳经营着一间小小的影视工作室，在他渐感独力难支之时，恰好遇到了“青年导演计划”。“对于影视创作，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兴趣、理解和经验，但这在当下的市场上却很难找到施展之处，商业的影视制作逻辑更多是一种机械化流水线式的产品生产过程，没有人会关心我想要创作什么、表达什么”。

杨柯南说，刚刚完成的5天集训营超出了他预先的期望，这令他不仅更加坚定自己对影像创作所持的理念，也对公益有了更深广的认识。现在，他确信公益元素的加入将使影视创作更加接近他想要的纯粹，而影视的传播力量也将帮助公益事业得到更多人、更深入的理解。

据颗粒公益创始人顾源源介绍，在为期5天的集训营当中，“青年导演计划”邀请了5位各行业

领域的顶尖导师，针对公益影像的制作与传播提供专业内容的分享和实践指导。集训营采用实战演练青年导演的成长历程的模式，依次安排了“深度访谈”“从创意到作品”“属于公益的影像”“征服的艺术”“导演的逻辑”等五大核心课程，并设置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极限48小时”模拟拍摄演练环节，为未来的“青年导演”量身定制一个充满乐趣与挑战的梦想之旅。

从集训营开始，整个“青年导演计划”全程采用积分制。“青年导演”成员只要完成任务，即可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所需摄影器材、导师支持、场地资源等一切完成最终作品拍摄所需条件，并且在计划的最后，累积的积分也将成为他们角逐最终大奖的最重要的依据。据介绍，“青年导演计划”的奖项既包括跟随著名导演陆川等知名人士学习的机会，也包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主流媒体的实习机会，甚至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深造机会。“‘青年导演计划’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激励每一个有公益梦想的人不断前进。”顾源源说。

导师点评

“青年导演计划”深度访谈课程导师张燕玲：

追求高质量公益影像作品

“青年导演计划”感知到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第一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文化产业正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我们的影像市场有了观众，但好的作品却依然匮乏；第二是80后、90后年轻一代观众已经成长起来，而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影视制作人还需要成长；第三是站在影像与公益的交叉路口，我们会发现国内公益广告等公益性的影像作品在数量、质量方面都远远不够，公益组织也缺乏相应的发声和亮相渠道。基于以上三点判断，“青年导演计划”选择以“青年导演”和“公益影像”为立足点，追求高质量的公益影像作品产出，在我看来，既是顺势而为，也是创新导向。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转自南方日报

地址：<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596&extra=page%3D1>

[【返回目录】](#)

“幸福列车”项目进展追踪报道-重启协商纪实

7月21日，灯塔计划的项目人员林洁丽终于拿到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面简称救助基金会)双方签署的项目补充协议，悬在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放下，但对于灯塔计划负责人卢思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灯塔计划在这趟即将重启的“幸福列车”上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不仅负责接待从安徽来的小朋友以及在广州的课程设计，还需要统筹在安徽挑选合适的小朋友，以及相关接送过程，这对灯塔计划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

合作出现波折以后

7月10日，当双方的2014年度“幸福列车——广州彩虹之旅”公益活动实施出现波折以来，一直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话题顿时安静了不少，但却是灯塔相关项目人员忙碌的开始，因为他们正在密锣紧鼓地与救助基金会协商项目相关的事宜，包括是否有合适的项目人员可以接手，进一步草拟的补充协议如何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新项目的时间表以及预算等，双方各自的分工和责任……

每一个问题，基本都来回了几个回合，才被双方最后确认。

比如项目补充协议，仍然由基金会先草拟出来，“对双方权益的保障条文其实与上一份差别不大”，思歆这样回忆接到补充协议初稿的感觉，但这次，灯塔计划邀请了专业的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意见，对每个条文进行了斟酌和修改，补充协议“更合理合法地维护了灯塔的权益”，然后再返回到救助基金会进行确认，而救助基金会的发言人高俊旭也表示：这次签署协议速度已经很快，我们的协议都需要财务、法务、领导等层层审核，然后再签署。

分工与责任

另外，双方共同面对的一个难点是基金会这边没有合适的项目人员可以接手这个项目，后来救助基金会重新作出调整，改由外联部接手这个项目。也是外联部主管的高俊旭表示：外联部一直负责对外合作项目，因此也可以接手这个项目。

但双方很快面临了第二个难题，谁来负责挑选和接送安徽过来的小孩。在之前的协议中，这项一直由救助基金会的项目人员跟进，但外联部并没有这样的人手和经验跟进这个部分，因此，他们希望灯塔计划能负责统筹这一部分的工作，高俊旭表示：我们将与灯塔计划合作负责这部分，而基金会主要的作用在于对外联系各种资源，比如妇联等等。

对于灯塔计划来说，挑选和接送安徽过来的小孩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思歆甚至通过合作伙伴找到了安徽当地可以负责此项工作的NGO推荐给救助基金会，但基金会仍坚持希望灯塔计划负责统筹这部分工作，几个回合下来，灯塔计划接受了这个挑战，“虽然工作量大了，但我们也有了整个项目的主导权，最坏的打算就是再找合作伙伴。”

临时理事会上的信念

7月18号,灯塔计划为“幸福列车”项目召开了紧急理事会。摆在理事面前的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策,工作范围扩大,项目时间紧迫,能否在短时间内重新招募足够数量的志愿者,……一系列的问题此时都没有最终答案。

以秘书长卢思歆为首的执行团队却始终坚持“为了孩子,要做好这个项目”的信念,坚持尽最大努力开展这个项目,理事会最后通过了继续推进项目,并商讨如何动员更多资源支持该项目的展开

“信念很重要,我不是一个人作战,背后有一个团队跟我有同样信念,才能做成事情。”这也是灯塔计划的信念和坚持,“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开展这个项目”卢思歆说。

来源:NGOCN

地址: <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816>

[【返回目录】](#)

张欣称笑对谩骂 捐助计划将继续

日前,张欣、潘石屹与哈佛大学校长签订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引来网友质疑。有人追问为何不捐给国内大学,还有人质疑他们是在为儿子买名校门票。对此,潘石屹在微博上强调,此次助学金只帮助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中国贫困学生。昨晚,张欣则通过微博直言,“看到满屏谩骂,先是气愤后来就笑了”。她透露,与其他一流大学实施此助学金计划的洽谈正在进行。

捐资被疑“给儿子买门票”

7月16日,SOHO中国官微称,当天SOHO中国基金会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1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9300万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并晒出了两张潘石屹夫妇与哈佛校长DrewFaust签协议的照片。

此微博一出,立即在网上引发广泛热议。微博认证为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的姚树洁就发博文质疑:“请问能出国的学生,能叫贫困生吗?请问国内的大学有缺点,我们就不能通过捐钱的形式,改变它们的质量吗?”还有网友指出,“山区孩子读不起书,在中国赚的钱却献给美国。”更有甚者认为,潘石屹为世界名校捐款,或为其儿子将来入校“买门票”。

据悉,潘石屹与前妻的大儿子潘瑞,13岁时便被送往英国寄宿制学校读书,随后进入英国名校

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学习工程与商业管理。今年6月28日,潘瑞举办婚礼,潘石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当年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初衷是考虑到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向还是全球一体化。

潘石屹与张欣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16岁的潘让,一个是14岁的潘少。

目标是捐出去1亿美元

针对网友的质疑,7月16日,张欣转发@SOHO中国的微博并评论,“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没钱付学费,都是拿助学金,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另一条透露,“我们的计划是捐赠1亿美元作为贫困学生助学金,哈佛是我们合作的第一家大学。”此外,张欣还回应了哈佛是否有贫困学生的问题:“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超过70%都是拿助学金的,真正有钱支付全额学费的人很少。不光哈佛,世界一流大学很多都是这样。”

事实上,哈佛在2011年也曾宣布大幅减免学费,希望学生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业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学生,可免所有学杂费;年收入在6万至12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只需缴纳不到10%的收入作为孩子的学费;年收入在12万至18万美元之间的家庭,需支付年收入的10%作为子女的学费。

针对网友的质疑,在张欣的解释之外,潘石屹前日也曾通过微博回应姚树洁,再度强调SOHO的助学金将只帮助在世界名校中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尽管如此,网友的声音当中仍不乏谩骂。

昨日22时39分,张欣再度更新微博回应,“一睁眼看到满屏对捐款的谩骂,先是气愤后来就笑了。”她还顺势做了个广告:“同学们,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是向你们敞开的,优秀的同学一定要申请。如果哈佛接受了你,家庭贫困不会成为障碍,我们来帮助你。我们还在继续和更多的大学做工作,上周在耶鲁、今天去斯坦福。目标就是让更多中国贫困学生到一流大学去。”5分钟后,潘石屹作了转发。

这也再度引发热议,大V@任志强就表示,微博上“也有称赞声,公益事业是面镜子,能分出各种心态。”

张欣为助学辞去公益组织理事长

在潘石屹夫妇成为话题人物时,SOHO基金会也进入了舆论视线。据该基金会官网介绍,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是由SOHO中国有限公司出资并全权管理运营的公益慈善机构。在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上,该基金会注册登记的全称为“北京市搜候中国城市文化基金会”,注册性质为非公募基金会,其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业务范围包括文化艺术、建筑艺术、城市发展、公益项目和环保。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SOHO基金会获得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意味着,如果企业给SOHO基金会捐资,则该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12%的部分,准予扣除;

如果个人给该基金会捐款，那么捐赠额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 30% 的部分，准予扣除。然而，目前该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来源并未对外公示，因此无法了解到捐赠资金是来自企业还是潘石屹或张欣个人。

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可查看该基金会 2005-2008 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似乎在 2008 年之前，该基金会的项目并无亮点。2008 年之后，SOHO 中国基金会与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合作，招募中美两国大学毕业生到教育薄弱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2012 年，张欣成为美丽中国的理事长。

然而，据美丽中国的工作人员昨日透露，今年春季张欣已辞去理事长一职，只为有更多精力投入“SOHO 中国助学金”项目。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paper.nandu.com/nis/201407/25/247869_3.html

[【返回目录】](#)

中国最大淡水湖欲建大坝抵消三峡影响 8 月或启动立项

曾欲建大坝抵消“三峡”影响

工程即将立项审批

世界自然基金会建议缓建

“筑坝”改“建闸”环保人士仍忧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一公布就遭到环保人士的反对，江西随后迫于压力将“调枯控洪”改为“调枯畅洪”、“筑坝”改为“建闸”，即“调枯不调洪、建闸不建坝、拦水不蓄水”，从而部分缓解居民取水、通航等问题。

但是“坝”改“闸”并未能减轻各方对鄱阳湖生态问题的担忧。专家称，工程会给鄱阳湖湿地及湿地植物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使江豚生境更为破碎化，迁移通道受阻，也会破坏候鸟栖息地。

延宕多时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欲再闯关，却遭国际环保组织反对。

7 月 23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即将进入关键的立项审批阶段，WWF 表达了对该项目的担忧和反对立场，并建议暂缓。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副主任廖金源对早报记者表示，消息属实，但不方便透露更多情况。

2011 年汛期，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因干旱湖水面积较往年同期骤减一半以上。在这背景下，时任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表示：“三峡工程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

湖格局’。”而为抵消这种改变，江西准备在湖口建起 2800 米长的大坝，把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

早报 2011 年 5 月 31 日推出的《三峡再调查》曾披露，2008 年 12 月，江西省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该枢纽的原方案是：在距长江 27 公里处的鄱阳湖北端，修筑一座长约 2.8 公里的混凝土大坝，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李建华当年接受早报采访时表示，江西的做法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干预水系生态的做法，是在用“三峡的手段”试图抵消三峡对鄱阳湖造成的负面影响。

8 月底或启动立项审批

本月 23 日 15 时，WWF 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称，拟建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已报送国家发改委并即将进入立项审批阶段。

WWF 阐明了对此项目的机构立场，WWF 认为，在对鄱阳湖的生态功能进行科学研究及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论证之前，应暂缓枢纽工程的建设，并将无坝方案作为维持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优方案。

23 日晚间，WWF 中国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徐超告诉早报记者，该项目的最新消息来自权威渠道。

昨日上午，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副主任廖金源对早报记者表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确实已报送给国家发改委，具体情况目前不方便透露。

WWF 长沙办公室主任蒋勇向早报记者透露，该项目可能会在 2014 年 8 月底进入立项审批阶段，一旦国家同意立项，将会公布工程的初步建设方案，由于此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安全评估已获环保部通过，因此该项目通过环评可能性很大。

据蒋勇介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江西早已有之，几代人为之锲而不舍。从最早的“建坝发电”控湖工程，到现在“调枯不调洪、建闸不建坝、拦水不蓄水”的方案，其间已进行多次修改和调整，江西政府部门在这项工程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蒋勇认为，尽管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居民取水、通航等问题，却可能对鄱阳湖流域乃至长江中下游生态系统及其核心生态服务功能带来较大影响。

WWF 提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被期望能够解决湖区缺水、渔获量减少等问题，但目前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缺乏研究，枢纽工程并不是答案。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该湖的生态湿地于 1992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

鄱阳湖不仅为江西省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候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态服务功能，而且对于长江中下游包括河口区生态功能的维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极危物种白鹤和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主

要在鄱阳湖过冬，这使得鄱阳湖成为重要的候鸟栖息地；同时，鄱阳湖发现的鱼类种类约占长江的三分之一，是淡水鱼类的重要基因库；此外，鄱阳湖还是长江中唯一尚存的淡水鲸类哺乳动物——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现有淡水江豚野外种群的近一半生活在鄱阳湖。

鄱阳湖工程争议多年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该不该建已争议多年。该项目最早作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的一部分于2008年公布。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西时任省委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宣布，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立足生态，着眼经济，致力于把环鄱阳湖地区建设为全省生态文明的示范区，成为新型产业的集聚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区、城乡协调的先行区和江西崛起的带动区。

这份重要纲领的最初灵感，来源于上述官员妻子用鄱阳湖的水亲自下厨。在此次两会江西代表团的一次小组审议会上，该官员亲口透露了这桩事。他说，“我爱人在做饭的时候就说南昌的水最好喝，这不是偏信老婆的话，据我的观察，我爱人用同样的大米在吉林、青海、甘肃、北京做的饭都不如在南昌的好吃。”

2009年初，《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申报国家战略。同年12月，该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不过，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没有像江西预想的那样，作为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获得批复，国务院要求“该工程单独论证”。

此后，江西省专门设立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主要负责工程的课题研究、方案规划、资料采集等一系列工作。

根据原规划，在距长江27公里处的鄱阳湖北端，江西方面将修筑一座长约2.8公里的混凝土大坝。江西希望，通过大坝“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鄱阳湖建坝之争》报道，2008年江西省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当时的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孙晓山曾表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江西水利史上的大事。”江西省有关部门测算，“湖控工程”蓄水能力可达200亿立方米，是三峡工程的2/3，蓄水成本低于三峡水库；此外，湖控工程还将有发电、航运、灌溉、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年发电量为10.33亿度。

水利枢纽恐威胁江豚

该方案一公布就遭到环保人士的质疑，江西随后迫于压力逐步更改原有方案，将“调枯控洪”改为“调枯畅洪”、“筑坝”改为“建闸”，即“调枯不调洪、建闸不建坝、拦水不蓄水”，从而

部分缓解居民取水、通航等问题。

由“坝”改“闸”并未能减轻各方对鄱阳湖生态问题的担忧。中科院南京湖泊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姜家虎告诉早报记者，工程会给鄱阳湖湿地及湿地植物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使江豚生境更为破碎化，迁移通道受阻，也会破坏候鸟栖息地。

WWF 指出，无论是最初的“建坝发电”方案还是修改后的“建闸”方案，其核心影响都是控水工程将改变湖区原有的水文动态过程，使鄱阳湖在冬季依旧能保持较高水位。正如持续的低水位对鄱阳湖的生态带来影响一样，持续的高水位同样会因为淹没期的延长以及地下水位的上升，对湿地植物生长造成影响，改变越冬水鸟赖以生存的栖息地环境，从而对已经十分濒危的越冬水鸟造成重要影响。水利枢纽工程还会对鄱阳湖自身的水质带来威胁，严重影响鱼类多样性，对长江江豚的生存带来新的威胁，并对长江下游在流量、泥沙量方面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鄱阳湖最核心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批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的区域之一，水利枢纽工程一旦建成，将违背《湿地公约》的宗旨。

来源：东方早报

地址：<http://www.dfdaily.com/html/33/2014/7/25/1169887.shtml>

[【返回目录】](#)

世界自然基金会建议暂缓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

7月2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出声明，建议暂缓“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WWF认为，在对鄱阳湖的生态功能进行科学研究及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论证之前，应暂缓枢纽工程的建设，并将无坝方案作为维持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优方案。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该湖的生态湿地于199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WWF 近期获悉，拟建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下称枢纽工程）已报送国家发改委并即将进入立项审批阶段。

WWF 认为拟建的鄱阳湖枢纽工程将对水质、鱼类多样性、长江江豚栖息地、候鸟栖息地以及长江下游泥沙量等五个方面产生不可逆或不确定的影响，目前各项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还不足以支持该枢纽工程的立项和建设。

针对“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长、水位下降常态化”的说法，WWF 认为目前的数据无法

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十年的水位变化，并未对鄱阳湖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候鸟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造成显著影响。因此，不能得出生态系统退化的结论，更不能成为该枢纽工程立刻上马的决策依据。

以下为 WWF 声明全文：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近期获悉，拟建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下称枢纽工程）已报送国家发改委并即将进入立项审批阶段。WWF 始终高度关注该枢纽工程的论证进程，此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对此项目的机构立场。

WWF 认为，在对鄱阳湖的生态功能进行科学研究及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论证之前，应暂缓枢纽工程的建设，并将无坝方案作为维持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优方案。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该湖的生态湿地于 1992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

鄱阳湖不仅为江西省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候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态服务功能，而且对长于长江中下游包括河口区生态功能的维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极危物种白鹤和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主要在鄱阳湖过冬，这使得鄱阳湖成为重要的候鸟栖息地；同时，鄱阳湖发现的鱼类种类约占长江的三分之一，是淡水鱼类的重要基因库；此外，鄱阳湖还是长江中唯一尚存的淡水鲸类哺乳动物——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现有淡水江豚野外种群的近一半生活在鄱阳湖。

长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可持续利用一直是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组织 WWF 的优先工作领域。基于过去十五年的工作积累，WWF 认为拟建的鄱阳湖枢纽工程将对水质、鱼类多样性、长江江豚栖息地、候鸟栖息地以及长江下游泥沙量等五个方面产生不可逆或不确定的影响，目前各项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还不足以支持该枢纽工程的立项和建设。针对“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长、水位下降常态化”的说法，WWF 认为目前的数据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十年的水位变化，并未对鄱阳湖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候鸟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造成显著影响。因此，不能得出生态系统退化的结论，更不能成为该枢纽工程立刻上马的决策依据。

此外，枢纽工程的建设还被期望能够解决湖区缺水、渔获量减少等问题，但 WWF 认为目前对相关问题还缺乏研究，枢纽工程并不是其答案。

在枢纽工程即将进入立项审批的阶段，WWF 呼吁有关部门坚持客观、公开、公正的原则，全面开展鄱阳湖生态功能的科学研究和评估工程建设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WWF 愿意参与相关方面合作，为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整个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流域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源：财经网

地址: <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40723/3630280.shtml>

[【返回目录】](#)

◎公益人

“美丽中国” CEO 潘勋卓：七年不痒

“我今年28，最近7年一直在中国，不老也不外，真别把我当‘老外’跟我‘见外’了。”说这句话的是一位美籍意大利年轻人，本名叫安德烈·帕西内蒂（Andrea Pasinetti），中文名叫潘勋卓。

7年前，谁也没有料到，当时正在就读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这位高材生会选择从名校肄业，放弃进入政界、咨询公司或投行的“大好前程”，而在人生地不熟的中国走上一条漫漫长路：创办“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致力于让所有身处中国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人生际遇。

一位当年只有21岁的留学生，竟想撬动中国贫困地区数千万孩子们的未来？“别逗了！”同样，7年前，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他不可能成功，“碰几次壁后肯定会被吓跑”。

倏忽7年，潘勋卓却依然笑谈：“七年了，还不怎么痒，下个七年咱们继续努力！”

从不可能到可能，7年之后，潘勋卓依然“不老”，依然是一副青春阳光的“男神”模样，然而，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对中国和中国农村及教育一无所知的“外”人了，时至今日，他对中国农村及教育的观察、思考，足以让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汗颜——他用纯正普通话信口说来的汉语成语、俗语，也给人类类似的感觉。

名校辍学

2007年，潘勋卓在普林斯顿大学刚念完大三，便只身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计划为期一年。“在当时，那真是一个‘拍脑袋’的决定。”潘勋卓毫不讳言自己当年的冲动。对于之后发生的一切，彼时的他没有丝毫预感。

他在中国的同学也大都将他视作一个“过客”。裴钰便是其中之一，她刚认识潘勋卓的时候，对其第一印象是“有礼貌，一看打扮就是大城市长大的公子”。她认准潘勋卓会跟其他外国学生一样，学完中文，“匆匆看了看中国的样子”，就会“赶紧回国”去。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偏离了包括潘勋卓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想轨道。

一切得从一次因缘际会的调研说起。来中国，除了学习中文，潘勋卓还要为以中国新农村建设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做准备。期间，经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校友的介绍，潘勋卓决定前往云南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实地调研。

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中国农村，也是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中国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在调研时，他听到最多的，是当地小学招不来、留不住优秀老师。“对比那些要走六七小时山路上学

的小孩，我感到自己走了一条‘捷径’”，潘勋卓说，“他们并不比我小时候笨，只是他们的机会太少。”

那次之后，潘勋卓又相继走访了云南、广东、青海等多个省份几百所农村小学，且每次之后他“要做点什么”的欲望就会更强一些。起先，他想捐钱给一些机构，帮它们派优秀教师去农村。但是，理想中的机构，他遍寻不得。于是，他决定自己创办一个。

决定之后，他就分别给妈妈和普林斯顿大学打了电话，说自己将留在中国。“当时做决定挺冲动的，但那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我当时有一个信念，那些农村的小孩如果也能够接受优质教育，他们同样能走得更远、有更多人生选择。”潘勋卓语气很坚定。



潘勋卓在俸校长的学校里和孩子们打篮球。

变卖遗产

“这不可能！”“在中国做非营利性机构从来不容易。”无论是在提出构想之初，还是在“美丽中国”诞生之后，潘勋卓都遭受到了许多“冷水”和质疑。

另外，“美丽中国”的基本模式是从中美两国招募优秀大学毕业生，经过培训后，送到中国教育资源匮乏的边远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此模式当时在中国鲜有先例可循，因此，在与资助方的沟通、合作上，也遇到了很多阻碍。

2012年秋，“美丽中国”在经费上出现了很大的缺口，以致有几十个已经培训过的项目老师面临无法安置。那段时间，潘勋卓几乎每天都外出四处寻找一切可解燃眉之急的资源。最后关头，他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已逝的外祖父留给他的一片樱桃林，才得以帮助“美丽中国”渡过危机。

2013年夏，在上一届项目老师两年支教结束后的“毕业典礼”上，潘勋卓才第一次把这个“樱桃林”的故事讲了出来。他说：“其实外祖父的樱桃林一直都在，只是从那片看得到的樱桃林，变成了你们在过去两年中为孩子们种下的看不到的樱桃林。”

从讲中文磕磕绊绊到能在田间地头与孩子、家长唠半天嗑，从原先的洁癖到能一屁股坐在庄稼地里大口喝汤，发生在潘勋卓身上的变化不少。

他的行动和坚持触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果不是他，我们这些‘美丽中国人’现在很多会散落在不同的企业，西装高跟鞋，也会过得很好，但却很难像现在这样，因和这么多孩子一起成长而感到十足欣慰。”起初认定潘勋卓“肯定会被吓跑”的裴钰，最终决定辞去某知名企业市场部的高薪工作，加入“美丽中国”，成为其市场与传播团队总监。

专业运营

且行且思考，潘勋卓清楚，“美丽中国”要想从根本上撬动中国贫困地区数以千万计孩子们的未来，必须通过专业化运作来不断改进方法和提高效率。

因此，邀请商业、公益等领域的精英组成理事会，是潘勋卓作为“美丽中国”CEO的一项重要工作。现今，高盛高华董事长方风雷、美丽美国创始人 Wendy Kopp、全国政协常委刘泽彭等都是“美丽中国”的理事会成员。

基于专业化的思考，潘勋卓还非常强调“美丽中国”的长期影响力，他希望帮助“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实现课堂及社区影响力的同时，能够在两年支教后，真正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的症结所在，并在随后的人生中从经济、政治等不同角度采取行动以解决问题。

因此，他希望在2014年带领“美丽中国”走向一个新方向，使之不仅仅是一个支教项目，更要变成一个“孵化器”，系统地“孵化最创新、最变革的一些教育方面的突破性想法。”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2014年春节期间，潘勋卓还特意去了一趟美国旧金山，探访一系列教育创新机构。在考察过程中，当听到雅虎的创始人之一 Tim Brady 说心目中最理想的教育创新团队是“一名 IT 工程师加一名了解问题所在的美丽美国项目老师”时，他不由得内心一动：“如果可以系统地支持支教过的美丽中国项目老师践行他们的教育创新，他们必定大有可为。”满满一周的考察后，潘勋卓“打了鸡血一样，各种想法停不下来”。

“美丽中国”的运作日益成熟和专业化，其项目老师从首届的20名增加到了如今的300名，而且，这些老师中的67%提高了所带班级期末考试平均分，60%在一个学期内提高了至少三分之二学生的考试成绩。

今年4月底，“美丽中国”项目落户北京民政局，登记成立了“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使该项目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开展。6月中旬，由在港青年企业家和银行家组成、致力于为项目发展壮大提供支持和出谋划策的“美丽中国青年专业人士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

来源：慈传媒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4/0724/4457.html>

[【返回目录】](#)

◎国际观察

联合国发布 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4 日在东京发布了题为《促进人类持续进步：降低脆弱性，增强抗逆力》的 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

报告称，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来衡量，目前在 91 个发展中国家仍有近 15 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些人口正在遭受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多重剥夺。全球仍有近 8 亿人一旦遭受冲击便会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报告还显示，全球有将近 80% 的人口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8.42 亿人口正遭受长期饥饿，超过 15 亿员工为非正规就业或非固定就业。该报告敦促各国针对上述问题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表示，“通过解决脆弱性问题，所有人将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人类发展也将变得更加平等和可持续。”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7/25/nw.D110000renmrb_20140725_3-22.htm

[【返回目录】](#)

美国环保组织利用谷歌街景监测天然气泄露

美国环保协会最近给谷歌街景摄像车赋予了一个新用途：绘制天然气泄露点分布图。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环保协会于 7 月 16 日启动了一项名为“互动地图”的项目，通过改装过的谷歌街景摄像车每半秒钟收集一次图像数据，对波士顿、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市史丹顿岛的地下天然气管道进行监控，力求对天然气泄露点进行准确定位并监测其泄露程度。

经过几天的运行，图像显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安装的塑料天然气管道有四处泄露点，而在波士顿最早安装于十九世纪晚期的铸铁管道以及近十年安装的不锈钢管道线路上发现了近 3000 个泄露点，史丹顿岛的天然气管道泄漏情况则居中。

除此之外，美国环保协会目前还开展了其他 15 个监测项目，意在全面监测天然气产业链的泄漏情况，包括从采用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的页岩气井、油气加工企业直到天然气传输线路、运输车

辆、家庭燃气设备等等。

天然气，或者说甲烷，本身就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其在未来 20 年内的暖化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 120 倍，因此准确掌握天然气泄漏情况十分重要。尽管页岩气支持者称，与煤炭相比，天然气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要减少了一半。但是哪怕只泄漏了一点点天然气，这种减排作用亦基本上被抵消了。

不过美国环保协会表示，由于城市输气线路的多样性，目前对这三个城市天然气泄漏状况的监测结果还不足以用来评估整个城市的天然气泄漏量。据美国环保局估计，整个天然气传输系统的泄漏率保持在 0.24% 的极低水平。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兼律师马克·布朗斯坦 (Mark Brownstein) 表示：“这个新监测方法可以提高管道修复与更新的效率。我们可以根据监测结果将泄露点排序，确定需要优先维护的地方，因此公用设施维护工作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这对于环境、纳税人、公用事业部门来说都是个将钱花在了刀刃上的好事情。”

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科学家史蒂夫·汉伯格 (Steve Hamburg) 表示，该组织还将与谷歌公司合作，对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其他污染物进行监控。“这将改变我们采集数据的方法，而且有助于保护民众的公共数据知情权，能够让民众通过不同的方式掌握环境数据并理解其意义。”

对泄露点进行定位一直是一个耗时费钱的事情。美国国家电网声称，在未来五年里仅仅用于马萨诸塞州向波士顿家庭输送天然气线路的基础设施维护费用就将达 18 亿美元（约合 112 亿元人民币）。马萨诸塞州的输气网络拥有 2194 英里铸铁管道、1441 英里不锈钢管道，按照现有工作计划，全部更新这些管道将耗费 26 年的时间。

美国国家电网管道安全与规范部门的副主任休·弗莱克 (Sue Fleck) 表示：“我们赞赏美国环保协会提供了此前我们从未掌握的细节信息，这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并进而降低成本。”她还表示这些信息还将帮助公用部门减少安全隐患。

对于家庭用户和公用部门来说，安全问题比气候问题更为重要。虽然只有很少的泄露点会导致安全隐患，但有时这些泄露点可能会引起大爆炸。四月发生在华盛顿州的一起天然气爆炸事故摧毁了三座商业建筑，幸运的是由于爆炸发生在半夜，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天然气协会表示，自 1990 年以来，美国的天然气泄漏已经减少了 20%，目前全美正投资 19 亿美元（约合 119 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气线路安全改造，这也将进一步减少泄漏造成的环境危害。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env.people.com.cn/n/2014/0722/c1010-25317462.html>

[【返回目录】](#)

GiveGab：专为志愿者而生的社交网络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找工作可以上领英（LinkedIn），联系朋友可以上 Facebook，但要找一份志愿者工作该上哪儿发帖呢？

位于纽约州伊撒卡（Ithaca）的 GiveGab 公司就打算通过开发软件和建立一个帮助非盈利性组织、各种社团以及志愿者管理并宣传其工作的社交网络，来为全世界的志愿者群体提供帮助。除了像网站 Volunteermatch.org 或 LinkedIn s volunteering site 一样列出各种机会之外，GiveGab 还提供了一个社交空间，让志愿者和各组织可以相互联系并分享信息。

登录 GiveGab.com 网站，或通过最近发布的 iOS 应用，志愿者可以建好自己的档案。在这里，你可以根据兴趣搜索具体的非营利性组织或志愿者工作机会。该网站允许网上报名（或提供组织的联系方式）并且可以事后登录，志愿者可以在这里分享照片和心得体会。这些帖子会出现在该网站的社交推送“The Gab”中。

这个点子是 GiveGab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查理·穆里根（Charlie Mulligan）在 2010 年 11 月想到的，此前他看过一篇研究，探讨了每月一次的小组聚会，比如组织志愿者活动之类的，如何能够提升幸福感（就好像工资涨了一倍）。今年 44 岁的穆里根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2011 年从康奈尔大学的 MBA 项目毕业后就成立了该初创企业，口号是“更多快乐的志愿者”。

“我们的受众定位是那些志愿者活动参加不多的人，因为他们把做志愿者看成了一件太过严肃的事，觉得那会占用他们的全部时间。”穆里根说道。

该网站及其应用免费让志愿者和非营利性组织加入，那么 GiveGab 如何赚钱？该公司针对非盈利性组织、学校和企业提供金牌服务（Premium）——每月订阅报告和分析的费用是 39 美元起。通过该网站可以联系到 400,000 家非盈利性组织（占美国非营利性组织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大约 4,000 家在该系统上拥有活跃的志愿者经理，GiveGab 寻求招募更多志愿者经理，这样他们就能直接与志愿者社群建立联系。

据穆里根称，高校构成了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已经有超过 240 所大学登陆这个系统。

担任公司首席技术官的是穆里根的商学院同学亚伦·高德特（Aaron Godert），这对创业二人组先制定了一份商业计划并打造出一个堪用的测试网站，然后才寻找风险投资。在创业初期，他们依靠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集来的约 40 万美元，从穆里根位于宾西法尼亚州斯克兰顿（Scranton）的家中开始起步。当招募人手时，大多数团队成员都必须注册成为志愿者，并且与公司共同摸索未来。

“当查理邀我加入时，不得不说我要冒很大的风险。我可能一时半会儿领不到工资。”GiveGab 主设计师杰斯·康弗（Jess Confer）说道。

到公司搬到伊撒卡后，他们可以从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中招募人手。公司联合创始人称，这座小城非常适合发展其初创企业——伊撒卡的人口不到 4 万，拥有两所高校，还有其他 40 多家初创企业。

“这里的文化是积极主动并具有创造性。就城市规模来说，这里的创业活动非常兴盛。”高德特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GiveGab 终于取得了成功。到 2013 年 3 月，在当地的卡尤加创投基金（Cayuga Venture Fund）领投的 A 轮融资中，GiveGab 募集到 156 万美元，而后来这轮融资的规模又扩大到 265 万美元。穆里根表示，GiveGab 正在寻求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新一轮融资，并希望筹集 400 万到 600 万美元资金。

这家目前仅有 22 人规模的公司正在快速发展。当前，该网站号称拥有 50,000 用户，每七周翻一番。据他们自己介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发布了吸引用户参与的 iOS 应用。过去两个月，GiveGab 平台上的组织一直以每周 10% 的速度增加，而之前的增长速度还不到 4%。

“上周，我们一周的增长就超过了头两年的增长之和。”穆里根说道。

来源：网易

地址：<http://tech.163.com/14/0708/13/A0KSA2K000094ODU.html>

[【返回目录】](#)

公平贸易：从一个疯狂的咖啡概念到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

千万不要告诉 Paul Rice 这个家伙他的想法是可笑的。你嘲笑的主意可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Paul Rice 是美国一个制定工人安全标准和验证所生产的产品满足标准的可持续性非营利组织（好长的定语！）——公平贸易美国（Fair Trade USA）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凡通过公平贸易审核的产品均加盖公平贸易标志，以便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购买决策。

如今，公平贸易已经颇为兴盛了，但开始并不容易。Rice 说，他的想法一直被否定，其中一家食品公司说，消费者不会为道德上的副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

“整个行业都不相信消费者会关心产品标准的。他们不相信这是件有收益的事。他们把这当做是慈善行为。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农民可以产生合适的作物或成为一个严肃的生意人。对于公平贸易这个年头，人们即使不是完全排斥的，也是非常质疑的，” Rice 说。

在尼加拉瓜北部地区组织合作社和农民培训工作 11 年后，Rice 不顾层层阻力，还是在 1998 年

奥克兰开创了美国第一个公平贸易运动的总部。当年的 Fair Trade USA 不过是一个草根卖咖啡的生意，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有超过 800 家公司获得了公平贸易商标，年产值达到了 15 亿美金。全美也有超过 200,000 家零售店在销售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合作组织范围从小型、独立的商店像 Brazuka Coffee 到像 Dunkin Donuts 这样的国际巨头。

早期遭排斥的历程并没有使 Rice 灰心。恰恰相反，Rice 将这理解“这是企业家的 DNA。”。告诉一个企业家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他或她]要证明你是错的。

在启动 Fair Trade USA 之前，Rise 就萌生了要为那些和他在南美洲共事过的农民做点事情的想法。“我身上还担负着改善 10000 个农民生活的使命。我必须有所作为。失败不是我的选择。” Rice 这样说。

被公平贸易认证的第一个产品是咖啡，对于很多人来说，咖啡就是对公平贸易认证产品的全部认知了。诚然，咖啡仍然是认证贸易的最大类别。1998，美国公平贸易的第一年，76000 磅的咖啡被认证。在 2013，一亿五千四百万磅咖啡得到了认证。总的来说，美国公平贸易认证有超过 10 亿磅的咖啡。

但是 Rice 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拓展包括巧克力，新鲜水果，蔬菜和服装有限公司章程的产品线。目前，有超过 12000 个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公平贸易认证正在探索更多的产品品种的生产过程，包括海鲜和家具。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们总默认说公平贸易产品也都是“有机产品”。其实大约一半的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也的确是有机。不过更重要的是，“有机”二字主要代表着产品无农药无公害之类的，主要侧重环境影响。而“公平贸易”更注重的是生产者，尤其是劳工群体的权益保护。当然并不是说公平贸易就不管环境了，事实上，对环境的考量也正是公平贸易认证环节中的重要部分，如果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有害工人健康的化学物质，肯定是不能被允许的。

去年在克林顿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克林顿总统谈到了公平贸易的模式在“无限膨胀”。Rice 特骄傲地讲述着，在面对这样的无处不在的怀疑，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听前总统推行他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是个真正的胜利。

“Whole Foods（一个中高端连锁超市）当时在那个房间里，可口可乐也在那个房间里。当这些大品牌的代表听到关于公平贸易发展、演进、拥有更多影响力的消息的时候，是很震撼的。” Rice 这样说。

除了扩大其产品范围，Fair Trade USA 在努力扩展自己的地沿影响力。到目前为止，该组织致力于认证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生产的，面向美国的产品。零售供应商和工人权利倡导者一直在游说公平贸易将认证程序带入北美农业市场。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公平贸易认证的第一个北美的农

场——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辣椒农场成立了。与此同时 Rice 说他要希望今年早些时候可以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一些认证机构。

到目前为止，新市场的开拓还在试点阶段。也正如 rice 所希望的——“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农业有很多问题，许多让美国农业运动真正发展的工人是被称为“包身工”。移民被带到美国边境从事保障极少的劳动，而他们只能努力工作以偿还被带到边境的债务。

Rice 寻求从供应商寻求突破，以扩大公平贸易模型。公平贸易美国和最大公司合作——像星巴克、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他们往往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供应链的意识。这些跨国力量的采购团队往往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商品供应地区的劳工状况到底如何。

“这是一个充满着悲恸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和这些领袖级的伙伴合作，通过影响他们，创造价值” Rice 是这样说的啦！（译者/作者 橡皮不能擦）

来源：Social Earth

地址：<http://www.thinker360.com/page/4168>

[【返回目录】](#)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在京发布

2014年7月25日,国内领先的企业社会责任咨询公司商道纵横联合《南方周末》,在北京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发布了国内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Material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Guideline for CSR Report,简称MQI指引)是国内首份旨在规范和促进企业对实质性定量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的指引。《指引》聚焦于不同行业最具实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通过建立相应行业的关键定量指标体系,推动报告质量的提升。该《指引》的指标体系始终围绕行业企业最重要的议题建立,提升了报告信息的含金量,也有效解决了信息冗余的干扰。在《指引》的编制过程中,商道纵横充分征求了监管部门、企业、咨询机构、学术机构、民间组织代表等多方的意见与建议,力求体现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指引》(1.0版本)首批提供八个行业的关键定量指标体系,包括电力行业、金融行业、煤炭开采行业、农林牧渔行业、汽车制造行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冶炼行业、医药制造行业。商道纵横表示,《指引》还将陆续建立其他行业的关键定量指标体系,并推出后续版本。企业若在编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过程中参照《指引》并披露有关定量指标,即可在报告中声明参照《指引》,并使用《指引》标识。而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此标识快速识别一份披露了关键定量指标的报告。

参与发布会圆桌对话环节的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公益传播研究所所长吴浣苓、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郭云沛等专家,各位专家在讨论中都表示: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绩效,都是评判企业责任的标准。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可通过《指引》中的行业关键定量指标体系,识别不同行业的企业所面临的社会责任实质性议题,并对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和社会责任绩效做出比较和评价。

在发布会上,商道纵横总经理郭沛源博士指出:《指引》希望帮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写者快速识别适用于该行业的关键定量指标,同时它也提供披露关键定量指标的注意事项和步骤,希望企业能在报告中更加规范地披露定量信息,从而促进自身运营管理,并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

《南方周末》报系副总经理吴传震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指引》的意义:它对于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建立最具实质性的指标,帮助企业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帮助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在发布会上,商道纵横总经理郭沛源博士和《南方周末》报系总经理毛哲先生等为《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的“MQI”标识进行揭幕，象征着《指引》的正式启用，也开启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展新的里程碑。

来源：商道纵横

地址：http://www.syntao.com/CSRNews/CSRNews_Show_CN.asp?ID=17151

[【返回目录】](#)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步入新阶段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变化也随之加快。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之一，因此这种变化的内涵不容忽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一时间成为企业重要的发展战略。

近日，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议频频召开。7月18日，中国韩国商会在北京希尔顿酒店举办了《2013-2014 在华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发布会，白皮书里中韩文对照收录了针对127家在华大中小韩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调查结果和23家韩企的社会责任案例，可谓最全面介绍在华韩企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白皮书。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日内瓦大学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悉尼大学法学院在京联合举办了第二届“日内瓦—哈佛—人大—悉尼”学术研讨会。日内瓦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皮特（Henry Peter）在研讨会公开演讲中指出，在行业规范、国际规定、第三方评级等种种约束下，企业践行公司社会责任已成为必须。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开发中国西部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绿色环保再生能源、推进新型城市化方案等结构调整与经济创新。在瞬息万变的中国经济环境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哪些意义，企业如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也成为摆在中国企业，乃至在华国外企业的一道思考题。

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和外国企业的接触逐渐增多，“企业社会责任”这颗种子逐渐在中国的沃土上生根发芽。以我国2006年发布“十一五”规划为契机，我国开始正式引进战略CSR活动。在2011年开始实施“十二五”规划后，CSR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有专家表示，刺激内需、安定民生、技术开发、节约能源及环境保护等各种问题均与企业相关，因此，今后必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履行好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可以防范风险。我们现在所说的所有问题与危机，都与社会责任相关，环境污染、

劳动权益冲突、产品质量都可以归结为此。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多重价值。首先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防止风险，其次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社会责任履行好了，员工工作也会更加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同时，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形成自己的品牌，让社会和市场有更高的回报。”钟宏武说道。

亨利·皮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必须。一方面若企业违反这些规范，它们将面临遭受各方指责并失去信誉的危险；另一方面，如今越来越多的专业评级组织开始根据企业践行公司社会责任的程度来给企业评分，评分较低的企业有可能无法获得某些特定市场准入资格，还会被有责任心的投资者拒绝投资的风险。

“现在国家层面特别强调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北师大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有些企业社会责任是强制性的，比如环境污染、纳税等责任，而有些则是自愿的，比如捐款和赈灾。对企业来说，履行社会责任是其价值的一种增长，百姓也会从中受益。短期内有些企业可能因为履行社会责任而有利益上的损失，但从长期来看，却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同时，有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比较低调，价值增长可能比较缓慢，有些企业则比较高调，企业的价值增长可能很快就会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体现在各方面，对国家对企业对公众都有好处。

如何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句口号，脚踏实地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当务之急。

钟宏武曾实地考察了中国多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他表示，目前中国企业的CSR有3个阶段，即CSR1.0风险管理、CSR2.0效益管理和CSR3.0战略管理。如阿里巴巴集团就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效益管理结合的典范。阿里巴巴集团于2011年发起了内部员工自主进行公益创业的项目——“幸福抱团”，集团内任何一位员工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益方向，通过方案策划、团队组建和试运营阶段，即可获得每年5万元的公益“创业”经费用于项目经营。2011年，阿里集团有13个“幸福团”员工公益组织稳定运作，共有团员1200多人，组织活动200多次，参与人数6300余人次，活动内容涉及帮助老人和聋哑儿童、资助孩子、关注小动物、环保、公益平台等。

“阿里巴巴这个大平台解决了很多人的创业和就业问题。同时它的管理模式很特殊是自下而上的。因此阿里巴巴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走的是“群众路线”，让大家自己管自己，十分灵活。”钟宏武说道。

在履行社会责任的队伍中，阿里巴巴并不是个例，华为、中铝集团、中广核等企业也都身体力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皮特表示，企业践行公司社会责任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企业内部自行设定并公开企业的内部行为准则，其次企业针对公司社会责任具体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企业应完善内部归责机制，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最后企业应自觉报告并公布公司社会责任践行情况。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转自中国产经新闻

地址：<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601&extra=page%3D1>

[【返回目录】](#)

专访丹麦明星社企：自闭症人群像是蒲公英

丹麦社会企业家 Thorkil 的儿子在三岁时被诊断出自闭症，他没有在打击下消沉下去，而是阅读自闭症相关书籍、参与丹麦当地相关自闭症组织、细心观察儿子及其他自闭症人群的天赋和潜力，并在丹麦开拓性地创办了为自闭症人群提供 IT 就业的社企 Specialistern。几年后 Specialistern 已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复制到了十多个国家，Thorkil 还创办了 TheSpecialist People Foundation，致力于为世界上一百万自闭症及类似疾病人群提供就业机会。

Thorkil 不认为自闭症人群是患者，他敬称在 Specialistern 工作的自闭症人员是咨询顾问：“自闭症人群就像蒲公英，放错了地方是野草，放对了地方是草药”。他于 5 月下旬和 6 月中旬接受了记者的远程采访。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欣喜地发现 Thorkil，有意向将他的社会企业模式带到中国来，并正在探索可行的方案在中国寻找到具有就业潜力的高功能自闭症人群。

以下为采访内容：

记者：您在创业时是如何向外界解释您的理念？

Thorkil：在创办初期时，第一个客户是我原来的雇主 TDC，一家丹麦的电信公司。当时虽然我已经辞职，但仍有很多同事愿意帮助我。起初我希望直接联络各个部门的经理，看看是否有适合自闭症人群的工作。在和他们的沟通过程中，我询问他们是否有工作是令在职员工觉着枯燥，或是招不到人、需要在严格监管下执行的，比如软件检测、质量检测这样的工作。最终，我找到了这样的工作，并与 TDC 签订了协议，公司愿意雇用自闭症人群完成这些工作。

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寻找具有开放意识、乐意展开讨论的公司，并且信任我创办的企业可以完成他们委托的工作。当时我们的理念是——我们负责培训自闭症人群，随后让他们在企业合作伙伴的公司中任职，担任咨询顾问。与 SAP 合作模式就是这样。有相关的职位出现空缺后，我们就对应

地培训自闭症人群，最后 SAP 直接聘用他们。目前 SAP 是我们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所以，最初十年大概是这样运营的，期间我需要自己来雇佣这些自闭症咨询顾问为客户服务。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让企业客户直接雇佣培训后的自闭症人群。

记者：在您企业扩张的期间，我们注意到您把事业带到了许多的国家和不同的行业中。您希望为自闭症人群找到更多适合的工作，您还考虑扩张服务群体，为其他残障人群寻找工作机会。在您扩张期间，如何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呢？有什么要求吗？

Thorikil：目前我在美国推广我们的事业，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签订协议。我们与美国弧光会（The Arc）合作，它是美国最大的残障人群服务组织，在美国有 700 多个分会，服务各类的残障人群。我们已为其在纽约、费城的分会提供了培训。在硅谷，我们也为另一个合作伙伴提供了培训。这是我们可以持续的合作方式——在人力供应端，我们寻找有合适资历的自闭症人群，经过培训后让他们符合职位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和在相关领域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这类机构在当地已经有成熟的脉络，并且不仅为自闭症人群提供服务。因为在企业中，有许多能力超群的员工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经受精神分裂、抑郁、注意力缺陷症候群（ADHD）的困扰。当我们与经验丰富机构合作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为许多人群服务的经验，我们的技能也能随之得到扩充，让更多的群体受益。

如果我们要将这个理念引入中国，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需求。根据我们在许多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约有 1% 的人口符合精神咨询师对自闭症的诊断标准，在确诊人群中 5% 是我们的目标服务群体。比如中国约有 10 亿人，如 1% 的人被诊断为自闭症，即 1000 万人。这其中 5% 是我们的目标人群，他们能力超群、非常聪明，拥有工作能力，这就有 50 万人。所以我们有能力为这 50 万人争取工作。

中国在地理上远离欧洲和美国，但我们也希望能和在中国的、规模和服务与美国弧光会的类似机构进行合作。我们还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随后，我们会与中国企业沟通，讨论满足公司的需求、让通过培训的自闭症人群胜任公司的某些工作的可能性。

记者：您能进一步讲解一下目前的特许经营模式（Franchising Model）和质量把控的方法吗？您又如何在美国不同的法规框架下推广合作？您会在当地雇佣相关方面的专家吗？您是否有自己的律师保护您的利益和产品？您为合作伙伴都提供什么样的培训？

Thorikil：我们是以授权的方式进行培训。一个常规的培训项目里，我们先对海外合作伙伴的管理层进行培训，随后我们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认证和重续认证的过程都是为了保证质量，保护我们的品牌，始终确保我们传递高质量的知识。目前，我们在 12 个国家都使用这样的模式。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我们可能先培训美国的公司，然后再找其中国分公司进行落地合作。

中国是我们的下一阶段的重点，我们期望能在中国为 20 万名自闭症人群找到工作机会，而最大的挑战是找到我们的目标服务人群。尽管我们估计中国有一千万自闭症相关人群，但大多数都还没通过精神咨询师确诊。所以，在中国正式落地前，我们需要相关的人群拜访精神咨询师，并获得准确的诊断。

记者：您刚才提到已经在 12 个国家推广了目前的合作方式，请问您如何创造、维护如此规模的团体？如何确保大家的服务质量，以及如何鼓励这些成员沟通并传播您的理念？

Thorikil：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媒体刊登的不少文字和图片报道已经启发了很多人，他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希望可以进一步通过互联网传播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让这些更容易地为他人所用。除了我们目前在线下的合作，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网络虚拟社区来分享信息。

记者：针对这个虚拟社区，您有什么具体的实施计划吗？

Thorikil：目前我们规模有限，但会在适当的时机做出行动，同时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目前的成就上也非常重要。如果融资成功，我们可以建立另一个分享平台。目前我们的目标是为一百万个自闭症患者找到工作。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希望达成的目标，而完成这个目标才会让世人对不同人群有更加正面的看法、更加接受他们，但这只是改变对自闭症人群认知的小小一步，前方任重而道远。然而，就像我们现在接触的一样，在这个社区内，草根的力量可以非常强大。很多的好心人，尤其是家人朋友间有自闭症患者的人，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活动得到启发，为他们的家人朋友带来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分享信息的平台，这些强大的正能量都可以用于发展这项事业。

我很有信心完成“百万职位”这个目标。目前的传播主要靠叙事性故事为主，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传递给大家一些希冀。在这 12 个国家里，我们已经开展了展示活动。目前，我们还是主要与已经签订协议的伙伴进行合作。我相信，中国肯定有大型的组 织，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对心智有别、身体有别的人士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和政府也应该有很好的关系，将来也许我们可以合作。

记者：您说到您的机构很小，那有多少工作人员呢？大家如何分工？是否有志愿者呢？

Thorikil：我们的全球总部有 5-6 个人负责运营，美国的分公司也大概是这个人数。我们在资源方面还比较受限。目前的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合作关系上，合作伙伴包括企业、大学、学者的研究机构等等。目前已经有很多机构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但我们还没有能力承接相应的合作。在已有的这 12 个国家的分支机构里，自闭症患者的家长是我们的主力军，我们也希望在这些国家建立志愿者活动。总部主要是负责建立合作脉络，协助各个分支机构。我们希望这个基金会的核心保持小而精的构造，分支机构方面我们需要利用更多的资源和人力。

记者：那工作人员如何建立这些合作关系呢？

Thorikil: 以 SAP 举例来说, 这个全球最大的 IT 公司已经表示, 在 2020 年全球人力中会有 1% 的职位由自闭症患者担任。当 SAP 希望在其他国家, 比如俄罗斯, 招聘自闭症人群时, 我们会就参与进来, 与当地的机构, 以及我们自己的分支机构合作, 同时也吸引为残障人士服务的机构一起参与培训。我们计划是和这些机构在我们母公司的监督下一起运行我们的培训。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开展工作, 就需要类似 SAP 或其他的全球性企业向我们提出雇佣中国自闭症患者的需求。然后我们会与相关的政府层面、服务机构商谈, 共同探讨 我们在中国开展服务的机会, 以及我们可能需要的政府支持。同时, 我们也要和现有的机构进行合作, 这样我们就能资源互补, 共同为自闭症人群创造工作机会。

在法律支持方面, 一间律所为我们提供免费的支持。因为资源和时间有限, 我们还无暇通过市场营销获得更多的关注, 我们主要通过与企业合作扩大我们的规模。在知名度方面, 我们会在某个国家落地之前先做一些宣传, 引起大家的关注。

记者: 您之前提到过对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兴趣, 希望可以在中国落地。目前您对此事如何计划? 有具体的时间安排吗?

Thorikil: 对, 应该就是这两年, 明年或者后年吧。这些全球公司对这个项目都非常感兴趣。这些公司至少都有一个分公司在中国。在我们和合作伙伴中, CAI 和 SAP 都在上海有分公司, 既然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在中国落地了, 那么基金会的参与仅仅是时机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市场规模非常大, 可以在中国为二十万自闭症患者找到工作机会。

从我们为全世界自闭症及其他残障人群提供百万职位的项目现在的进展来看, 我们已经对如何提供、在哪里找到这一百万个工作岗位有了一些不错的点子。这个项目最 初始于欧洲, 目前的重点是北美, 计划下一个目标是印度和中国。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 我们估计这两个地区可以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 我们并不仅仅只 看重欧洲和北美, 中国和印度的市场空间更大。

记者: 听起来非常激动人心, 非常期待您能把项目带到中国来!

Thorikil: 对, 我也觉着这将是一次丰富多彩的经历。我只来过中国两次, 到过山西和天津。我在山西参加了一个国际经济论坛, 并在那里见到了一些人。我带着会议公告回了北京, 在 1997 年前我还去过香港。我特别期待在中国落地我们的服务。

记者: 那您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先开展工作?

Thorikil: 这取决于我们的合作伙伴。SAP 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分公司, 在上海和成都分别有研发实验室。他们可能有很多分公司,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研究所。成都, 成都在哪里? 你知道吗?

记者: 是的, 成都在中国西南部, 你所知道的熊猫也在那里。事实上, 成都是一个非常不错而

且安逸的城市，我认为你会喜欢那里的。那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

Thorikil: 成都，我已经在地图上标好了。对，那么我们很可能在上海和成都间选择一个城市落地。

记者：接下来想询问一些和您家庭相关的问题。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父母家里有自闭症子女，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成为了一个世界的社会企业家来帮助这些自闭症患者？

Thorikil: 为什么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笑）。我曾参加过一些社区服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从性格上来说我喜欢带着积极的心展望未来（笑）。我有 IT 背景，也在丹麦的自闭症患者组织当志愿者。这些经历以及我的家庭给予的支持促使我行动起来在做后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幸运的成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有。

记者：你提到天时地利人和，那这算是一种捷径吗？在你之前的工作中是否遇到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人？

Thorikil: 当然有很多人，遇到贵人是具有决定性意味的时刻。我有另一个重要的时刻，是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的一位朋友邀请我移居特拉华州，这给了基金会将工作扩展到美国的机会，使得这个项目的规模瞬间由小变大。我也遇到了一个自己的贵人——Ashoka 的杰克·爱德华兹（Jack Edwards），他成为了我的导师，也是基金会董事成员。

记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您的儿子。他在儿时表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和记忆力，给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当他被诊断患有孤独症时，您不仅尽全力帮助他具备生存能力，更希望他能够有蓬勃发展的未来。您能介绍一下他现在的状况吗？他是在您的公司工作吗？是否根据您的愿景茁壮成长了呢？

Thorikil: 他现在 17 岁，正在美国读高中，两年后就要毕业了。他不在我的企业工作，也不知道他以后是否会来这工作。但我考虑的是，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我们都会全力帮助完成他的职业规划。但我创立的公司不仅仅是为了给像我儿子一样的自闭症患者提供工作，而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社会对这类人群的认识。这样，和我儿子一样相似的人就可以有权选择一份职业，社会也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供这类人群选择，并实现他们的事业愿景。

记者：一位中国妈妈告诉我，当她的儿子被诊断有自闭症后，她决定参加当地自闭症人群的志愿活动，同时她女儿也决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您是否能和我们分享，您孩子的诊断对您的家庭成员有什么影响？

Thorikil: 我想所有的家庭成员的思维都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宽容，变得更愿意接纳个体的不同之处。拉思（Lars，受访者的儿子）的兄妹有了更多的社交技能，发展出一些之前不曾想到的道德观。他们绝不会欺负别人，还会保护被欺负的人。他们感恩拉思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拉思在没有

他人保护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伤害，但只要他们在，就一定会保护、支持拉思。我想他们并未因为家中有一个身患自闭症的兄弟而受到限制，这样的经历反而对成长的他们很有帮助。

记者：我想这是一份送给您家庭的礼物。人们有时厌恶自己，他们觉得自己太胖或者对自己的家庭环境不满，但每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缺点。作为孤独症孩子的父亲，您非常的宽容。您愿意对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说些什么吗？

Thorikil：那我想用一个蒲公英的比喻。这是一种美好的花朵，在全球各地都有。孩子们喜欢这种花，每个孩子都有吹蒲公英的美好记忆。但当他们成人了，置办了自己的不动产后，在花园里再次看到蒲公英时就不再喜欢它了。这时的他们把蒲公英当做是破坏景色的杂草，他们只喜欢自己规划种植的花朵。

尽管花朵依然如故，而人在成长中不断经历变化。曾经捧在手心的花朵却成为了眼中钉与花园规划的敌人，而你想要的是邻居家尽善尽美的花园。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考方式，考虑蒲公英是一种益处多多的植物，它既有营养、又健康。

其实人也像蒲公英一样，我们长大后想要独力，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处。如果我们被新的环境接纳，我们会很高兴。如果我们觉得被排除在外，就会被认为是社会的糟粕。人人都有创造价值的潜能，但只有受欢迎的人有机会影响别人的价值观。因此我想，有时一些人经历挣扎、低潮期、没有自信时，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接受，被认为是社会的杂草。如果我们能改变环境，这个社会对这类人就具有积极的认知，这将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而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自闭症人群经常被认为给社会带来麻烦，可我们想要告诉社会，这和用看杂草一样角度看蒲公英是一样的。对待自闭症人群，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全身都是宝”的新角度，让他们的不同为社会增光添彩。我们需要感谢他们、理解他们，这样我们人人都会用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样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珍惜不同的社会，那么自闭症人群将不被排除在外。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全球范围做的事情。

记者：谢谢 Thorikil。最后，你有什么问题想通过我们了解吗？

Thorikil：有的。你知道自闭症人群被分为低功能，中等功能和高功能，我想了解在中国有多少接受高等教育有较大就业潜力的高功能的患者？如果在中国自闭症人群主要是低功能及中等功能的，那么我不是很确定把我的模式带到中国的潜力有多大。

记者：是的，根据我所参加过的“自闭症认知日”（Autism Awareness Day）的情况来看，中国人对自闭症患者的印象是他们不善于沟通和表达自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不知道有高功能的自闭症人群的存在，他们对自闭症人群的理解也不完善。

Thorikil：据美国数据显示，每 68 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也就是 1.5%。并且自闭症是

会伴随一生的障碍。对于中国的人口数量，1.5%就意味着20,000,000人是自闭症患者。但是他们没有被确诊，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确诊。在美国和欧洲的服务人群里，大部分人都可以从我们现有的知识中受益。在中国有高达20,000,000的自闭症患者，我们相信如果他们可以被确诊，里面是有很多人有这个潜力来接受我们的培训和帮助的。

记者：现在在中国也有很多帮助残障人士的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比如星星雨，残友，无障碍艺途等等。他们很好奇在残障人士在丹麦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教育、提供的工作、社群的支持和政府的政策等等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Thorikil：在丹麦他们的生活情况还不错。我们有特殊的学校为他们提供教育，有专门的治疗师来帮助他们，有高等教育愿意接受他们，并且大部分对自闭症患者都是免费的。我们也有特别的项目来帮助他们，为他们的就职做培训，有很多有爱心的公司愿意来雇佣残障人士。丹麦在这方面是很适合残障人士居住的国家。

记者：很高兴知道这些信息！那么你们是打算通过和SAP的合作来开启中国项目吗？我知道有些组织像深圳的残友，他们雇佣残疾人士做IT方面的工作，并且和很多IT公司都有合作。他们的服务方面包括软件外包、电子商务、动画及平面设计等等。我觉得你们两个组织有很多共同点，或许你们可以合作。

Thorikil：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当一个组织已经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时，我们就很容易通过和他们的合作进入当地市场。如果我们还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那么当我们准备好（进入中国）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记者：是的。还有一个组织叫做无障碍艺途（WABC），他们正在探索自闭症患者在音乐艺术方面的才能。他们想问你像中国本土的NGO有没有机会可以和相关的国际NGO进行一个合作，比如资源共享之类。

Thorikil：有的。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全球的教育资源分享平台，在那里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将被分享。但我们暂时还没建立成功。我们还有我们的“百万职位”的目标，来不分种族不分贫富的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只是暂时还没有把这个平台搭建完全。等这个平台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像你建议的那样和世界各地的NGO分享我们的资源了。

来源：Bottledream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4/0722/4451.html>

[【返回目录】](#)

水牛书店：搭一座连结书本与土地的桥梁

在台北市的瑞安街上，坐落着一间特别的书店——水牛书店，这里不仅卖书，提供阅读和办讲座的场地，还销售视障按摩服务，形成独特的“按摩书店”景观。走出书店，隔壁是一间贩买有机蔬果、食材的超市——“我爱你学田市集”，提供消费者有机农产品、代客料理以及认识食材相关课程，倡议有机种植与健康消费的理念。

政客回归乡土

水牛书店与“我爱你学田市集”的老板罗文嘉，曾担任过立法委员及客委会主委。经历多年政坛风雨的他，看到许多政策规划与执行上的问题，并在父亲过世后，受到自己童年生活回忆的召唤，认为孩子应该在乡下长大，以更亲近的方式接触土地。因此，他举家搬回桃园县老家，开始“看天吃饭”的农家生活。

当田地越种越多后，他认识到好的农产品需要市场才能存活，因此，他找了愿意接受有机种植的农友，开启了“我爱你学田”计划，让农作物卖出后的盈余，成为新屋乡、观音乡里几所偏乡学校开设英文、打击乐课程的经费。他解释，之所以取名“我爱你学田”，一方面是希望大众以友善态度看待土地，再来则是希望能效仿北宋的“学田制度”，希望大众能够透过购买“学田米”的方式代替捐款，为偏僻乡村的弱势儿童教育尽一份心力。

而出于巧合，2013年8月，他受人之托接下水牛出版社社长的职务，并在老家桃园县新屋乡开设了第一间非营利的“水牛书店”。他将水牛出版社上万册的藏书搬回老家仓库，并在Facebook上邀集友人捐书到乡下，让乡下的孩子在水牛书店看完20本书就能换得1本新书。

“书店不营利，那为什么还要开？”朋友问。“只是要圆一个孩童时的梦。”罗文嘉说，“从小我的家乡只有文具店，没有书店。”

通过“我爱你学田”和水牛书店结合了“借书”与“地方教育”的在地行动，罗文嘉希望能借此改善偏僻乡村儿童资源相对都市缺乏的现象。

社企必须面对现实

“开书店很浪漫，但要维持下去却非常不容易。”罗文嘉坦言，开一间非营利书店理想固然浪漫，然而，若要持续经营书店，势必得面对市场上的竞争。于是，他又做出在台北开设一间营利性质的水牛书店的决定，搭起一座连接都市与乡下间的桥梁，让城市中的水牛书店的盈余补贴乡下教育课程的支出。

决定在台北开设分店后，罗文嘉认识到单靠卖书无法完全支持书店营运，他希望书店能在营利的过程也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因此，他回顾自己以前跑竞选行程时喜爱通过按摩放松身心

的经验，将视障按摩服务引入水牛书店，并提供给按摩师丰厚的薪水，帮助更多的视障朋友。他笑称，常有许多人问他按摩和书店有什么关系，他总会回答：“都能让人身心感到舒服。”

“我的产品要有优势，否则最后反而会侵蚀社会企业的价值，让消费者误以为社会企业代表的只是一个高理念、低品质的东西。”罗文嘉认为，想经营一间成功的社会企业，必须在自由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达到自给自足。他说：“不能期待大众接受你的产品只是基于同情，或是理念支持，因为那只是一次性的。”他同时也指出，社会企业的经营“必须踩在现实的泥土上”，消费者必须得到对等，甚至于超值的消费体验，社会公益的理念仅是消费过程中得到的附加价值。

连结书本与土地

书本与土地，看似两条毫不相关的平行线，在“水牛书店”和“我爱你学田市集”这两间店的经营下，找到相交的可能性。罗文嘉认为，书本能传递时间相当遥远的知识，而土地则可生养万物，“真正的文化存在人们活生生的聚落之中”，他说，身为客家人，自己一直向往着传统客家知识分子“晴耕雨读”的精神，天气好就耕种，天气不好就读书，跟土地始终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很幸运地，在我中年时，土地与书本这两条线终于能够相交了。”他笑着说。

近来青年回乡创业、投身农业蔚然成风，罗文嘉建议青年在真正投入前，必须经过仔细评估与计划，“不能只是把自己仅有的积蓄砸进去，最后挫折和失望，会带来对整件事的否定”。他表示，实践理想的过程中，问题每天都会出现，然而，他乐观地认为“问题不代表困难”，不让问题成为阻碍实践理想道路上的困难，是每个创业者需要厘清的重要课题，他说：“每天不断解决问题，不要让它变成困难。”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7/22/content_9361.htm?div=-1 [【返回目录】](#)

NGO 组团探访蒙牛公益之源

7月17日，由中华环保基金会、IUCN中国等国内外知名NGO组织组成的社会责任参访团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探访蒙牛集团从牧场到工厂整条环保产业链，进而了解蒙牛集团的公益之源。

首站“赛罕牧场”是一座生态可承载型牧场，依草场承载力进行牲畜数量控制。在这里每八分钟轮转一次的圆盘状自动挤奶器上，奶牛按序按时挤奶。牧场的负责人告诉参访团，为适应现代化生产要求，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下，蒙牛集团不断加强生态型、集约化、标准化奶源基地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蒙牛奶源中，规模化、集约化牧场奶源占比已达到94%以上，从源头上保证了牛奶质量。

在随后到达的第二站“污水处理厂”，参访团了解到，牧场建设过程中，除注重高品质的奶牛饲养场所、现代化的挤奶设备、创新的奶牛运动场、桑拿房等可带来优质奶源的设施建设外，还关注于牧场日常运行中产生的如牛粪、牛尿、清洗废水等污染物的处理处置设施和场所的建设。

相关负责人告诉大家，蒙牛积极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的资金投入，截止到2013年底，累计环保资金投入约4.5亿元，所有工厂都配备了污水处理厂，全部实现在线监测，处理出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年总污水处理量达1700万吨，年消减化学需氧量约3.8万多吨，出水经过深度处理，用于厂区绿化、道路清洗以及卫生间冲厕，得到了回收利用。

透明的检测室、自动化的挤奶设备、自体调节的饲料投喂方式、精细化的草种选择、分工明确的机械化牛舍清理、循环利用的污水处理理念，蒙牛从一盒牛奶的源头做起，形成多方联动的环保生态圈。

在探访之后进行的CSR交流会上，中华环保基金会秘书长李伟表示，“企业所有生产行为包括供应端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一个对环境竭泽而渔才能提供产品的企业，最终不会成为社会的选择。一滴牛奶的源头，是对草场及其自然生态的保护，不能在喝到牛奶的同时，以吸到雾霾为代价，环境健康，最终才能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总干事朱春全博士对此深有感触，“这就是可持续牧业的价值，国际乳企为什么在中国引起抢购，根源是其自然环境带来的优质牧场。你对环境、对社会责任的认可与投入，最终会体现为消费者对你的认可。”

国际上环保的最新理念已经从污染防治到生态可持续性发展转型，而蒙牛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在蒙牛和林总部旁的缘河河道由于自身流动性差、环境变化等原因污染严重，2013年蒙牛以实现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理念将缘河进行集中治理，治理后的缘河，已经重新吸引了多种水生禽类聚集生存。

一盒牛奶的旅程，从牧场开始，至餐桌结束。对于蒙牛的生态持续型环保链条，NGO 组织也有了直观了解。“对环保的关注体现了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方式。早在 2001 年，蒙牛就开始投身公益领域。蒙牛的公益理念传承至今，已深刻烙印在蒙牛人的基因中；蒙牛的公益已全方位覆盖产业链，从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保障、经销商公益共同体，到终端的消费环保。对我们来说，社会责任不是简单地做公益活动，而是贯穿蒙牛管理的方法。”蒙牛副总裁翟帽如是说。

事实上，蒙牛已经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模型：建立蒙牛社会责任生态圈，发挥价值共享、跨界协作功能，携手三大核心伙伴，整合三大产业资源，履行六大责任，努力实现企业、产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据翟帽介绍，在社会责任管理领域，六大责任体现为：

食品健康与安全。建立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协同合作伙伴，从牧场、工厂、销售三个环节，全流程保证乳品质量安全。

产品与服务创新。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关注不同人群对营养和健康的需求，不断创新产品、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

高效运营与管理。坚持守法合规管理的基础上，不断整合国内外资源，提升公司运营和管理效率。低碳与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环境管理机制，实现牧场、工厂、储运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绿色运营。

员工关爱与成长。建立健全员工发展体系，保障员工权益，助力员工发展，关爱员工成长，让蒙牛员工体面、优秀、幸福。

社区参与和发展。全面支持中国公益事业发展，重点在乡村教育、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三大领域提供帮扶，助力社会和谐发展。

同时，蒙牛与合作伙伴用实际行动践行到更多公益事业中。连续三年参与“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公益活动，组织并参与“我回老家上堂课”“交换卡路里”“牧场主大学”“壹块扫霾”“创新的青年最美丽、爱心井”等多个公益项目，其中，2011 年推出的“蒙牛爱心井”大型民生工程，3 年内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以实际行动帮助农牧区群众摆脱干旱困扰。截至目前，35 眼蒙牛爱心井完工，近 11 万农牧区群众受益。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7/22/content_9354.htm?div=-1 [【返回目录】](#)

◎海南风灾专题报道

7家机构发起成立“海南7.18台风公益赈灾联络处”

7月23日,壹基金、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天涯社区、海南省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联合会(筹)、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等7家机构通过电话会议共同决议,成立“海南7.18台风公益赈灾联合办公室”。

联合办公室的主要功能是:1)建立灾区需求及援助信息平台;2)针对从事灾区救援及重建的公益团队进行能力建设;3)办公室日常运营、信息发布、赈灾工作经验交流。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任君恒被发起人共同推举为办公室主任,海南返乡大学生胡诗泽被推举为常务副主任。

联合办公室欢迎社会各界加入进来成为合作方,一起为海南赈灾尽力,欢迎与胡诗泽联系,联系电话:15858009209。或者加入qq群号160652916互动。或者把信息发布到天涯社区“海南发展”论坛中来:<http://bbs.tianya.cn/list-hn-1.shtml>,联合办公室“台风灾情信息中心”将第一时间进行采集和核实。

据悉,灾害救助不仅要有讯息的入口(各种管道的讯息来源、汇集讯息来源、汇集讯息露出的平台)、更需要有讯息的出口(尽快告知正确的单位、进行查证、救援和处理),为此,联合办公室设立了“台风灾情信息中心”,做威马逊灾情信息进出口,用大数据的手法,全面征集并整理灾情信息,经过核查,清晰传递给政府、民间机构、救灾组织等。7月23日17点41分首次通过天涯社区发布“23日相关灾情信息”,提供了经由信息核查小组向政府、NGO、村落等具体对象核实后的灾情信息。

“台风灾情信息中心”继续欢迎拥有IT专业、信息管理专业、统计学专业、平面设计专业、文案专业、地图专业等能力的志愿者加入,办公地点是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都大厦21层,报名联系电话:18907661852(刘先生)或0898-68580708。

“台风灾情信息中心”接下来重要工作内容是:汇总灾情信息,由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牵头制作救灾地图,方便政府和民间机构提供对口匹配的服务,让救灾变得更有理和有序。

联合办公室主任任君恒表示,办公室已经开始启动筹备“海南公益组织赈灾交流会和能力建设工作坊”,邀请“4·20成都公益组织联合救援行动”召集人郭虹来琼分享经验,帮助海南救灾公益组织提升专业能力。“我们希望目前各自为战,能力不一的民间救援队伍能够迅速整合起来,通过交流会把灾情信息做一个分享和汇总,同时也在工作坊中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成长。”任君恒说,“我们也希望岛内外民众看到,海南救灾工作有很多公益机构在关注和行动,提升岛民对灾后重建的信

心。我们想对海南岛乡亲们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我们联合办公室将吸引岛内外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到救灾工作中来。”

发起机构之一的腾讯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腾讯公司在员工内发起了不设上限的“海南风灾地区修复计划”，提出如果愿意为修复海南受灾地区提出一套可行方案并能够亲自组织、有效执行这一方案，“微爱益起来”就会为你提供善款支持。海航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海航将为联合办公室提供相关的运力支持。作为专业的灾害救援机构，壹基金备灾救灾部主任沙磊表示，壹基金提供专业支持，协助联合办公室进行灾区公益团队能力建设。

天涯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涯社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网络社区，其总部又设在海南，对海南风灾的救助负有天然的使命和责任。到目前为止，天涯社区发起的“天涯爱心直通车”已向灾区发运 14 批救灾物资。天涯社区将继续发挥网络社区的平台力量，协同亿万天涯网友，分享、汇集、核实灾情和救灾信息，为灾民、志愿者、公益机构、政府和所有关心风灾的网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海南这次灾情很严重，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海南赈灾的行列中来。”沙磊说。

来源：天涯社区/海南在线《台风灾情信息中心》

地址：<http://www.tianya.cn/92772423>

[【返回目录】](#)

海南风灾捐款达 1800 余万元

海南超强台风过后，灾民急需解决吃饭、住宿和供电问题。海南省民政厅昨日（7月23日）晚间表示，大米、帐篷、衣服等救灾物资已经下拨灾区。截至当天，该厅共接收到来自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捐款约 1865 万元。

海南地广人稀，救灾工作难度颇大。在遭受台风正面袭击的文昌市翁田镇，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目前全镇有 263 个村民小组，多属自然村落。这数百个自然村四散遍布各处，多由曲折的土路与水泥公路相连，部分土路蜿蜒前行，不熟悉路况者一般很难快速抵达。

财新记者采访了解到，各界运至翁田镇的赈灾物资，主要集中在翁田中学，之后再由此处分发至受灾村庄。

海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石清理表示，截至 7 月 22 日 18 时，该厅共下拨给文昌、海口、昌江等市县帐篷 2750 顶、被子 1250 床、秋季运动服 800 件、草席 200 张、大米 250 吨。

该厅目前已组成五个工作组，对受灾市县因灾倒损房屋、灾民转移安置情况进行核查。核查包

括因灾造成的民房倒塌数量、需过渡性安置人数、缺粮情况（包括缺粮户数、人口数）、“三无”人员情况（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救助能力）等数据，为下一步救灾工作开展提供第一手资料。

此外，该省财政部门则表示，将对平时所需的遮阳网、油毡、三色布等物资采购给予资金支持。

赈灾期间，霉变面包和捐赠棉被等事故令官方机构蒙羞。财新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不少企业亲自下乡，将赈灾物资送至村庄，而不是交给政府方面统筹分发。

另一面，熟知当地情况的志愿人士王先生告诉财新记者，民间赈灾资源过于集中，主要是在见诸媒体报道的重灾区，偏远村落少有人问津。海南省红十字会募捐赈济处周女士接受《海南特区报》采访时也表示，受灾严重地区，有些地方没人去，有些地方人群扎堆。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提倡无序自发前往的做法，建议通过慈善组织或红十字会将物资运至灾区。

来源：财新网

地址：<http://china.caixin.com/2014-07-24/100708303.html>

[【返回目录】](#)

新京报：评红会给灾区送棉被：慈善要知“冷暖”

超强台风“威马逊”过境之后，琼粤桂三省区数十万受灾群众在高温炎热、水电中断的情况下等待应急救助，红十字会总会调拨 2000 床棉被运往灾区引起争议。广东红会有关人员称，救灾物资的需求由灾区工作人员层层上报。有人质疑其做法不专业，灾区干部也表示，棉被现在不需要。对此，红会回应称：基于地方需求，棉被用处广。

棉被风波：慈善要知“冷暖”

是不是每次应急救灾除了预案以外，还应该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做一些调整？灾难之后，灾区附近省市的红十字会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协调联动，总会如何发挥统一协调的作用？

在紧急救灾的时候，一定要把眼光放到当下，尽快满足灾区民众的基本生活要求才是第一要义。生活有了着落，当地的社会秩序才能尽快恢复正常，民众的情绪才会稳定。

红十字救灾有预案展示的是其专业性，但从预案到实施，这期间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显然，红十字会在展开救助前，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如果下面报上的请求可能存在不合常理之处，应进一步核实。救灾也好，做好事也好，不仅要有心，还要用心，用心就是让工作人员走到一线，了解受灾民众需求再作出决定，只有二者具备，才能真正达到救灾的目的。

如何让救灾物资的作用最大化，提高救灾效率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算美国，也出现过救灾混乱的局面。因为这样的深层原因，从“汶川地震”以来，每一次灾难救助总会凸显各种争论，这种争论的根源既不是地方官吏所言，刁民锱铢必究寸纱不让；也不是坊间所传，红十字等公益组织救灾不当且不力，有贪腐之嫌。这种争执的根源更多来自救灾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救灾组织好大喜功，不考虑实际操作而产生的冲突。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政府也因为救灾引发媒体的批评，为此他们专门进行系统的调查，改进救灾程序。而这点，我们显然做得不够。

棉被风波之后，红十字会又需要思考哪些问题呢？是不是每次应急救援除了预案以外，还应该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做一些调整？灾难之后，灾区附近省市的红十字会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协调联动，总会如何发挥统一协调的作用？除此之外，红十字会还要考虑救灾物资发放“撒花椒面”的做法，这样的做法虽然让报表看上去很漂亮，很短的时间内，救灾物资覆盖了足够的村落，但实际上这些救灾物资不仅不能发到灾民的手中，而且会给基层干部救灾带来巨大的麻烦。

救灾的时候不仅仅是救灾物资要对路，物资数量也要对路，看到报道，红十字会共计向海南、广东、广西700多万灾民发送家庭包5000个，不知道这5000个家庭包一个村能分多少个？什么时候才能发到村民的手里？而这些问题，恐怕真的需要红十字会用时间、用心来调查、来研究才能一点点地解决。才让多吉(公益人士)

发棉被只是救灾“惯常动作”

此次救灾运送过去的物资是大批、大量的，而不仅仅就这两千条棉被，两千条棉被只是救灾物资中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东西而已，无需责备相关部门的不专业。

对于这种大热天捐棉被的救灾之举，有人认为，红十字会心系灾区积极救灾，其迅速反应值得嘉许，但却把宝贵的人力、财力和运力用错了地方。相关部门应该用专业的方式做专业的事情。

在极端天气面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前有预警，后有救援。台风“威马逊”，在菲律宾叫“格琳达”，早于中国在16日已经肆虐菲律宾的经济核心地带。菲律宾是台风灾害频繁的国家，每次台风来临之前，都会有一些“惯常动作”。比如这一次在“格琳达”到来之前，菲律宾全国严阵以待，幼稚园至中学停课，部分政府机关提前下班，高架帆布广告海报提前撤下，低洼地区民众将家电搬往高处，重要文件装进塑料袋，救灾部分提前将救灾物资运进临时收容中心等等。虽然准备如此充分，“格琳达”依然造成菲国89人死亡，财产损失达10亿元人民币。

台风从菲律宾来到中国东南沿海，我们在应急方面也已做足了准备。我的一个朋友在湛江某农场工作，“威马逊”到来之前，农场就事先切断电源，每人分发数包泡面和几根蜡烛。昨天我问他现在最需要什么，他说，“被子倒真的不需要，但生活用品也基本不缺，昨天断水断电，不过应急预案很快生效，水电现在也都有了。可是农作物受灾严重，种植的香蕉等作物几乎毁于一旦，今年的收

成应该没有了。”

面对此次台风救灾的棉被事件，我们没必要批评相关部门的救灾是那么的不专业，因为在充分准备依然不可避免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灾难面前，我们需要大家都伸出援手，同舟共济。我们要知道，受灾的人民有几百万之众，此次救灾运送过去的物资是大批、大量的，而不仅仅就这两千条棉被，两千条棉被只是救灾物资中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东西而已。

去年超强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面对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菲律宾一位官员说了一句话：“我们从未说过不会犯错，但我们从来没有故意忽略自己的责任”。我觉得，在灾难面前，面对此次棉被事件，我们大家应该用这句话去相信、去理解所有的救灾行动！霁舟(大学教师)

来源：新京报

地址：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7/21/content_525155.htm?div=-1

[【返回目录】](#)

海南救灾乱象频受争议：备灾水平体现救灾能力

“三伏天，给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南方灾区送棉被，不知该囤的是谁？”当琼粤桂滇等省(区)正在和台风“威马逊”抗争时，一场有关究竟该给灾区送什么救灾物资的争论也在进行。

7月20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存储在广东省广州市备灾中心的2000床棉被运往台风灾区。当天下午，有媒体质疑：安置点的群众需要的是凉席、毛巾被，棉被肯定用不上。数十万受灾群众在高温炎热、水电中断的情况下等待应急救助，灾区现在急需供水。

对此，广东省红十字会解释称，救灾物资的需求是由灾区工作人员上报来的。

7月20日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放棉被是我国救灾的传统，棉被能铺能盖，用途广泛。

红十字会棉被风波尚未平息，7月21日，海南省民政厅购买并发放给文昌市受灾民众的面包中，发现有霉变的。尽管随后海南省民政厅向受灾民众致歉，并将剩余食品封存，承诺将调查清楚，追究责任，但公众的追问并未停止。

救灾仍在继续，值得思考的是：在我国这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救灾物资的储备、发放应该遵循哪些规则；未雨绸缪的备灾工作应该如何进行？

备灾中心储备哪些物资谁来决定

“棉被只是红十字会系统调拨给琼粤桂三省区救灾物资的一部分。”7月21日中午，正在海南

省海口市参与救灾的杨绪生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杨绪生说，截至目前，通过红十字会系统给粤琼桂三省区发放的救灾物资，除了棉被外，还有单帐篷、家庭包等，同时下拨紧急备用金5万元，用于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当地红会采购大米等日常救灾物资。

“目前，我国31个省区市除了海南省，当地红十字会都建设有救灾备灾中心，都有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全国还有六大区域性救灾备灾中心。”杨绪生介绍说。

30个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的面积、存储的救灾物资品种是否都一样？杨绪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存在一些差异，存储物资的种类由当地红十字会结合本地灾害特点和救灾需要采购、配置，同时也要为下次灾害做准备。”

“全国各地的储备仓库里，棉帐篷、单帐篷和厚薄不一的棉被是必备的救灾物资。近几年来，每年国家财政拨付给红十字会总会的5000万元用于备灾救灾彩票公益金中，总会要拿出一半资金购买单棉帐篷和棉被，发放给各地红会，存储在救灾物资储备仓库里。”杨绪生说。

《红十字会突发公共事件救援救助预案》中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储存一定数量的救灾物资，这些物资中，第一项是帐篷，第二项就是棉被。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制定了灾情发生后四级响应预案，四级响应时发放20万~50万元的物资，三级为50万~100万元，二级为100万~200万元，一级为200万元以上。灾害发生地一级一级上报灾情需求，24小时内需发出首期报告，一般用报表报告，紧急情况下可用电话上报。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救助规则》，各级红会在调拨、存储救灾物资时都要填写《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工作报表》，其中第一张表中就要求填写救助需求，并具体到品名、型号、数量以及预计受益人数等。

杨绪生告诉本报记者，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助手，在各种自然灾害的应急响应和紧急救援、转移安置阶段，工作的宗旨是保证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各种救灾物资的采购、储存、调拨、发放，都要遵循首先解决受灾民众的安置、基本生活问题这一规则。”

除了采购帐篷和棉被，总会还要采购一些大米，给各地红会。

除了这些救灾物资，全国各地红会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里大都存有家庭包，“近几年各地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存储的家庭包大多是港澳台三地的红十字会和一些企业的捐赠。”

“家庭包对于灾区非常实用，由于海南省没有红十字会兴建的救灾备灾中心，广东、广西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目前没有储备家庭包，发放给海南灾区的2500个家庭包、给广东灾区的1500个家庭包都是从福建红十字会备灾仓库里调拨的，给广西灾区的1000个家庭包是从云南红十字会备灾仓库里调拨的。”

杨绪生介绍说,这批家庭包每个价值390元,包括:毛毯1条、塑料席子1张、蚊帐1顶、T恤2件、雨衣2件、毛巾3条、内裤男女各2条、袜子男女各2双,拖鞋2双、碗筷勺子3套、卫生纸2卷、卫生巾1包,牙膏1支,香皂2块,洗衣皂2块,牙刷3支,衣架3个、塑料夹子10个,针线包1个,指甲钳1个,家庭医用箱1个,圆珠笔2支,笔记本2个,手摇手电筒1个。

据介绍,海南省红十字会和海南航空公司有合作协议,救灾物资的运输一律优先、免费运输,从福州调拨的2500个家庭包都是由海南航空公司免费运输到海口市的。

为何全国只有海南省没有当地红十字会兴建的救灾备灾中心?杨绪生解释说,海南省对于兴建救灾备灾中心有想法、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资金来源没有解决。

除了一些常规通用的救灾物资调拨和发放,各地红十字会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转移安置受灾民众阶段,都会使用紧急备用金和一些企业捐赠的资金就地购买饮用水、方便食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发放到灾区。

“这时候,就不能走国家规定的救灾物资政府采购既定程序了,那需要20天的公示期,时间上根本来不及,我们就征求当地红十字会的意见,征得捐赠人的同意,就地就近采购。”杨绪生说。

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

此次棉被风波,促使公众不得不追问:目前我国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状况如何?当地震、暴雨洪涝灾害袭来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

7月21日下午,民政部救灾司负责人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关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制建设情况的采访时表示,经过十多年时间初步建立起的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等重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发挥了明显作用,有力支持了抗灾救灾工作,较好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但是从近年的救灾实践看,与现阶段救灾需要和群众期待相比,救灾物资存在储备不足、方式单一、品种不够丰富、布局不够合理、管理落后等问题,同时,市场在救灾物资储备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薄弱,全社会参与减灾救灾的认识和协同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建立救灾物资储备,是有效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根本措施。上世纪90年代末,民政部与财政部开始探索建立我国的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十多年来,在各方重视和积极努力下,全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步。

在储备布局上,按照《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年)》中“自然灾害发生12小时之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的基本要求,民政部在北京、成都、拉萨等18个城市设立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多数多灾易灾的县都设立了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全国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基本形成。

在物资品种上,各级民政部门按照保障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净水喝”

的要求进行储备。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主要存储生产周期长、通用性较强的物资，目前包括帐篷类、被服类、装具类3大类14个品种，包括帐篷、棉衣被、睡袋、折叠床、场地照明灯等，其中帐篷根据不同需要，又分单棉两类以及12平方米、36平方米、60平方米等不同大小类型。各地主要存储保质期短、符合当地灾害特点的物资，而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灾害特点不断扩充储备物资品种。如内蒙古自治区储备有蒙古包，南方多个省市储备了毛巾被和夹克衫，多数基层民政部门通过协议储备等形式保障灾后食品、水等物资的应急供应。

在储备调运管理方面，近年来，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央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制度，各级民政部门和财政、发展改革、交通运输等部门及军队初步建立起救灾物资定期储备、大灾后应急补充储备、部门协同配合、军地应急联动、省际间应急援助等机制，保证了救灾物资应急调运工作的高效运行。

按照救灾工作“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灾害发生后，受灾省区一般先动用本省区救灾储备物资，在本省区储备物资全部使用仍然不足的情况下，可申请调拨中央救灾储备物资给予支持。此外，发生特别重大自然灾害后，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捐赠也为政府物资储备提供了有效补充。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救灾物资储备的发展，民政部目前正在制定《国家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规划》。希望通过规划的制定实施，进一步健全救灾物资管理相应政策法规，按照“适度储备、有效预防”的原则，科学测算储备物资的品种和规模，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分级储备数量，建成覆盖全国、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全国救灾物资储备布局，构建多元参与储备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立上下协同、标准统一、覆盖全国的物资储备网络管理平台，不断提高灾害应急救助水平，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备灾水平决定救灾能力

救灾还在持续，可以预见，备灾工作也将会持续展开，如何确保备灾工作能够防患于未然？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是一家从事救灾信息整理、分析、研判的民间组织，负责人郝南曾经作为志愿者参与过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的救援，在他看来，此次红十字会因为救灾物资的发放遭受质疑，说明目前我国救灾物资的管理还比较粗放。救灾物资需要一些常规的、通用的，比如帐篷、棉被等物资，同时也要有差异。当然，这对救灾物资的管理会是不小考验。

在郝南看来，灾前阶段的减灾、防灾、备灾工作可能产生的效果，比灾后去救助要好得多，“如果做得好、做得专业，会大大提升救灾能力”。

郝南认为，具体到救灾物资的储备和发放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差异和自

然灾害发生的不同季节，以及带给受灾民众的不同影响等因素，“如果棉被可以作为最常规通用的救灾物资，那最好能够做到有所区分，三斤重的棉被和五斤重的棉被产生的救灾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其实，在亚热带地区，应对台风暴雨灾害，应该更多地储备毯子作为常规救灾物资，比如，在菲律宾，遇到类似威马逊这样的台风，政府发给受灾民众最多的就是毯子。”

据媒体报道，海南省三亚市红十字救援队队长表示，这次发放的棉被并不是很厚的，是薄棉被，灾区还是很需要的。

“这也是一种备灾能力提高的表现，汶川地震之后，折叠床、彩条布等物资都已经进入救灾物资政府采购清单里，在很多受到强台风影响的灾区，彩条布能够用来覆盖庄稼，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这些都会考验政府或是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的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救灾物资种类越多、型号越多，价格就越会有差异，采购、存储、管理、运输、发放的成本都会增加不少”。

除了大量存储常规救灾物资，郝南还建议，一些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系统应该和当地或者就近地区一些生产救灾物资的企业、大型超市、物流、运输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一有灾害发生，立即准备相关救灾物资运往灾区。

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建英表示，目前对于受威马逊影响的地区的救灾工作还处于紧急救援和转移安置阶段，救灾工作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在灾害发生时，救援队伍、指挥平台、应急预案、救灾物资等方面都能及时启动。“从目前来看，还不错，但是在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救灾物资的发放还是要尽量精细化、差异化”。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地址：http://zqb.cyol.com/html/2014-07/23/nw.D110000zgqnb_20140723_1-05.htm

[【返回目录】](#)

◎公益布告栏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硕士启动招生

博雅巍巍，未名濯濯，美丽的燕园等待着立志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求学者。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益事业得到社会普遍关注。同时，越来越多的个人及企业人致力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与其迅猛的发展势头相比，公益事业所需的专业管理人才却十分缺乏。2014年6月，基于对中国公益领域人力资源长远发展及推动公益人才专业化、职业化的愿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培养社会公益领域专业管理人才的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此项目将借助光华管理学院现有的学科体系，课程资源以及管理教育的先进经验，整合社会公益领域的实践专家，共同搭建独有的课堂内外培养体系，为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源源不断的输送专业管理人才。

依托于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学科资源以及光华管理学院完善的管理教育体系，此硕士项目旨在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管理能力和实践能力，并致力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或社会企业家；项目将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训练，使其成为社会公益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以及社会创新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管理人才。

据悉，该项目为全日制，学习年限为2年。第一年脱产学习，第二年为周末模块制学习。课程将结合社会公益行业特点和商业管理的知识体系，系统设计专业体系课程，此外还将引入公益界的实务专家进行实践经验传授。更重要的是，该项目将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学院将与国外顶尖院校和公益组织合作安排参观和访学，学习其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同时，创新意识也将是项目的重要特色，怎么创新性地运用各种商业模式以促成社会公益的发展，将始终贯穿培养的全过程。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和学分要求并通过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后，将被授予教育部颁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将与公益领域内的机构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社会公益实践机会以及就业机会。同时项目还将依托于光华管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的平台来训练学生们良好的职业素养并为其提供更丰富的职业发展机会，助力学生们在公益行业内获得很好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

另外，该项目还设置了全覆盖、多层次的奖学金。奖学金将根据学生综合表现评定，其中最高额度的奖学金将涵盖项目学费。

具体招生信息请参考链接：

<http://www.gsm.pku.edu.cn/index/P807764881340104993228.html?clipperUrl=30/49143.ghm>

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招生大幕即将拉开，百年北大敞开胸怀，真诚邀请符合条件的青年积极报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公益事业茁壮成长还有待于专业的管理人才、有社会责任感的商学院、企业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携手创造中国公益事业的美好明天。

来源：NGOCN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819>

[【返回目录】](#)

2014 中国慈善论坛-征集优秀项目参展

2014 中国慈善论坛-“中国慈善组织造血项目”展火热征集中!“中国慈善论坛”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旨在促进中外慈善组织的经验交流与合作，在中国搭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慈善价值传播平台。“中国慈善造血项目”展作为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将于2014年8月16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展览以“从传统的输血式的公益，向营造公益造血机能的新探索”为核心理念，通过展示慈善组织的“造血项目”，来呈现中国慈善组织的成长之路。项目展现已开始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优秀的“造血项目”，世青创新中心作为论坛展览区唯一合作机构，全程负责项目征集工作。欢迎踊跃申报!

项目选拔标准

- 1) 公益组织，重视社会价值，具有跨界整合的思维，通过推动公益创新，助力社会创新与社会治理;
- 2) 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服务公共利益，提供的项目解决方案具有可操作性;
- 3) 公益组织具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长期发展目标，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 4) 依照组织成立年限，挑选不同年限的具有代表性特色的项目，展现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不断成长与创新的面貌;
- 5) 根据健康、环境、教育、艺术文化、科技五个不同领域的划分，均匀筛选各领域项目。

项目征集详情

- 1) 可申报 1-2 个代表项目，具有可持续性与社会影响力，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性与长期品牌效应的项目优先征集;

2) 具有“新一代公益项目”特点,如:公益创新、跨界思维、运用新媒体资源、具有造血功能等项目优先征集。

3) 造血项目要求:项目要有资金收入,不可单方面依赖捐助;财务具有可持续性。

4) 报送项目文字介绍 500-1000 字,提交图片 3-5 张,像素 100-300dpi。

征集截止日期:2014年7月29日

项目征集方式:在线填报 <https://thinkbigchina.wufoo.com/forms/aeecece/>,在线提交项目实施与展示报告、项目成果照片等相关资料。如项目资料过大,提交不上,请在完成在线填写申请表格后,将项目资料打包发至: pr@youthink.org.cn (邮件请注明单位+项目名称)

如有问题,请咨询:世青创新中心,联系电话:010-59488769

2014 中国慈善论坛

2014 中国慈善论坛旨在促进中外慈善组织的经验交流与合作,在中国搭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慈善价值传播平台。论坛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老牛基金会协办,将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届时,国际国内公益慈善界领袖、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将齐聚京城,共商慈善发展大计。论坛以“开启善时代”为主题,围绕“改革、创新、可持续发展”等时代关键词,通过主题演讲和高端对话等形式,共同探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慈善发展道路等诸多议题。

2014 中国慈善论坛主题专页:

<http://www.charityalliance.org.cn/2014charitybbs/index.jhtml>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sortinfoview.php?id=9686>

[【返回目录】](#)

2014 创想工作坊召集公益初创团队

如果你正在运营一个公益项目,开办一家社会企业,或者正投身于创造社会价值的事业中,请速速看过来,你就是我们寻找的创变者!

在公益创业过程中,你是否有关于企业传播、公共关系的疑惑?或者不知该如何进行高效的对外沟通?如果你有这些疑问,欢迎报名参加本期创想工作坊!

【时间】2014年8月2日 14:00

【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后续通知)

【费用】免费活动

【项目报名链接】

<https://thinkbigchina.wufoo.com/forms/2014aee/>

我们将根据报名信息筛选出五个公益初创团队，每个团队可以选派一名代表参加活动，与安可专业顾问团队面对面交流。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快来报名吧！

活动详情：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2014创想工作坊第一期要与大家见面啦~

创想工作坊旨在为优秀的青年创变者、公益创投机构以及公众提供交流的机会。邀请各领域专家听取青年创业家的疑惑与困难，为青年人提供专业指导与培训，帮助青年人以客观的态度和专业的方式去从事公益实践。

第一期工作坊的主题是**企业传播和公共关系**，我们邀请到 **APCO Worldwide 安可顾问** 的专业顾问团队，针对如何进行高效的外部沟通，并树立特色鲜明的企业形象给予建议和指导。

一、活动背景

中国青年创想计划

中国青年创想计划由成美慈善基金会于2013年发起，世青创新中心主办，秉承“人是我们的第一投资”的理念，汇聚和支持青年创变客(young Changemaker)，为青年发起的公益项目和社会企业提供天使支持。申请人经过选拔，将被授予“青年创想家”(ThinkBIG Fellow)的荣誉称号，通过创想学院，创想实验室，创想大使学习奖学金，创想特刊等品牌项目为这些青年创想家提供能力培训建设，国内国际学习交流机会，社区人脉网络支持，媒体报道宣传支持，潜在创投和资源对接机遇。

2014届创想计划将与众多合作伙伴从”能力建设，国际网络，宣传推广，人脉社区，孵化创投”五个纬度展开合作，继续推进青年参与公益和社会创新，持续打造中国青年创想家社区。

二、活动简介

2014年的创想工作坊是第二届“中国青年创想计划”中的先行实践环节。我们将在北京开展创想工作坊，为优秀的青年创变者、公益创投机构以及公众提供交流的机会。旨在鼓励青年了解同龄人在社会创新中的优秀思想，并且听取公益领域专家的点评，以客观的态度和专业的方式去从事公益实践。

在本次活动中，安可顾问将与世青创新中心(Youthink Center)携手为青年创业家们在企业传播，利益相关方沟通和公共关系方面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聚焦的问题将包含如下方面：

- 目标客户或受众定位
- 机构宣传渠道和方式以及媒体关系建立

- 利益相关方沟通策略

安可顾问的资深专家将基于对公益机构和企业的了解,结合经验案例,在公关和企业传播方面为初创企业提供指导和帮助。

三、活动参与人员

优秀青年创想家、安可顾问资深咨询师,咨询师、公众代表

活动人数:40人左右

四、活动环节: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14:10 安可团队介绍

14:10-15:40 青年创想家介绍项目并提出问题&安可点评

15:40-15:50 茶歇

15:50-16:40 分组交流

16:40-16:50 总结心得

16:50-17:00 主持人结束活动

本次活动后续报道及更多相关信息请关注:

官方网站: <http://www.youthink.org.cn/>

人人:世青创新中心 <http://page.renren.com/600946348>

新浪微博:世青创新中心 <http://e.weibo.com/youthinkcenter>

微信账号:ytcenter(世青创新中心)

五、活动组织方介绍

成美慈善基金会是一家由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董事长蒋会成先生共同发起并捐资创办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成立于2010年10月。成美慈善基金会定位于一个社会投资型基金会,致力于关注教育、医疗、文化、环保等四大领域的社会发展工作,并支持相关领域的社会创新及可持续发展,促进公益有效性和影响力,推出的主要公益项目有大学圆梦助学基金,扶贫巾帼励志基金以及社区中心发展项目等。

世青创新中心(Youthink Center)创始团队于2009年开始工作,中心立志于通过设计青年参与项目和学术项目来推动创新力的提升,成为一个优秀青年项目孵化和支持的平台以及从青年视角出发的智库。团队由青年人发起,旨在服务青年及青年组织,运营的项目得到过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阁下在内的多位政界,商界,公益界领袖们的肯定,是目前中国青年组织里面最积极参与联合国议程的组织之一。

安可顾问 (APCO Worldwide)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传播与公共事务咨询服务公司。自 1984 年成立以来, 安可顾问始终致力于通过战略传播和公共政策咨询, 助力全球客户实现其商业及社会价值。我们于 1989 年进入中国, 目前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地拥有超过百名专业顾问, 客户多为国际五百强企业, 横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消费品、能源等多领域和行业。

来源: NGOCN

地址: <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799>

[【返回目录】](#)

【刊物简介】

公益慈善周刊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策划编辑，旨在为 NGO 领导人以及政府民间组织管理负责人提供一周公益慈善新闻回顾，把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而为 NGO 机构发展与地方民间组织政策推动发挥积极作用！

【主办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人文与发展学院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民政部民间组织局相关政策调研项目、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以及众多国际与国内 NGO 的项目评估与监测项目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公益慈善领域主要关注的重点：

-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 公益组织发展咨询研究
- 公益项目开发、评估与监测
-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刊物订退阅】

如果您的同行或相关人士希望订阅此刊物，请发送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位至 gycsweekly@gmail.com 即可。

如果您希望退订此刊物，也请直接回复上面邮箱告知。

主办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董 强
编 辑：陈婉君、阳慧颖、潘思佳、刘春霞
办公电话：010-62731470
电子信箱：gycsweekly@gmail.com